



制度、名物与史事沿革系列

海疆开发史话

A Brief History of Coastal Area Development in China

安京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制度、名物与史事沿革系列

海疆开发史话

A Brief History of
Coastal Area Development in China

安　京／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疆开发史话/安京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5
（中国史话）
ISBN 978-7-5097-3196-3

Ⅰ．①海…　Ⅱ．①安…　Ⅲ．①海疆-历史-中国
Ⅳ．①K928.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41229号

“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史话·制度、名物与史事沿革系列

海疆开发史话

著　　者／安　京

出 版 人／谢寿光
出 版 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3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100029

责任部门／人文分社（010）59367215
电子信箱／renwen@ssap.cn
责任编辑／周志宽
责任校对／黄　丹
责任印制／岳　阳
总 经 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

印　　装／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6
版　　次／2012年5月第1版　字数／114千字
印　　次／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97-3196-3
定　　价／15.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国史话》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陈奎元

副 主 任　武　寅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卜宪群　王　巍　刘庆柱

步　平　张顺洪　张海鹏

陈祖武　陈高华　林甘泉

耿云志　廖学盛

总 序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古老国度，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探寻、创造的脚步。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轻若烟雾、薄如蝉翼的素纱衣向世人昭示着古人在丝绸纺织、制作方面所达到的高度；敦煌莫高窟近五百个洞窟中的两千多尊彩塑雕像和大量的彩绘壁画又向世人显示了古人在雕塑和绘画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还有青铜器、唐三彩、园林建筑、宫殿建筑，以及书法、诗歌、茶道、中医等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无不向世人展示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灿烂与辉煌，展示了中国这一古老国度的魅力与绚烂。这是一份宝贵的遗产，值得我们每一位炎黄子孙珍视。

历史不会永远眷顾任何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当世界进入近代之时，曾经一千多年雄踞世界发展高峰的古老中国，从巅峰跌落。1840 年鸦片战争的炮声打破了清帝国“天朝上国”的迷梦，从此中国沦为被列强宰割的羔羊。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不仅使中

国大量的白银外流，更使中国的领土一步步被列强侵占，国库亏空，民不聊生。东方古国曾经拥有的辉煌，也随着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轰击而烟消云散，中国一步步堕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民也由此开始了救国救民、富国图强的抗争之路。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人民屡败屡战，终于认识到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一道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倒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从此饱受屈辱与蹂躏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古老的中国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摆脱了任人宰割与欺侮的历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每一位中华儿女应当了解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也应当牢记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民族屈辱的历史。

当我们步入全球化大潮的21世纪，信息技术革命迅猛发展，地区之间的交流壁垒被互联网之类的新兴交流工具所打破，世界的多元性展示在世人面前。世界上任何一个区域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两种以上文化的交汇与碰撞，但不可否认的是，近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大潮，西方文化扑面而来，有些人唯西方为时尚，把民族的传统丢在一边。大批年轻人甚至比西方人还热衷于圣诞节、情人节与洋快餐，对我国各民族的重大节日以及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却茫然无知，这是中华民族实现复兴大业中的重大忧患。

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中华民族之所以历数千年而

不分离，根基就在于五千年来一脉相传的中华文明。如果丢弃了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文化，任凭外来文化随意浸染，很难设想13亿中国人到哪里去寻找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大力弘扬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弘扬中华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和民族自尊意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价值体系，光大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事业。

当前，我国进入了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新的历史任务和来自各方的新挑战，全党和全国人民都需要学习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保证。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家社会科学研究的机构，有责任为此作出贡献。我们在编写出版《中华文明史话》与《百年中国史话》的基础上，组织院内外各研究领域的专家，融合近年来的最新研究，编辑出版大型历史知识系列丛书——《中国史话》，其目的就在于为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提供一套较为完整、准确地介绍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普及类系列丛书，从而使生活在信息时代的人们尤其是青少年能够了解自己祖先的历史，在东西南北文化的交流中由知己到知彼，善于取人之长补己之

短，在中国与世界各国愈来愈深的文化交融中，保持自己的本色与特色，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永远发扬下去。

《中国史话》系列丛书首批计200种，每种10万字左右，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哲学、艺术、科技、饮食、服饰、交通、建筑等各个方面介绍了从古至今数千年来中华文明发展和变迁的历史。这些历史不仅展现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辉煌，展现了先民的智慧与创造精神，而且展现了中国人民的不屈与抗争精神。我们衷心地希望这套普及历史知识的丛书对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发挥应有的作用，鼓舞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新一代的劳动者和建设者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不断阔步前进，为我们祖国美好的未来贡献更大的力量。

陈奎元

2011年4月



⊙安　京

作者小传

安京，男，1954 年生。1982 年毕业于江西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专门从事海疆与海疆问题研究。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副学术秘书、规划基金处副处长、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公厅副主任兼院综合计划处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副所长、党委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副主任。已发表的著作：《海录校释》、《中国古代海疆史纲》。发表论文四十余篇。

目 录

引 言 …………………………………………………… 1

一 祖国富饶的万里海疆 ………………………………… 3

二 远古时期的近海开发 ………………………………… 10

三 秦汉时代的海疆经略 ………………………………… 15

四 寻访仙山与海疆巡游 ………………………………… 18

五 海盐生产与汉朝财政 ………………………………… 27

六 孙吴辟疆与寻访台湾 ………………………………… 32

七 海上丝绸之路与市舶管理 …………………………… 38

八 祖国的南大门广州港 ………………………………… 45

九 十洲人汇聚的泉州港 ………………………………… 54

十 东海门户明州港 ……………………………………… 59

十一　海上运输与北方良港 …………………………… 65

十二　沿海捕捞与养殖 ………………………………… 74

十三　珍珠粒粒千古情 ………………………………… 88

十四　郑和与海疆开发 ………………………………… 96

十五　海疆万里抗倭寇 ……………………………… 101

十六　王士性与《广志绎》 ………………………… 117

十七　郑成功收复台湾 ……………………………… 122

十八　璀璨明珠耀南海 ……………………………… 128

十九　捍海金堤献良田 ……………………………… 134

二十　东北海疆被侵犯 ……………………………… 140

二十一　近代海军的建设 …………………………… 147

二十二　近代海疆诉痛史 …………………………… 151

参考书目 ……………………………………………… 166

引 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海洋运输、海洋采矿、海洋捕捞、海洋养殖、海洋食品加工、海洋旅游等产业都将迅速发展，向人类提供更多更丰富的能源和各类资源。为了向海洋进军，就要熟悉、了解海洋，熟悉、了解海洋发展的历史。

中华民族是古老的民族，有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国地域广阔，海域宽广，岛屿众多，海疆绵长。

中华先民在石器时代就开始了海洋生产活动，采拾贝类，使用钓竿、鱼叉和鱼网捕鱼，驾驭独木舟和各类筏子在江河湖海中行驶。

商周时代人们已能制造先进的木板船，这类木板船不仅运送货物，而且被用于战争。这一时期，人类海洋开发的规模不断扩大，人们开始在海水中提取盐类，输往内陆广大地区。

秦汉时期，中国统一的海疆逐步形成，绵延的海疆从东北亚一直延伸到中南半岛。这一时期，中国沿海已建成许多海港，出现了一些繁荣的沿海城市。中国与东北亚、东南亚、南亚的航路已经开通，远洋船

舶乘风破浪行驶在太平洋西部和印度洋北部。这一时期，海南岛成为祖国的一部分，大陆的使者还首次到达了台湾岛。

隋、唐、宋、元时期，海上贸易更为发达，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一样贯通中西。

明清时代，郑和下西洋使中华文明远播海外，祖国的南海诸岛得到了进一步开发。

自明代开始，倭寇及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殖民者先后自海上进犯中国，中华儿女用生命和鲜血捍卫了祖国的海疆。伟大的民族英雄郑成功收复了祖国的宝岛台湾。

在近代，中国社会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军队弛废，屡次战败。帝国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侵犯中国主权，占领中国领土，掠夺中国资源。外国军舰在中国领海内游弋，甚至炮轰中国城市，屠杀中国同胞，中国海疆遭到空前的劫难。

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华民族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无数爱国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经过百余年的斗争，千百万人流血牺牲，中国人民终于在 1949 年站起来了。

新中国建立之后，人民军队空前强大，万里海疆空前巩固，海洋开发有了巨大发展。改革开放使祖国更加欣欣向荣。总之，祖国的明天更美好，祖国海疆的明天更美好。

一　祖国富饶的万里海疆

中国海疆绵长，海域广阔，海洋资源非常丰富。

中国的东部、南部临海，近海分为四大海区，即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总面积470多万平方公里，相当于陆地面积的五分之二。大陆海岸线长1.8万公里。

四大海区北部有渤海，总面积约7.7万平方公里，水深平均18米。渤海为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所环抱，沿海有辽东、渤海、莱州等海湾，南连黄海，是东北、华北与外部联系的重要通道。

黄海的西北邻渤海，南至长江口，总面积38万平方公里。黄海平均水深44米。黄海沿岸有著名的胶州湾、海州湾，为山东半岛和朝鲜半岛所拱卫。黄海东北连日本海，东接太平洋，南依东海。习惯上以长江口北角与韩国济州岛西南角的连线作为黄海与东海的分界线。

东海北与黄海相邻，东达日本九州、琉球、台湾，南至福建诏安，以闽粤交界的南澳岛与台湾南端的鹅鸾鼻之间的连线与南海为邻，总面积约77万平方公

里。东海以海底山脊为界，西部较浅，水深约200米；东侧为大陆架边缘，水深超过2000米。东海海岸曲折，有许多著名的海湾，如厦门湾、温州湾、台州湾、杭州湾等。我国台湾省与福建省之间的台湾海峡平均宽度约190公里，最窄的地方仅135公里，是南北间重要的航路，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南海为中国最南部的海区，北接华南大陆，与东海相邻，东接菲律宾群岛，南至加里曼丹，西依中南半岛，总面积350万平方公里，平均水深1212米。南海位于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是沟通两大洋的海上通道。

我国领海内有5000多个岛屿，总面积8万平方公里，海岸线长1.4万公里。

台湾岛是我国最大的海岛，总面积3.6万平方公里。邻近有澎湖列岛、钓鱼岛、赤尾屿、黄尾屿、兰屿等100多个岛屿。

海南岛是我国第二大海岛，总面积3.4万平方公里，北隔琼州海峡与广东雷州半岛相望。崇明岛是我国第三大岛，为长江携带的泥沙淤积而成。东西长80公里，南北宽10～15公里，总面积1083平方公里。

庙岛群岛分布于渤海海峡的中部和南部海域，北自北隍城岛，南至蓬莱头，长35海里。

舟山群岛位于长江口以南，杭州湾以东，浙江北部沿海。由600多个岛屿组成，主岛舟山岛，总面积为524平方公里。澎湖列岛位于台湾海峡的东南部，由64个小岛组成，总面积127平方公里。

南海诸岛分布于广阔的南中国海中，分为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四个岛群。

我国近海位于中纬度地带，自然环境十分优越，非常适合各种海洋生物的生存和繁殖。在我国水域生活的冷水、温水、暖水鱼类有几百种，常见的有赤眼鲮（音 líng）、长蛇鲻（音 zī）、黄姑鱼、真鲷（音 diāo）、鲥（音 shí）鱼、小黄鱼、银鲳（音 chāng）、鲐（音 tái）鱼、蛇鲻、红笛鲷、金线鱼等。也有一些冷水鱼种如高眼鲽（音 dié）、长鲽及太平洋鲱（音 fēi）和鳕鱼等。

海洋虾类有中国毛虾、太平洋磷虾、日本毛虾、中华假磷虾、扁足异对虾、长额仿对虾、红毛虾、锯齿毛虾等。

海洋底栖类有毛蚶、泥蚶、蛤仔、文蛤、缢蛏（音 chēng）、褶牡蛎、三疣梭子蟹、小型梭子蟹、棒锥螺、鲍鱼、马蹄螺、蝾螺、日月贝、珍珠贝等。

底栖藻类则有海带、石花菜、羊栖菜、铜藻等。另外，重要的观赏生物珊瑚的分布也很广泛。

早在上古时代，中华先民就开始了海洋开发活动。生活在1万余年前的北京山顶洞人就佩戴用海蚶壳制成的装饰品，这些贝壳制品可能是通过交换获得的。

新石器时代，沿海居民大量食用贝类。被遗弃的贝壳堆积如山，形成贝丘，考古学家称之为“贝丘遗址”。有的贝丘遗址很大，文化层厚达数米。贝丘广泛分布在广西、广东、福建、台湾、山东、河北、辽宁沿海地区。

中华先民很早就用柴草煮熬海水提取盐类。

新石器时代，人们开始利用航行工具进行运输和捕捞，航行工具主要是各类筏子和独木舟。

1973 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了 6000 年前的 6 支木桨，这是我国海洋科技史上的重要发现。这 6 支木桨由整块青冈木制成，桨叶呈柳叶型，桨叶与桨柄有了明显的区分，制作工艺比较进步（见图 1）。在河姆渡还出土了模仿独木舟烧制的陶壶。从这件陶壶可以看出，当时的独木舟底部呈弧形，这样可以减少水的阻力；在独木舟的一端有孔，显然是系缆绳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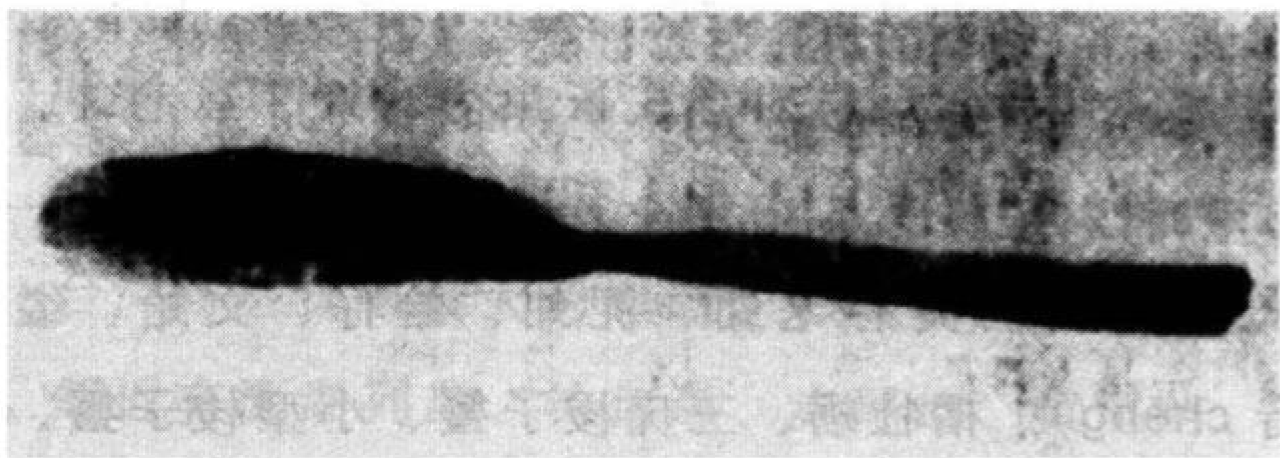


图 1　河姆渡出土的船桨

在驾驶独木舟的同时，中华先民还利用多种筏子进行航行。筏的种类很多，有竹筏、木筏；也有用竹木制做框架，利用皮囊、葫芦、陶罐的浮力漂浮的复合型筏子。

商周时代，关于海洋的记述不多，只留下了一些神话传说。在传说中，北海的海神叫禺强，他有一副人的面孔，却长着鸟的身子。传说北海有一种大鱼叫鲲。鲲非常大，有几千里长。这种鱼能化作大鹏鸟振翅高飞，翅膀就像遮天的云翼。这种鸟经常从北海起

飞，飞越冥冥大海，到达南方。

“海”字，在甲骨文里就存在。在西周时代，海不读作 hǎi。学者根据《诗经》、《礼记》、秦汉韵文中的韵脚，认为上古时代“海”读作“喜”。当时，不少人认为，中国大陆的四周都有海。统治者把海作为国家的自然疆界。

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很早就有船舶的记载。《山海经》中说，番禺最早制造了舟船。《周易·系辞》中说，伏羲氏刳（音 kū）木为舟，刻木为楫。《吕氏春秋》中说，虞姁作舟。此外，还有黄帝作舟的传说。商殷时代，甲骨文中便有“舟”字。据学者考证，甲骨文中的“舟”是对当时船舶的俯视图。“舟”并不是独木舟，而是木板船，其特点是翘首、平底、方头，中间有横梁支撑。

在甲骨文中，有一个像人撑船的字，专家确定为“津”字。津是“水渡”，即“济”的意思，后来引申为渡河的渡口。

商代，人们已经把舟船用于战争。根据甲骨文和其他文献记载，武丁时期，商人曾大规模进攻南方。纣王时期，商人又大规模征讨东夷。在这些战争中，商朝军队都要使用船只渡过大小河流。

在周代，造船业进一步得到发展。《诗经》中记述，周文王为了迎亲，大出风头，在渭水上用船只建造了一座浮桥。周朝规定了严格的享用船舶的等级制度，并委派官吏管理船舶。

西周时期，舟船多次被用于战争。据《史记》记

载，周武王在推翻商朝的决战中，率领800多位诸侯、战车300辆、虎贲3000、甲士4.5万人从黄河渡口孟津东渡，打败了商朝的军队。

周民族是生活在西方的民族，驾驭车马是行家里手。他们在向东方、南方的扩张中，逐步接触到当地的海洋民族——古夷族和古越族。周灭商后，封吕尚于齐地（今山东临淄），当地居民夷人进行了激烈的反抗。吕尚根据当地风俗，简化不必要的礼仪制度，鼓励渔业和盐业生产，发展商业和手工业。于是各国的人纷纷来到齐国，齐国迅速强大起来。

东南沿海的吴、越都是水上民族。古书上说吴、越同源，断发文身，以船为车，以楫为马，来去就像飘荡的风。

在商周时期，夷越人承担着向中央王朝进贡的义务。《逸周书·王会篇》记载，西周初年，由周公亲自指挥建设的大洛邑（今河南洛阳西南）竣工。四方的诸侯和古老部落都来庆贺，并带来各地的贡品——“方物”。居住在东方的夷人、越人贡奉的方物大多是海产品，东越人的贡物是海蛤，瓯人贡奉的是蝉蛇，且瓯贡献的也是一种大型贝类——文蜃，若人贡献的是玄贝。这说明，古代的夷、越人很早就开始了海洋生产活动。越人的贡品里还有大船。据《南越志》记载，有一次大船翻了，一下子竟淹死了3000人。这显然太夸张了，但越人的造船技术一定是比较高明的。

根据考古材料，夷越两族的先民很早就在东亚、东南亚沿海和太平洋中的岛屿间航行。在古越人居住

的地方曾发现一种石斧，因为石斧有肩，被称之为“有肩石斧”。这种石斧分布于恒河至中南半岛，东到日本，北达岭南，南界马来西亚中部的广大地区，很可能是古越人迁徙时携往各地的。

古代越人的居室是一种高脚屋，被称作“干栏”。这类高脚屋非常适宜人在潮湿的江河湖海旁生活。高脚屋的分布也很广泛，在中国大陆东南部、台湾和日本、马来西亚、中南半岛都存在形态很类似的高脚屋。

居住在各地的古代越人还有许多十分近似的习惯，比如当氏族中男女孩子成年时，都要文身或拔去（凿断）部分牙齿。

我们可以想象，古代的越人乘着小舟，沿着海岸线不断迁徙，有时顺着海流行驶很远的距离，有时被海风带往其他岛屿。他们在有淡水的地方停下来打鱼，采集贝类，捕捉野兽，种植水稻和薯类。与此同时，也把他们的文明带到了四方。

二　远古时期的近海开发

传说中，夏代已有了行政区划。《禹贡》这部出现较晚的著作说夏代的疆域分为九州。《禹贡》九州中的兖、青、徐、扬四州临海。

《禹贡》记述，河水、济水之间是兖州，其间有 9 条河东流入海。《尔雅》中说，这 9 条河是徒骇、太史、马颊、覆釜、胡苏、简、絜、钩般（盘）、鬲津。这些河流大多分布在山东、河北，流入渤海。因而兖州是东临渤海的。

《禹贡》又记，大海与岱山间是青州。古代学者解释说，青州东北面“据”海，西南面“距”岱，岱就是太山，或称泰山。学者认为，“据”是占据的意思。也就是说青州的东北部横跨大海，包括了今辽东半岛和环渤海的广大区域。这虽有些夸大，但无论如何“青州”的东北是靠海的，故能向中央王朝贡奉盐和海产品。青州西南至泰山。“距”指距离，引申为长度的极限。所以说，青州的地域大致在今山东的北部。青州的东边，在今胶东半岛上居住着莱夷。

青州的南侧是徐州。《禹贡》说，北自海岱，南到

淮河，是徐州的地域。古代学者认为，徐州东到大海（今黄海），北至岱（泰山），南达淮河。故徐州大致包括了今天山东南部、安徽、江苏北部的地方。

扬州在徐州的南边。《禹贡》说，淮水至海是扬州的地域。古代学者认为，扬州北据淮，南距海。北临淮河好理解，但南面达到“海”似乎不可能。不少学者认为，古人可能把今日的东海称作南海。从《禹贡》叙述的三江、震泽（今太湖）来看，扬州的南界大致在今长江三角洲区域。

从《禹贡》叙述的兖、青、徐、扬各州的地域看，人们想象中的夏代海疆大致包括了今天河北、山东、江苏、浙北的沿海地区。

据《禹贡》记载，在夏代海洋的开发已具有相当规模。青州的贡品中有海盐和多种海产品。徐州的贡品包括蠙珠和海鱼。“蠙”字，古代学者孔颖达认为即“蚌”字，蠙珠即蚌珠。扬州的贡品中有织贝。颜师古认为，“织贝”是作为货币使用的贝类；而另一位学者郑玄却认为，“织贝”是一种丝织品。但无论是哪种贡物，都是经水路运往中原的。按照古书记载，运送贡品的船只从长江行至海上，然后北上进入淮水、泗水，再沿黄河运达当时的禹都冀州。在大运河未开凿之前，这条水路是南北物资交流的重要通道。

商殷时代的海疆我们知道的不多。《汉书·地理志》中说，商殷继承了夏的疆域，没有大的变化。近年的考古和研究工作为商殷的统治地域提供了一些新材料。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商人来自东方，可能是

夷人的一支。商殷作为一个强大的宗主国统治着相当大的区域，北至燕山山脉，西达渭水流域，向南直抵长江中下游，东部则延伸到大海。根据甲骨文和古代文献记载，商殷的东部还有“夷”人居住，夷人分为畎（音 quǎn）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等，居地被称为人方。在今山东半岛上居住着莱夷，他们的势力范围分布于渤海沿岸。在今河北东北部到东北广大地区居住着肃慎族。泗水流域居住着徐夷，即“虎”夷，有人认为就是淮夷。淮夷之南居住着越人。百越是海洋民族，“以船为车，以楫为马”。这些被称为“越”的人，被发文身，以避蛟龙，驰骋江海，以舟为侣，是我国海洋开发的先驱。

《汉书·地理志》记载，周的疆域稍有变化，把徐州合在青州之内，梁州合于雍州，冀州分为幽、并两州。在周代，设立了“职方氏”，掌管有关疆域的事务。周临海的州为幽、兖、青、扬四州。

幽州在东北方，主要的山脉是“医巫闾”，山在辽东；主要的湖泊叫“貕（音 xī）养”（今山东莱阳东，早已干涸）；主要河流是河水、时水、菑（音 zī）水。菑水源于莱芜东北，流入渤海；时水出自般（音 pān）阳，汉时般阳县在今山东淄博西南。幽州颇有鱼盐之利。从以上记载看，幽州似乎是指环渤海西、北的区域，部分地域与其他州有重叠。

兖州的主要山脉是泰山。主要湖泊是“泰埜（音 yě）”，也就是大野泽，地处今山东巨野北部低洼地带。主要河流是河水、沛水、卢水、潍水。河水即黄河，

沛水即济水，卢水、潍水皆在山东半岛。兖州似乎地处山东北部，东临渤海。

青州在东方，主要的山是沂山，就是沂水发源之山；主要河流是淮水、泗水、沂水、沭水；主要的湖泊是孟渚。孟渚在今河南商丘东北。淮、泗、沂、沭四水分布在今天山东、安徽、江苏三省。由此可以看出，青州临东海，即今天的黄海。

扬州在东南方，主要山脉是会稽山，山在今浙江绍兴东南；主要河川是“三江”，古代人对三江有种种猜测，今天已不能确指；主要湖泊是“具区”，一般认为即今太湖。扬州实际是指淮河以南，浙江北部的广大地区。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史籍中关于中国海疆的记载才比较可靠。在这一时期，燕、齐、鲁、越、吴以及楚都有本国的海岸边界。

燕国的海疆包括渤海西、北部广大区域。燕国东有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包括今河北、辽宁以及朝鲜北部的一些地方。燕都“蓟”是北方重要的城市，在今北京西南。燕是多民族交往的地区，北有乌丸、夫余，东有真番。盛产鱼、盐、枣、栗。

齐国的海疆包括今天渤海、黄海的部分区域。北部的千乘临渤海，东部的东莱、琅邪临黄海。经过著名的君主齐桓公经营，经济有了很大发展，生产的海产品和丝织品输往内陆各地。

鲁国东临大海，南至淮水，邻近今黄海。

吴国地处长江下游，东临今黄海、东海，横跨淮水和长江，是春秋时代的海上强国。

越国包括今天浙南的广大地区，在打败吴国后成为跨越长江下游的强国。东临东海（今黄海）、南海（今东海），海上交通十分发达。

楚国在公元前334年（一说公元前306年）灭越国后，设置江东郡，也成为临海国家。

三 秦汉时代的海疆经略

经过几代人的奋斗，秦始皇横扫六国，威震海内，一统天下。他实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秦统一中国后，推行郡县制，确立了国家统一的陆疆和海疆。

秦王政二十一年（公元前 226 年），秦军攻破燕国，占领了今河北北部，第一次成为临海的国家。二十三年（公元前 224 年），秦军打败荆楚军队，占领了长江中游的广大区域。二十四年（公元前 223 年），又占领了淮河以南的地方，进一步扩大了秦国的海疆。二十五年（公元前 222 年），秦军攻取了燕国的辽东。同年又占据江南之地，置会稽郡。二十六年（公元前 221 年），秦吞并齐国，东海岸连成一线。三十三年（公元前 214 年），秦发兵占领岭南，置桂林郡、象郡、南海郡，其海疆延伸到南海。

根据学者研究，秦时海疆自北向南为：辽东郡包括今辽宁东部和朝鲜的西北部，辽西郡包括今辽宁西部和河北秦皇岛、昌黎、乐亭一带，右北平郡、渔阳郡、巨鹿郡、广阳郡东临渤海，济北郡、临淄郡、胶

东郡北侧临渤海，胶东郡的一部分、琅邪郡、东海郡临黄海，会稽郡、闽中郡、南海郡、桂林郡、象郡的海岸线从江浙一直延伸到今越南的海防。

西汉时，中央把全国划分为13个刺史部。临海的刺史部包括幽州刺史部、青州刺史部、徐州刺史部、扬州刺史部和交趾刺史部。临海的郡多达20余个，自北向南为：

幽州刺史部含乐浪郡、玄菟郡、辽东郡、辽西郡、右北平郡、渔阳郡、渤海郡7个临海郡。

青州刺史部包括千乘郡、齐郡、北海郡、东莱郡4个临海郡。

徐州刺史部包括琅邪郡、东海郡、临淮郡3个临海郡。

扬州刺史部包括会稽1个大临海郡。

交趾刺史部的临海郡有南海郡、合浦郡、交趾郡、九真郡、日南郡。

公元前111年，汉王朝把海南岛划入版图，设置儋耳郡和琼崖郡。

秦汉时，沿海形成了许多著名的海港城市，如番禺（今广州），东冶（今福州），琅邪、芝罘（音fú）、临淄等，其中番禺、临淄都是著名的大都会。据史书记载，临淄是五方之民相聚之地，该地发达的制盐业、丝织业为全国提供了丰富的商品。近海的番禺更是商贾云集，汇聚了四方的宝物，如犀、象、珠玑、银、铜、果、麻布等。

中央王朝在沿海郡县不仅设立行政官员，而且还

派驻军队和军事官员。设在沿海州郡的都尉，显然肩负着维持海疆安全的职责。

开发海盐是中央政府财政的重要来源，因而国家在许多沿海州郡设立了盐业管理机构。

海洋开发离不开造船业的发展，秦汉之际已具备制造大型木帆船的能力。史书记载，汉代已能建造“楼船”，“船高十余丈”。为了使船舶能够抵抗风浪，当时的大型船舶大都建有隔舱板，采用加设横梁等技术，从而更加坚固，适于远航。

秦汉时代，船只建造规模越来越大，种类也很多。在海战中，阵前冲击敌船的船只叫“先登”；以撞击为主要作战方式的船只叫“艨冲”；快速传递情报的船只叫“赤马舟”，船通体漆成红色，行如飞奔之马。

这时的船舶已用多桨推进，大船用桨20余支，并设有长桨。长桨后来演化为橹，提高了划水效率。当时船舶行驶不仅使用人力，而且利用风力，使用了帆。船舶的进步推动了海洋开发事业的发展。

四　寻访仙山与海疆巡游

“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

浩瀚的大海，使人们产生了许多遐想。在春秋战国时代，沿海居民就发现了海市蜃楼现象。在迷蒙的海天中，突然显现出繁华的市井，高大的楼宇，众多的人群，人们感到非常惊奇。随着航海能力的提高，人们开始接触海岛上的居民，岛民们的奇风异俗，也在人们中间流传。人们对自然现象的困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形成了关于海上仙山的传说。

在古代，较早记述仙山故事的是《山海经》。在《列子》中，关于仙山的故事记述得很详细。《列子·汤问》说：在渤海的东边，有一条没有底的大沟壑（音 hè），叫作“归墟”。八极九野，天汉（银河）的水都流注其中，但沟壑中的水不增加也不减少。海中有 5 座仙山，即岱舆、员峤、方壶、瀛（音 yíng）洲、蓬莱。每座山的高度和周长都是 3 万里，山顶平坦的地方方圆 9000 里，山与山之间相隔 7 万里。山上的台、观都是用黄金、美玉建成的，禽兽都是白色的。到处生长着琅玕（音 gān）之树，结出的果实非常甘

美，人吃了便会长生不老。居住在山上的仙人，日夜不停地飞翔。五座仙山的根都不固定，经常随波浪上下浮动，总也不能停稳。仙人们十分气恼，便向上帝申诉。上帝怕5座仙山流向西极，使群仙失去居住的地方，就命令禺强，驱使15头大鳌（音 áo）把山顶起。巨鳌分为3班，6万年一换班。这样，5座仙山才稳定住。但是，龙伯国的巨人走不了几步就来到5座仙山，他用钓竿一钓就钓走了6只大鳌。由于大鳌被钓走了，岱舆、员峤2座山漂向北极，沉到大海中去了，成千成万的仙人只好搬迁到其他地方去住。上帝大怒，就缩小了龙伯国的疆域，使龙伯国的人个子变矮。但到了伏羲、神农时代，龙伯之国的人仍有几十丈高。

列子记述的这个故事流传得很广，在楚国风格的诗歌——《楚辞·天问》里也提到了这件事。屈原问，鳌背负的大山，是如何安放上去的呢？

仙山的故事委婉动人，春秋战国时代的人们大都信以为真。齐威王（公元前356～前320年在位）、齐宣王（公元前319～前301年在位）、燕昭王（公元前311～前278年在位）等诸侯王都派人出海，寻找蓬莱、方丈、瀛洲3座仙山。据《史记·封禅书》记载，曾去寻访仙山的人说，仙山上的各种山石、草木、禽兽都是白色的，宫殿楼阁都是用金银建造的。在没有到达仙山时，山像在缥缈的云雾中；快临近时，3座仙山反而居于水下；等到了3座仙山，大风就把舟船引而他去，始终没有人能够登上仙山。这使得那些诸侯王非常不甘心。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威仪赫赫，普天之下都成了他一人统治的地方。但他仍不满足，希望长生不老，于是花费巨资寻访仙山仙药。汉武帝步秦始皇后尘，也开展了大规模的寻仙活动。通过秦皇汉武的求仙巡海活动，我们可以了解秦汉之际海疆的状况，了解当时近海航行的规模与水平。

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第一次东行，封泰山，禅梁父，祭祀天地，刻石立碑。这次东巡过黄、腄（音chuí，今山东福山），一直来到山东半岛顶端的成山、芝罘，又循海岸线到了琅邪，停留了大约3个月。就在这次旅行中，齐地人徐福上书，说海中有3座仙山，叫做蓬莱、方丈、瀛洲。他请求让他去寻访仙山，秦始皇批准了这个计划。于是，徐福率领数千人，开展了大规模寻访仙山的航海活动。

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秦始皇再一次东巡，东临大海，登上芝罘，刻石记功。后又来到琅邪。

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秦始皇来到著名的碣石山。这一次，他命令燕人卢生寻找仙人羡门、高誓。燕人卢生入海，仍然一无所获，只好借鬼神之辞对秦始皇说，灭亡秦国的是“胡”。于是，秦始皇命令蒙恬率兵30万进攻胡人，夺取了黄河河套以南的土地。后世儒生附会说，卢生告诉秦始皇亡秦的“胡”，实际上不是胡人，而是秦二世胡亥，“胡”是指胡亥的名字。这真是历史的巧合。

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秦始皇立石于朐界（今江苏连云港），以为东门。这块立石也是中国海疆

的标志。

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开始另一次大规模巡狩，他的少子胡亥也随行。这次行动路线是经云梦到长江，坐船东航，路过丹阳，来到钱塘（今杭州），又渡过浙江，来到滨海城市会稽，祭祀了大禹，观望了南海（今东海）。然后北到吴地，从江乘（音shēng，今江苏句容北）乘船，沿近海航线，北航至琅邪。在东巡中，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花费巨资入海求仙的徐福欺骗秦始皇，说之所以不能到达蓬莱，是因为受到大鱼的阻挠。秦始皇也梦见自己与海神搏斗。于是，他命人携带捕杀巨鱼的工具入海，从琅邪荣成山出发，一直航行到芝罘才发现并射杀了巨鱼。在这次海上旅行后，秦始皇得了重病，在途中就病死了，结束了他显赫的一生。

秦始皇4次东巡，在海上进行大规模的航行，说明当时的航海业、造船业已有了巨大进步，同时也标志着中国统一海疆的正式形成。

汉朝是继秦之后出现的封建王朝。秦灭亡后，出现了群雄争立的政治局面。汉高祖刘邦经过楚汉战争，取得了中央政权。但实际上并没有实现国家的统一，沿海沿边的许多地方仍然被割据势力所控制。

经过汉高祖的努力经营，又历文、景之治，到了汉武帝刘彻时，汉朝的国力大大增强。汉武帝是一位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他采纳严助的意见，派遣楼船将军发兵会稽（西汉治今江苏苏州市），从海上援助东瓯，击退了来犯的闽越军，取得了对东瓯地区（今江

浙一带）的控制权。

公元前 119 年，汉朝北部边疆的战争告一段落，汉武帝开始着手逐步剪灭南部的割据政权。元鼎五年（公元前 112 年），汉武帝派 5 路大军进攻南越国。楼船将军率先攻入南越，占领了番禺。南越平定后，汉王朝在其地置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涯、儋（音 dān）耳九郡。

公元前 110 年，汉朝军队又攻入东越，东越王被人杀死，汉武帝统一了东南部的海疆。

与秦始皇一样，汉武帝也开始了他的巡狩活动。元封元年（公元前 110 年），汉武帝东巡海上。他登泰山，祭祀了八神。下泰山后，方士们又言可以到蓬莱，寻访仙药。于是汉武帝又航行于海上，北至碣石上岸，从辽西经北疆重镇九原，回到长安。

第二年（公元前 109 年）春，汉武帝又一次巡游至东莱，寻访仙迹，派遣数千方士采长生药。这年秋，朝鲜进攻辽东。汉武帝派遣水、陆大军征伐朝鲜，置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

元封五年（公元前 106 年），汉武帝南巡，亲自射杀了长江中的“蛟龙”。他率领庞大的船队在长江上绵延“千里”。这次巡狩东出长江口，沿海航行到琅邪。在近海航行中，祭祀了沿海的名山大川。

太初元年（公元前 104 年）十一月，汉武帝又东巡海上，查问方士入海求仙的情况。十二月，汉武帝又一次前往渤海，在蓬莱遥祭海神。《资治通鉴》上记，这次东巡有西域和中亚各国的使者跟从，汉武帝

赏赐财物，以显示汉王朝的富饶。

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汉武帝又一次东巡海上。

太始三年（公元前94年），汉武帝又来到东海。他捕获了一只红色的雁，乘兴作了《朱雁之歌》。这一次他自南至北，从琅邪乘舟，礼成山，登芝罘，乘舟在东海上巡狩。

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汉武帝再次来到东莱。这一次，他仍然念念不忘寻仙求药的事，不顾群臣的劝阻硬要入海。等待了十余日，由于海浪汹涌，天气不好，迟迟不能出海，只得悻悻而返。这时汉武帝才有所省悟，认识到自己十分愚蠢，受了方士的欺骗，天下根本没有什么仙人，不过是些虚妄的谣言罢了。他把各种各样的方士一律罢黜（音 chù），终于没有被迷惑终生。

秦皇汉武的寻仙活动固然十分愚昧，但是，他们之所以能够驰骋海上，说明当时造船业非常发达，航海知识相当丰富，沿海的航路十分畅通，海疆也十分巩固。

当时沿海的主要航路，包括长江口到黄河口的江、海、河联运通道。海外交往的航路主要有自闽越通过南中国海、马六甲海峡直抵缅甸、孟加拉的南方航线和辽西到朝鲜的北方航线。

当时，国内航线要运送南方贵重的木材。《潜夫论·浮侈篇》记载，居住在京师的贵戚非常奢侈，棺木必用江南的檽、梓和豫章之木。江南采伐的木材都要汇总到长江上，自江入海，自海入淮，再入河、入洛才能到达首都。有的木材竟要运到东边的乐浪、西

边的敦煌，花费的人力、物力、财力真是难以计数。

根据《后汉书》记载，当时，交趾七郡的货物都经东冶（今福州市）从海路运到北方。又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时进行海外贸易的船队曾进入南洋，到过都元国、邑卢没国、谌离国、夫甘都卢国、黄支国；汉代的译使还到过黄支之南的已程不国。

根据专家的研究，都元国在马来半岛东南部，靠近新加坡，其名可能来自一条河。唐时，人们称这个国家为罗越。

邑卢没国是指缅甸南部锡唐河入海口的地方，唐代人称其为拘蒌密。

谌离国可能指缅甸伊洛瓦底江中游的悉利，悉利是唐代人的称呼。

夫甘都卢国大约是指缅甸的太公城，过去叫蒲甘城，濒临孟加拉湾。

黄支国，据推测是今印度半岛东海岸的康契普腊姆。唐代人称之为建志补罗，是达罗毗荼人的首都。黄支与建支的音相近，补罗的意思是“都城”。

已程不国是指今天的斯里兰卡，唐代称之为“师子国”。

皮宗是汉使返回时所经过的地方，指马六甲海峡的香蕉岛，这是随季风回归的必经航路。

这些记载表明，汉代已有了高水平的港口建设和发达的航海业。汉代的商船从沿海港口出发，随季风可以远航到印度次大陆。（见图 2）

那么那个欺骗了秦始皇，获得了大量金钱和物资，

图 2　汉代南航路线

说明:括号内为今地名。

到海中求仙的徐福怎么样了呢？徐福（又名徐市，市即芾，音也近福），齐国人，传说是徐偃王的后代。据后人考证，徐福是今江苏省赣榆县人，在那里有徐福村和徐福庙。徐福求仙的传说，不仅中国人家喻户晓，而且在我们的东邻日本也有许多人津津乐道。根据日本人的传说，徐福东渡求仙的地方就是日本。目前，在日本还有自称是徐福后裔的人。在日本大阪附近的和歌山新宫町熊野滩，有记述徐福事迹的石碑，人们称之为《秦徐福碑》。根据日本文献记载，在秦始皇统治时，徐福率童男童女 500 人，携带种子和农具渡海到日本，在熊野滩登岸，从事耕作，养儿育女，子孙成为熊野地方的首领。

中国文献也记述了徐福的下落。在《史记》里，有一段伍被规劝淮南王刘安放弃求仙活动的话。伍被说，秦国不遵行圣人的正道，驱使徐福入海，寻求神仙奇物。结果，徐福带着三千童男童女、各类工匠、各种各样的种子，在抵达一块地势平坦、有许多塘泽的丰饶之地后，便留在那里，不再回来了。秦始皇白白花费了许多钱财。

那么，徐福到达的平原广泽在什么地方呢？许多学者认为就在日本。根据现代海洋知识，徐福的船队很可能从琅邪出发，沿海岸线绕过胶东半岛的成山头，经芝罘港，从蓬莱渡渤海海峡到达辽东半岛南端，再沿海岸线抵达朝鲜半岛东南部海岸。尔后靠冬季季风南下，到达对马岛、冲绳岛，再到达日本北九州沿岸，最后经濑户内海到达和歌山新宫町熊野滩。

五　海盐生产与汉朝财政

盐是人类生存不可缺少的物质。食用盐有的来自海洋（海盐），有的来自湖泊（池盐），也有的来自地下（井盐）。其中海水中盐的储量最为丰富，产量最大，应用范围最广。因此，从海水中提取盐在世界各国都是十分古老的行业，中国生产海盐的历史更是源远流长。

古代称盐为“鹾”（音 cuó）。《世本》中记载，第一个煮海水提取盐的人叫夙沙氏，夙沙氏是黄帝的臣子。另一部古书《路史》引汉代宋衷的观点，认为夙沙氏是炎帝的诸侯。这说明我国海盐生产的历史十分悠久。

中国的一位学者在分析了大量的考古资料后认为，古人类的居住、迁徙都与盐有密切关系。他认为，远古人类的一支沿着南亚、东南亚、东亚、东北亚的海岸线和岛屿前进，在河口处停留一段时间后，就开始向内地扩展。世界上许多古老的文明都发生在大江、大河的入海口。因为这里土地肥沃，植物繁茂，物产丰富，可以得到宝贵的淡水资源。还有一个重要的原

因就是可以得到食用盐，并且可以利用河流把盐转运到内地很远的地方。

在不少中国文献中，都记载了海盐的生产情况。春秋时代，齐国出现了一个著名的政治家管仲。到了战国时代，产生了一部以他的名义编纂的书——《管子》。《管子》中记述，春秋时代，齐国、燕国的海盐生产十分发达。齐国渠展的海盐和燕国辽东的海盐，与楚国汝水、汉水一带生产的黄金一样出名。当时齐国的君主齐桓公问管子怎样治理国家，管子回答说：只要“官山海”就可以了。齐桓公不大明白什么叫“官山海”，管子解释说：治理靠海的国家，要制定正确的盐业政策。管子算了一笔账，一个1000万人口的国家，征收人头税1年只能得到3000万金；而实行食盐的国家统购统销，国库1年便可得到6000万金的收入。齐国只要大量收集柴草，煮海水提取盐，1年可获盐3000万“钟”。把这些盐销售给梁、赵、宋、卫等国家，可以获取巨额收入。

地处东南的吴国、越国也是春秋时代重要的产盐大国。海盐、章山的铜、三江五湖丰饶的物产是东南的宝藏。东南的统治者大多利用这些财富富国强兵，其中出现了不少历史上很有作为的人物。越国的盐业生产也很发达，越人把盐称作“余”。“朱余”是越国盐政官员的官衔。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盐业生产有了更大的发展。虽然我们很难找到秦代盐业生产的具体描述，但据历史资料记载，秦代的盐、铁收入是过去的20倍。

西汉初年，统治者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允许民间私营冶铁、煮盐和铸钱，因而出现了不少豪门巨富。据《史记》记载，吴王刘濞（音 bì）曾“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刘濞有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后，就开始“诱天下亡人，谋作乱”。汉武帝时，中央政府的政策有了变化。汉武帝刘彻是个很有作为的皇帝。他穷兵黩武，发兵东助东瓯，北征匈奴；通西域，击大宛；占朝鲜，灭南越。同时，汉武帝还营建长安，大修宫殿，凿昆明，建上林。他多次东巡，求长生之药。这些活动的直接后果就是国库的钱被使用殆尽。为了弥补亏空，他采取了各种手段聚敛财富。

元狩四年（公元前 119 年），出身大冶铁商的孔仅和出身大盐商的东郭咸阳同任大农丞，管盐铁事。他们提出把冶铁、煮盐等利润丰厚的产业收归国家经营，设铁官和盐官对冶铁、煮盐等产业进行管理。以后又提出官营铸钱及酒类的专卖等。这些措施使汉朝财政收入大大增加，但也引起许多富商大贾的不满。于是，在汉代著名的盐铁会议上，主张官营的大司农桑弘羊与反对者“儒生”们展开了一场辩论。根据《汉书·车千秋传》的“赞”，这次会议是有记录的。桓宽大概利用了这些会议记录，经过编纂、增删、补充写就了一本经济著作《盐铁论》。

在这次会议上，桑弘羊力陈盐铁铸币私营的坏处。他列举了这样几条理由：第一，盐铁私营会助长人们追求私利，而不顾国家的利益。第二，盐铁私营形成了不少巨富豪强，他们结党营私，成为一股危及国家

安全的势力。于是一家害百家，百家害诸侯，诸侯害天下。第三，盐铁私营使国库空虚，政府难以对国家进行有效的管理。而国家经营可以在道义上建本抑末，遏制淫侈的风气，堵塞兼并之路，增加国家收入，使朝廷可以赈济灾民，训练军队，讨伐叛逆，对国家进行有效的管理。由于汉武帝十分赞成桑弘羊、东郭咸阳、孔仅的主张，因而盐、铁官营等措施逐步在全国推行。

根据《汉书·地理志》等史籍记述，汉朝廷在全国32处（一说38处）设有盐官，其中大部分设在沿海。汉代，在今东北地区沿海的辽东平郭（今营口一带）、辽西海阳（今滦州一带）设有盐官。在今河北地区的泉州（今天津市一带）、章武（天津静海、沧州一带）、海阳（滦县一带）、堂阳（南宫县一带）设有盐官。

山东盐区是全国最大的盐区。全国设盐官30余处，山东独占了11处。设盐官的郡县有：千乘（今滨州一带），都昌（今昌邑一带），寿光、海曲（今日照一带），计斤（今胶州湾），长广、昌阳（今莱阳一带），曲成、当利（今莱州一带），东牟（今文登一带），㡒（音 xián）县（今龙口一带）。

汉时，在江浙一带的会稽郡海盐县设有盐官。

福建盐区的盐业生产历史也很久，但见诸文字的记载却较晚。

汉代，在今广东地区的南海郡番禺县和苍梧郡高要县设有盐官，广东的制盐业也很发达。

海盐生产是海疆开发的重要内容。勤劳、智慧的华夏儿女，从采集自然干燥的盐渍，到煮盐、晒盐，规模不断扩大，水平不断提高。在中国，很早就出现了盐业管理机构，对盐业的生产、运输、销售进行管理，这在世界盐业发展史中有重要地位。

六 孙吴辟疆与寻访台湾

辛弃疾有一首词，其中有“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等名句。孙仲谋即三国时吴国的君主孙权。

东汉建安五年（200 年），18 岁的孙权继承了父亲孙坚、哥哥孙策两代人开辟的基业。当时他的地盘只有江东的会稽、吴郡、丹阳、豫章、庐陵等地。即使在这些地方，深山险阻之地也没有被彻底征服，各地的“英雄豪杰”蜂拥而起，局势十分险恶。孙权掌握政权后，广招人才，尊张昭为师，任命周瑜、程普、吕范等统率军队，以鲁肃、诸葛瑾为谋士，开始了他统一东南的事业。

孙权政权面临的巨大威胁来自北方。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在基本稳定北方局势后，便大举南下。建安十三年（208 年），荆州牧刘表的儿子刘琮投降了曹操，使曹操得到了一支训练有素的舰队。

刘备与孙权结成军事联盟，在赤壁（今湖北蒲圻西北）大败曹操，击溃了曹操的水陆进攻。赤壁之战

后，刘备占据荆州，向西南发展。从此形成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

建安十八年（213 年），曹操再次南攻，与孙权争战达 1 月之久，仍然难分胜负。曹操看到孙权水、陆军整齐的阵容，不禁慨叹说："生子当如孙仲谋!"

建安二十五年（220 年），曹操死后，他的儿子曹丕称帝，国号魏，改年号黄初。第二年刘备称帝，国号汉，年号章武。229 年，孙权称帝，国号吴，年号黄龙，迁都建业。孙权称帝后，再次把曹魏看作主要敌人，他制定的战略是吴、蜀共同抗击曹魏："若有害汉（蜀汉），则吴伐之；若有害吴，则汉伐之。"进而由共同抗魏，发展为蜀吴二家共同瓜分中国。孙权以函谷关为界，把兖、冀、并、凉划给蜀汉，把豫、青、徐、幽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并与蜀汉约定"各守分土，无相侵犯"。

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意图，孙吴政权努力经营东南一隅，并向东、北、南 3 个方向发展。吴黄龙二年（230 年），孙权派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率领万名甲士入海寻找亶（音 dàn）洲和夷洲。吴地的长老们传说，在大海之中有块陆地叫亶洲，秦始皇派遣方士徐福率领童男童女几千人入海寻找仙山、仙药，就停留在亶洲，世代繁衍，已有了几万家。亶洲人经常乘船到大陆来买布。会稽东冶县人在海上行舟，也有被风吹到亶洲的。

对于这次开拓疆域的计划，重臣陆逊坚决反对。他说：现在四方并不安定，经过连年战争，百业凋敝，

人口减少，急需应付的事情很多。陛下要把夷洲纳入版图，我认为没有多少益处。海航万里袭取夷洲，海上风急浪险，吉凶很难预测。老百姓改居其他地方，不服水土，很难不生病。耗损了大量国力，渡海占据不毛之地，实在是得不偿失。

但是孙权没有听从陆逊的意见，仍派卫温、诸葛直入海寻访亶洲、夷洲。这次航行取得了部分成功，出海的船队没有到达亶洲，只到达了夷洲，并从夷洲带回了不少土著居民。那么夷洲是今天的什么地方呢？许多学者认为就是今天的台湾，根据是一部名叫《临海水土异物志》的书。这部书的作者叫沈莹，是吴国丹阳太守。有专家推测这部书写于卫温航海后的一二十年间，其中关于夷洲的内容很可能是听水手或夷洲的土著居民说的。

《临海水土异物志》简称为《临海水土志》或《临海异物志》。原书在宋代亡佚了，但在《太平御览》等书籍中有转录。

据《临海水土异物志》记载，夷洲在临海郡东南，距临海郡大约2000里。

临海郡是吴国在太平二年（257年）把会稽郡东部划出设立的，包括今浙南闽北的始平、临海、章安、永宁、松阳、安阳、罗江诸县市。离该郡2000里显然是不确切的，但考虑当时的航海水平和航线的曲折后，学者们认为，临海东南的夷洲就是台湾。

夷洲气候温暖，没有霜雪，草木冬夏郁郁葱葱，这与地处亚热带、属海洋性气候的台湾极为类似。夷

洲又是多山的地方，这也与台湾地形相近。

夷洲的居民是山夷。《临海水土异物志》记载，在夷洲的山顶上有越王射箭用的白色靶石，这与春秋时代越王勾践的“外越”属地有密切关系。山夷中，男子的“装束”是“髡（音 kūn）发穿耳”。就是说，他们不像古代汉人那样把头发束扎在头顶，而是用工具把头发剪断。山夷男子戴大耳环，这在中国南部、东南部也是很常见的；女子则用文身打扮自己。

《临海水土异物志》记载，当时的山夷还处在氏族社会阶段，男女老幼都居住在公共房屋内，睡在一张“床”上，互相恩爱也不回避。

山夷把石头磨砺成箭头、石刀、石斧、石环和石珠。他们会织布，水平很高，织出的布被称为“细布”。当地人喜欢把鱼肉放在大陶罐中用盐浸卤，经过一段时间再吃，认为这是上等佳肴。山夷也很喜欢喝酒，酒是用谷物制作的，用木槽盛酒，用竹筒作饮酒杯。

至于山夷的婚姻状况，《临海水土异物志》说得很简略。参考其他文献，我们知道山夷的婚姻是很自由的。男女相爱后，便自行婚配。等到有了孩子，女子便到男子家中，把丈夫接到自己家中。以后丈夫便在妻子家落户，终身侍养妻子的父母。这显然还保留着母系社会的遗风。

山夷有自己的社会组织。氏族长如要召集大家，便敲击一段空木干。这种原始木鼓的声音可以传四五里远。氏族成员听到鼓声，都会赶来聚会。有时聚会

是为了庆祝节日，人们载歌载舞，引吭高歌，共同娱乐。更多的时候聚会是为了进行氏族间的战争。人们常把猎获的人头当作战利品带回来，经过一番修饰后用作“夷王”的面具，或是把人头挂在高高的木杆上炫耀武功。这种习俗在华南也广泛存在过。

山夷自称“弥麟”，在近代被称作高山族，是对台湾土著居民的总称。实际上，他们包括泰雅、阿美、排湾、布农、鲁凯、卑南、曹、赛夏、雅美等族属。他们陆续从大陆、海岛来到台湾，开发建设了宝岛。

孙吴政权不仅向东发展，还试图联络辽东一带的地方割据势力。当时盘踞辽东的公孙氏，已苦心经营了 3 代。到公孙渊时已管辖辽东、带方、乐浪、玄菟诸郡，被曹操任命为辽东太守。

经过一段时间接触，孙吴与公孙渊开始进行官方交往。嘉禾元年（232 年）春三月，孙权派遣将军周贺等率船队驶往辽东。孙吴船队有百余艘船只，沿海岸线北上，在辽东半岛南端的沓津（今辽宁大连）登陆，受到公孙渊的款待。

面对南北夹击的威胁，曹魏迅速作出反应，魏文帝派熟悉海事的田豫率青州军队进行讨伐。田豫估计，孙吴船队返航时必然要沿海岸航行至成山，便在成山附近险要地段列兵驻守，准备拦截孙吴水军。孙吴船队在返航途经成山附近海域时，遭到暴风雨袭击，船只触礁沉没，不少士卒葬身波涛之中。田豫以逸待劳，俘获甚众。将军周贺也未能幸免，在成山被田豫处死。

这次失败并没有阻止孙吴政权与公孙渊的联盟。

这年十月，公孙渊派遣校尉宿舒、阆中令孙综到吴国，向孙权称臣纳贡，献上貂裘宝马。孙权十分高兴，为公孙渊加官晋爵。嘉禾二年（233年），孙权下诏表示要与公孙渊齐心合力，共定天下。他派遣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等将兵万人，携带奇珍异宝等封赏之物，与公孙渊的使臣一同赴辽东。但是，在曹魏强大的军事压力下，公孙渊反悔了。孙吴船队在沓津登岸后，公孙渊派人扣压了来使，砍下张弥、许晏等人的头送到魏国。孙吴船队中只有少数人幸免于难，逃到了高句骊国。公孙渊出尔反尔的做法使孙权联合北方割据势力、共同抗击曹魏的计划成了泡影。

孙权在逐鹿中原的同时，还积极开拓南部疆域。赤乌二年（239年），孙吴军队占领了零陵、桂阳。其后又进占交州。赤乌五年（242年），孙吴政权派遣将军聂友、校尉陆凯率兵3万征讨珠崖、儋耳。这次渡海作战，动用了大小战船300余艘。

孙权北联辽东，东寻夷洲，南征琼崖，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特别是动用了大量海船，这与吴国发达的造船业有密切关系。东吴在永宁（今浙江温州市）、横阳（今浙江省平阳县）、温麻（今福建省连江县）均设有造船工场，拥有许多造船工匠，很多刑徒也被派往造船工场作苦工。因而吴国成为造船大国，拥有一支庞大的舰队，这是魏、蜀两国不能比拟的。

七 海上丝绸之路与市舶管理

唐代是我国海外贸易大发展的时期，形成了东西洋之间的海上丝绸之路。海外贸易能够带来丰厚的利润，不断充实国库，这就为朝廷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如何对海外贸易进行管理。著名学者韩愈建议说，若向岭南地区委派一个好的官吏，对海外贸易进行管理，那么海外的宝货就会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珍珠、香料、象牙、犀角、玳瑁等将充斥中国市场。为了增加中央财政的收入，唐王朝决定在广州委派管理进出口贸易的官吏——市舶使。

历史文献中记载的第一个市舶官员叫周庆立。《唐会要》中说，开元年间岭南市舶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与波斯僧侣一起开办工场，制造了大量“异巧”、“奇器”，进献给皇帝。

周庆立是兼管市舶的地方武官。后来，唐朝为了加强对海外贸易的控制，曾委派太监专任市舶使。广德元年（763年），发生了广州市舶使、宦官吕太一叛乱的事件。这次叛乱迫使节度使张休弃城逃往奔州。唐朝派遣军队才平息了这场叛乱。发生这一事件之后，

唐王朝便把市舶使置于地方长官的监督管理之下。

市舶使的基本职能是管理进出港口的船舶和货物，具体任务有5项：其一是征收船舶税。凡是外国商船停泊，都要交纳“下碇税”。其二是检查外国商船携带的货物。凡外船进港，市舶官吏照例要登船检查；外船船主也照例要设“阅货宴”，款待市舶官吏。其三是为皇室收购奇珍异宝，行使某些专买的权力。其四是接受船商给中央朝廷或地方衙门的礼物。其五是收取货物的销售税。船商在办完以上手续之后，方可把货物运到指定的“市区”——贸易区进行销售。市舶使管理的进出口贸易为中央财政带来巨大的收入，是支撑国库的经济支柱。当黄巢起义军攻入广州后，宰相于琮曾叹息道：“妖贼”（污指黄巢起义军）获得了南海海上贸易的巨大利益，切断了中央财政的来源，使国库面临枯竭的危险。

唐朝设立的市舶使把海外贸易纳入国家行政管理的范围，为中央财政提供了大量财源，也为宋、元以后市舶管理提供了重要的经验。

北宋初年，在消灭了南汉、吴越割据政权之后，朝廷先后在广州和杭州设置市舶司，掌管东南沿海各港口海上对外贸易。咸平二年（999年），又在明州设置了市舶司。这样就形成了杭、明、广“三司”。元祐二年（1087年）和元祐三年，又增设了泉州和密州（今山东胶州）两个市舶司。这样全国就有了5个由市舶司管理的对外贸易港口。

南宋时期，淮河以北被金国占据，密州市舶司不

复存在。此后，两浙路市舶司变化较大，而广州、泉州则成为比较稳定的海外贸易口岸。

元朝的大军在至元十四年（1277 年）攻占浙、闽等地后，在澉浦（今杭州外港）、上海、庆元（今宁波市）、泉州设立了市舶管理机构，管理海外贸易。后来又增设了杭州、温州、广州 3 个市舶司。

为了维护中央王朝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自宋开始，开始制定市舶管理办法，使市舶掌管的“蕃货”、“海舶”、“征榷”、“贸易”等事项有章可循。元丰三年（1080 年）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整的进出口贸易法规——《广州市舶条》（“元丰法”），并诏令全国执行。元朝在宋“元丰法”的基础上又加以改进，形成了《整治市舶司勾当》二十二条。

市舶管理的规定大致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审批稽核进出港的海船和货物。在商船出海前，船主必须先向驶出港所在地市舶司提出申请，以便得到官府的批准，拿到市舶司签发的“公验”或“公凭”。“公验”是给大船出具的验证证明，“公凭”是为随行船、送柴送淡水的小船发放的出海证明。在公验中，要列明“财主”（货主）、“直库”（货管员）、“艄公”（船工）、“杂事”（杂工）、“碇手”（管理锚碇的船工）等人员的名单，写明船的载重量、船长多少、船宽多少、桅杆多少，还要写明商船贸易的目的国。在一个时期里，从明州港开出的商船只能到日本、高丽进行贸易，从广州始发的商船只能与“南蕃”诸国进行贸易。以后，对这一条款有所改变，出海的商

船只要有广州、杭州、明州市舶司签署的海外贸易证书，即可按证书规定到目的国进行贸易，不再对始发港加以限制。在海船离港前，市舶司还要派官吏到船上进行检查，防止违禁物品（铜钱、武器）和违禁人员（妇女、奸细、逃兵等）出港。在宋初，曾允许商船返回时到非始发港具结，但这样做生出许多弊端，使国家税收流失了不少。后来又恢复了原有的规定，商船必须回到始发港具结。当商船入港时，由巡检司兵士押护进港停泊，并封存货物，等待官员登船验证、点货，以防违禁品入港。

第二，对进口货物“抽解”、“禁榷”、“博买”。商船入港后，装载的货物要交纳实物税。关于实物税征收的比例，各类文献记载的出入很大，大约为十分之一。这种抽税方式被称作“抽分”或“抽解”。在宋代，曾多次调整实物税的税率，并对不同货物按不同的比率征税。有著作记载，对“细色”货物，例如珍珠、龙脑，交纳五分之一的实物税；对玳瑁、苏木等“粗色”货物，只交纳七分之一的实物税。南宋时，因国家财政困难，曾开征百分之四十的实物税，外国商船往往因为实物税过重而减少来港交易。中央王朝还对外商携带的部分货物实行“禁榷”，即由官方买卖，不许民间交易。北宋时期，曾对外商的全部货物实行统购统销。后来禁榷范围逐步缩小，只限于玳瑁、象牙、犀角、镔铁、龟皮、珊瑚、玛瑙、乳香，以后又增加了紫矿。到南宋时期，像牛皮、筋骨等可用于军事的物资，也被列入专卖的范围。对进口商品，政

府还采取强行低价收购的方法，即“博买”。北宋淳化二年（991年），朝廷规定，除专卖的进口商品外，其他货品，凡利润丰厚的官府均要收购一半，按“时价”支付货款。由于官定的“时价”很低，进口商往往无利可图，因而对这一政策十分不满。

第三，禁止权贵官吏参与海外贸易。为了保证中央财政的收入，中央政权多次严厉禁止地方官吏参与海外贸易活动。不少地方官吏为了获取丰厚的利润，凭借权势私自进行进出口贸易，低价收购珍稀商品。为了打击这类活动，朝廷多次下令，严禁官吏私自参与海外贸易，凡进行这类贸易活动的一律以贪赃论处，但往往收效甚微。南宋将领张俊就出资50万贯钱，私自雇人造船泛海，进行贸易，获得了几十倍的利润。

元代市舶司管理制度更加完备，也更加严格。元朝对进出口货物控制也很严，市舶司规定金、银、铜、铁、男女人口不准出口。以后又根据国内价格和军事需要规定丝棉、缎匹、销金、绫罗、米粮、军器不得出口。在商船起航时，地方官吏要上船查验大小船内有无携带违禁的货物和私自出海的人员。这些官吏在查验后也要签署文状，如在查验时有疏漏或作伪，则要被革职法办。

元朝对进口货物也收取实物税，与宋朝大同小异。元朝取消了统购（禁榷）和低价收购（博买）的办法，但提高了税率，仍然严厉禁止地方官吏进行海外贸易。虽然允许诸王、驸马、权豪、僧道、也可里温（基督教士）、答夫蛮（伊斯兰教士）从事海外贸易，

但要按统一的税率交税。

明朝初年，朝廷采取了严厉的海禁措施，朱元璋曾下令“片板不许入海”，因而大规模的民间海外贸易活动几乎停顿。虽然私下的海外贸易活动仍在进行，但因严厉的制裁措施而受到极大的限制。明成祖朱棣当政后，虽积极开展官方的海洋外交，使官方的海外贸易活动有所发展，但仍然禁止民间的海外贸易。他曾下令严禁福建沿海居民驾船出海进行海外贸易。隆庆元年（1567 年），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上书请开海禁，东西洋的海上贸易才得以恢复。明代的“东洋”是指吕宋、苏禄诸国，西洋则是指交趾、占城、暹（音 xiān）罗等地。海禁开放后，朝廷仍然对民间海外贸易进行限制，措施之一是采用“引票”制度。凡出海贸易的船只必须提出申请，以获取一张官方批准的引票。引票必须注明海商的姓名、籍贯、船舶情况和要进行贸易的地区等事项。而且全国发放引票的数量非常可怜。隆庆年间全国的引票仅 50 张，各地只能分到二三张；到了万历年间才增至 100 张。明朝廷对出海贸易还课以重税，税种很多。有“引税”，即申请出海而交纳的税金；“水饷”，以船的容积为标准而收取的船税；“陆饷”，对进口货物抽取的实物税。朝廷还规定对出海进行贸易的人实行“联保制”，出海人如果犯法，会株连为其担保的亲友。

清朝，对海外贸易也采取种种限制。朝廷规定，除持有批文、允许出海贸易的船舶之外，如果官民擅自制造两桅以上的大船出海贸易，或租赁给他人进行

海外贸易，都要治罪。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清廷收复台湾后，不再施行海禁，在江、浙、闽、粤设立“海关”，开展对外贸易。乾隆年间，又相继增设山海关、津海关，与江、浙、闽、粤的海关并称六大海关。这一时期，中外贸易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清廷对民间海外贸易仍有种种限制，在一个时期内限制大宗商品丝和茶的出口，限制商船出海的数量。这些限制使中国的对外贸易以及相关的产业发展迟缓，远远赶不上西方国家的发展速度。

八 祖国的南大门广州港

广州港是我国历史最为悠久的港口之一，地处珠江三角洲，东江、西江、北江在这里汇合。亚热带的地理位置使这一地区温暖多雨，气候适宜，物产丰富。珠江三角洲盛产丝棉织物、贵重木材，是重要的稻米、蔗糖产区，矿业、陶瓷业也十分发达。广州港西连广西、贵州、云南，东达福建，南临大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通向东南亚、印度洋、波斯湾的海上起点，是祖国海疆的南大门。

春秋战国以前，广东的土著居民是“百越”。广东及附近地区被称为岭南，即“五岭”之南。五岭是指横亘于湖南、江西、广东、广西交界处的越城、都庞、萌渚、骑田、大庾五岭。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开凿灵渠运输军队粮草，占据了岭南广大地区，设立了南海（今广州）、桂林（今广西桂平西南）、象郡（今广西崇左境）三郡。秦末汉初，割据势力赵佗及其后代统治了岭南90年，自称南越武王，都城就设在番禺（今广州），国名叫南越国。

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统一了岭

南，设置了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诸郡，又在海南岛设置了珠崖、儋耳两郡。

秦汉时期，番禺已是犀角、象牙、翡翠、珠玑的重要集散地。据《汉书》记载，元始二年（公元2年），黄支国曾自3万里之外贡献犀牛。据考证，黄支国地处今印度次大陆。番禺是汉代著名的大都会，因为临海，海陆交通十分方便，因而汇聚了四面八方的财宝，如犀角、象牙、毒冒（玳瑁）、珠玑、银、铜、果、布等。考古发掘也表明，秦汉之际，番禺地区与海外已有广泛的贸易联系。在西汉墓葬出土的玻璃珠，其中铅钡含量很少，与国产玻璃差别较大，而与西方国家出土的玻璃倒十分类似。

番禺通往各地的航路已经开通。《史记》记载，汉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东越王馀善自东冶（今福州）出兵8000人，准备沿海路去番禺，协助汉王朝征讨南越国。由于大风和其他原因，东越军队停泊在揭阳（今广东揭阳）并未参战。但可以看出，当时从今福州到广州的航路已经开通。《汉书·地理志》第一次写到从中国大陆南部沿海乘船可以到达东南亚、南亚等国。在西汉墓中，曾出土一些托灯陶俑，有男性也有女性，看其相貌肯定不是汉人，而是深目高鼻、下颌突出、须发发达、缠着头、裸露上身、下身穿着筒裙的异地人。学者们推测，他们可能是来自西亚的奴隶。

三国时期，岭南逐步成为东吴的势力范围。东吴也很重视岭南的建设，曾发动征讨珠崖、儋耳（今海

南岛）的战争，把儋耳、珠崖与日南、九真、交趾划归交州管辖。

秦汉时代，已有了能建造50吨至60吨船舶的造船台，船舶已装备帆、锚、舵等设施，番禺与东冶等地是制造海船的基地。

由于东西方海上通路的开通，中西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东晋去天竺（今印度）取经的中国僧人法显，回程时走的就是海路。他自师子国（今斯里兰卡）返回，途经耶婆提国（今爪哇岛），原准备从广州上岸，结果因大风被吹到山东半岛才上岸，终于回到了祖国。大秦国的使者曾经从海路来广州，贡献珍宝，其中最吸引人的是“火布”，即火浣布。这种布不用水洗，只要用火一烧，就洁白如新了。当时的人觉得很奇怪，以为布是用生长在火中的一种鼠类的毛编织的。现在我们知道，这种布是石棉布，是用一种软化的矿物纤维编织的。

唐代是广州港最为繁荣的时期。广州港的名字不仅国人知晓，而且远播海外。早在9世纪，阿拉伯人伊本·库达特拔在《道程及郡国志》中就提到了广州港，把广州称为“康府”，说这里盛产各类水果、菜蔬、小麦、大麦、米和甘蔗。在这本书里，他还记述了当时从波斯湾出发，沿印度半岛，缅甸沿海，出暹罗湾，经林邑到达广州的航路。

据史料记载，当时聚集在广州港的各国船舶很多，有昆仑舶、婆罗门舶、师子国舶、大食舶、波斯舶、番舶等。李肇的《唐国史补》中说，师子国舶最大，

上下数丈高，船中积满了宝货。唐大历五年（770年），由于岭南节度使李勉治理有方，一年内进港的海船竟达4000艘。

当时各国的货物在广州港堆积如山。有个叫王虔休的人描写说，港内的大船装满了各种各样的奇珍异宝，外国商人的售货场鳞次栉比，中外贸易十分活跃，因而这个地方的人比其他地方的人富裕得多。有学者考证，当时侨居广州的外国人多达10万，他们的居住地叫“蕃坊”。阿拉伯商人、旅行家苏莱曼在《东游记》中说，中国政府为外国人划定了居住地，依照他们的习俗建立了回教教堂，任命回教判官进行管理。因为判官很正直，一切按可兰经及回教习俗行事，很受居民的拥戴。

唐代，从国外输入的产品主要是珠贝、象牙、犀角、紫檀木、香料、药材等，中国的大宗出口货物是瓷器、丝织品和茶叶。近年来，在西亚、北非的许多地方都发现了中国的瓷器，其中许多是唐代输往那里的。

在唐代，沿海的港口建设有了很大发展，能够停泊大型船只。唐朝僧人玄应在《一切经音义》中记述，当时能建造“苍舶”，船长20丈，能载600余人，船体非常坚固。波斯湾的风浪很大，只有中国船只能够畅行无阻。李珣的《海药本草》中记载，唐代的波斯商人在有了一定的财力之后，就向中国船商租赁或订购泛海巨舶。由于中国制造的船舶太大，无法进入中亚的一些港口，只好用小船把货物运进港内。

为了管理好进出口贸易，唐朝廷最先在广州任命了海外贸易管理官吏——市舶使。苏莱曼在《东游记》中记述，外国商船抵达广州码头后，当地官吏先把货物全部监管起来，待按货运量的比例征收百分之三十的关税之后，再把货物还给货主出卖。

在宋元时代，广州仍然是全国最重要的港口。根据宋代人赵汝适记载，广州港与今印度支那半岛、马来半岛、印度尼西亚诸岛、印度次大陆、阿拉伯半岛以及波斯湾等地的50多个国家保持着密切的经贸联系和人员往来。

进出口货物的种类很多。“细色宝货”包括珍珠、象牙、犀角、翠羽、珊瑚、玛瑙、琉璃、琥珀等材料与制成品。香料、药材包括乳香、沉香、檀香、丁香、龙涎香、安息香、蔷薇露、没药、莳萝、豆蔻花、益智子、血竭、苏合香油等。金属及其制品有金、银、镔铁等。纺织品有毛纺布、驼毛布、木棉纱等。工业原料有水晶、火油、硫磺、苏木等。此外还存在贩卖奴隶的活动。

当时，中国出口商品主要是各类丝绸，受到各国人民的喜爱。陶瓷制品也是输出的大宗商品。这些商品到了异国他乡，不仅被当作实用器具，而且被作为工艺品摆设在案头让人们观赏。在中亚、北非的王公贵族家里，各类瓷器还被作为装饰品镶嵌在宫殿的墙壁上，以显示主人的高贵和富有。另外，茶叶、漆器、雨伞、木梳、绢扇以及各类铜器、金银器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出口商品。

宋代，广州沿海地区不仅有陆军驻守，而且派驻了海军。海军有2000人，负责巡检、护航，打击私盐贩和海盗。

到了元代，广州港的地位有所下降，泉州港成为全国最大的港口；但广州港仍是中西方贸易往来的重要港口，港口附近一片繁荣景象。据《羊城古钞》记载，内港西澳（南濠）一带香珠犀象堆积如山，花鸟如海，外邦人汇聚此地，每天消费的金银数以千计，街市上店铺众多，饮宴歌舞，超过了昔日秦淮的繁荣。

明清两代，虽然朝廷曾实行严厉的“禁海”，使中国海运业、港口建设的发展受到限制，但海外贸易活动从来没有完全停止过，尤其是民间贸易更是如此。

16～17世纪，西方人绕过好望角来到东方。葡萄牙人于明正德九年（1514年）来到中国，在广州外港屯门竖立了一块石碑，作为“发现”中国大陆的纪念。

到达中国的葡萄牙殖民者竟然干起了掳掠人口、贩卖人口的可耻勾当。一个中国人的“价格”只有百文钱。葡萄牙人的可耻行径激起了中国民众的极大愤慨。

正德十六年（1521年），中葡之间爆发了屯门海战。广东海道副使汪鋐率军民用柴草淋上油脂，顺风延烧葡军战船。勇敢的中国军人还潜水接近敌船，将葡军舰船凿沉。残余的葡舰被迫逃离海岸。嘉靖元年（1522年），葡军舰入侵西草湾，明军指挥柯荣率领水师痛击来犯之敌，取得海战的胜利，缴获了敌舰舰载

火炮，保卫了祖国的领海主权。

嘉靖三十二年（1553 年），葡萄牙殖民者借口要晾晒被海水打湿的货物，通过贿赂，以每年缴租银 500 两的代价，租借到澳门（濠境）。该地以后发展为重要的贸易港口。由于澳门是广州港的外港，大量中国产品通过澳门运往世界各地，外国“每一舶至，常持万金，并海外珍异诸物，多有至数万者”，因而广州港的海运和港口发展受到阻碍。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朝廷设立了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江海关，管理对外贸易并征收关税。粤海关有“总口”7 处，设有总口委员。关税分船钞（船税）、货税两种，除此之外还征收“规礼银”和其他附加税。各级官吏贪污勒索成风，各种附加收入有时竟是正当税收的两倍。

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清朝廷封闭了闽、浙、江 3 个海关，粤海关成为全国对外通商的惟一口岸。粤海关货物吞吐量成倍增长，海关收入大大增加。

在与西方贸易中，出现了一些作为中介的买办商人。清廷为了防止中国人与洋人接触，也鼓励这些专门从事洋货买卖的商行发展。于是，出现了对外贸易的中介机构“十三行”。按清廷规定，外国商人只能通过十三行与中国商人进行交易。由于十三行是官方扶植的，带有一定的垄断性，因而发了大财。其中一部分财富通过“报效”、“捐输”的方式转入中央财政，也有些进了各级官吏的私囊。

但是好景不长，由于官府压榨和外国资本的介入，

不少商行负债累累，一些商行因此而破产。

自雍正年始，外国商船商人大量拥入广州，并纷纷在广州建立商馆（见图3）。雍正六年（1728年）法国商馆建立，雍正七年（1729年）荷兰商馆建立，雍正九年（1731年）丹麦商馆建立，雍正十年（1732年）瑞典商馆建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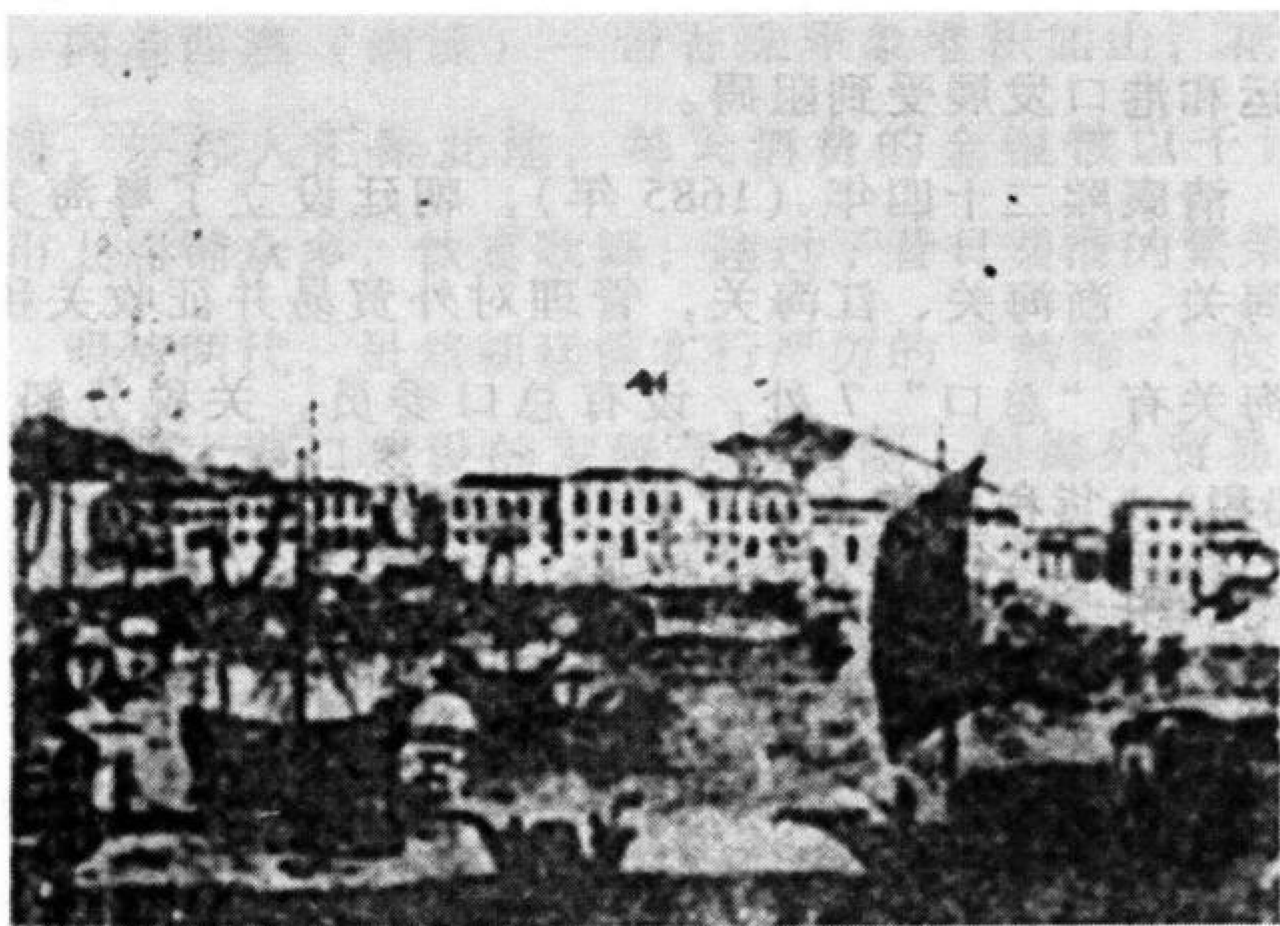


图3　1780年时的广州商馆

由于广州港是全国惟一的对外贸易港口，因而全国各地的出口货物都要运到广州。货物的品种有80余种，其中有福建的茶叶、樟脑、漆器、矿产品，浙江的丝织品、纸、扇子、酒，东北的人参、皮货、麝香，西北的黄金、水银、锡、宝石等。湖北、湖南、江西、四川等地也有大量商品运抵广州，而后装船出港，运往世界各地。

这时，外国的商品也试图大量进入中国。但由于

中国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某些外国商品虽然质量好，却很难打入中国市场。中国对外贸易有大量盈余，大量白银（银元）从印度、欧洲、美洲流入中国。于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偷运鸦片进入中国，毒害中国人，并使中国白银开始大量外流。广州港是不法外商走私鸦片的主要港口，中国官吏大量受贿，使鸦片销售之风愈演愈烈。外国人讽刺说，此地的官吏一个“干净”的也没有。吏治腐败、军队废弛。土地兼并、鸦片泛滥使中国社会动荡不安，国家一步步走向衰落。

九　十洲人汇聚的泉州港

泉州是一座美丽的历史文化名城，坐落在福建晋江的下游，依山傍海，风景绮丽。晋江流贯泉州全境，穿城而过，注入泉州湾。湾内有突入海中的半岛，又有曲回弯转的港汊。这样的地形为船舶避风挡雨、碇泊装卸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因而自古以来在泉州海岸线上就分布着一个又一个海港。

泉州港形成的时间很早，但由于史料湮没已无从稽考。泉州港第一次被载入史册与一个来华传教的印度僧人有密切关系。在南北朝时，有一个名叫拘那罗陀的印度僧人来到泉州，在风景优美的南安九日山延福寺从事《金刚经》的翻译工作。他曾经从泉州出发游历南京，又向南到达豫章临川（今江西抚州）。他还从泉州南渡准备去棱加修国，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去成。他又返回泉州，后乘海舟回国。从拘那罗陀的旅行我们知道，早在1400年前，泉州就是海外交通的重要港口。到了唐代，泉州真正兴旺起来。丝织业、瓷器制造业是泉州主要的产业，盐业、冶铁业也有重要的地位。这时，中亚的阿拉伯人也开始了他们东方贸

易的远征，海船从中亚运来了香料、药材，又从中国运去了丝绸和瓷器。频繁的贸易往来使泉州成为真正的国际都会，居住在泉州的外国人很多，形成“市井十洲人”的盛况。

泉州的造船业由于繁荣的航运业变得更为发达。据文献记载，唐天宝年间（742～756年），泉州可以制造长18丈、面宽4丈2尺、高4丈5尺、底为尖圆型、桅高10多丈的大型船舶。这类船的底舱互相分隔，可载货2万～4万石。泉州造船的规模也很大，唐乾符年间（874～879年），一个叫林灵的大商人一次就定购百艘大舟，用于海上运输。

泉州港的港口设施也非常完备。根据记载，为了船舶进港的安全，曾在泉州南部安海港设立7座石塔，作为船舶进港的标志。由于地理位置优越，港口设施完备，泉州成为中外海上贸易的枢纽，得到“舟楫之盛，莫过于晋南”的美誉。

到了南唐，原泉州指挥使留从效在纷乱的政治斗争中崭露头角。他在掌握政权之后，对泉州进行了一系列的整治。他主持扩建泉州城，加宽了街道，兴建了不少客栈、码头和库房，并在环城种植了美丽的刺桐树。火红的刺桐花映衬着泉州分外美丽。由于大规模的扩建，泉州城在中外海运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刺桐城”的名字也蜚声海外。

1974年在泉州后渚港出土了宋代的远洋货船，这是目前考古出土形体最大的海船。从出土的海船可以看出，宋代制造的海船已十分先进：船首狭，船底尖，

增加了海船的抗风浪性能；甲板较宽可以多载货物；多重外壳增加了船体的强度；13个舱位使船的抗沉性大为提高。这只海船已装备了升降舵，有多个桅杆，密闭水平很高，显示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高超的技术水平。

宋代，泉州与海外30多个国家有贸易往来，形成了比较固定的航线。比如到阇婆国（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史书记载，相对泉州，阇婆国在“丙己”方向，应在冬月起航，乘北风，如果顺风的话，昼夜行驶，月余可到。泉州与西亚的关系也很紧密，自泉州到大食（阿拉伯诸国）大约要花费两年的时间。尽管如此，大批穆斯林商人和传教士还是通过海路到达泉州，有些人还在此定居下来。

当时，自泉州输往国外的大宗商品有瓷器。在日本、马来西亚、印尼、印度的博物馆里都珍藏着晋江德化窑的产品。输往国外的产品还有各色丝、绢、缎、锦、帛等。金属制品有铜器、铁器、金银器皿和锡制器皿。农产品有茶、糖、大米等。此外，漆器、雨伞、草席、各类药材和各类文具也是出口商品。

元代，不少西方人士进入中国，其中著名的人物有意大利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他的《马可·波罗游记》是一本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著作。

马可·波罗是这样记述泉州的：“（离开福州以后）到第5天傍晚，抵达宏伟秀丽的刺桐城。在它的沿岸有一个港口，以船舶往来如梭而出名。船舶装载商品后，运到蛮子省各地销售。运到那里的胡椒数量非常

可观。但运往亚历山大供应西方世界各地需要的胡椒，就相形见绌，恐怕不过它的百分之一吧。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的确难以想象。每一个商人，必须付自己投资总额百分之十的税收，所以，大汗从这个地方获得了巨额的收入。”

另一个叫伊本·巴图塔的摩洛哥人这样记述泉州：“渡大洋后，所至第一城，即刺桐也。”“刺桐城极扼要，生产绸缎，较汉沙（杭州）及汗八里（大都）二城所产者为优。刺桐港为世界上各大港之一，由余观之，即谓为世界上最大之港也不虚也。余见港中，有大船百余，小船则不可胜数矣。此乃天然之良港为大海伸入陆地，港头与大川相接。城内每户必有花园及空地，居屋即在其中央，正犹吾国之赛格尔美撒城内情形。”

在中国文献中，关于元代泉州港的发展也有记载。在《岛夷志略》这部书中记载的与泉州有贸易联系的国家和地区，比宋代《诸番志》记载的多出 30 多个，可见泉州港当时是多么兴盛。

元末的战乱和明初的海禁，使泉州这个海外贸易的大都会衰落了。明洪武三年（1370 年），泉州复设市舶司，限定只能与琉球进行交往。琉球是个小国，贸易量有限，这大大限制了泉州对外贸易的发展。

随着市舶司迁往福州，泉州港逐步衰落，但在民间海运贸易中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泉州的私商十分活跃，足迹遍于天下，“南海明珠，越裳翡翠，无所不

有；文身之地，雕题之国，无所不到”。他们把本地产的蔗糖、水果、纸张、纺织品等输往全国各地，又把各地的丝、棉、大米和其他日用品带回泉州。不仅如此，泉州私商还把经营的范围扩展到海外，在东南亚市场上经营生丝、陶瓷等，与日本商人、西方商人进行贸易，展开竞争。

明、清之际活跃的私商活动，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国内外经济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也使得泉州港作为民间商港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十　东海门户明州港

明州包括今天的宁波、慈溪、奉化、象山、鄞县、定海和余姚地区。早在7000年前，河姆渡的居民就在这块富饶的土地上生息繁衍。周秦时代，这里已有了造船、丝纺和制陶等发达的手工业，与海外有了贸易往来。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这一地区发现了不少水晶、玛瑙和琥珀制品，据研究都是海外的舶来品。

到了唐代，州治迁到了鄮（音 mào，今浙江宁波）。明代，因州名与国名相同，故改明州为宁波。宁波又叫甬，因境内有甬山、甬江而得名。明州三江口一带筑有海运码头，是中外船舶聚集的地方。

明州港是中日贸易的基地。江浙一带盛产丝、锦、绢、麻布、葛布、棉布等纺织品，其中最负盛名的是“吴绫”、“交梭梭”。这些纺织精品大多是进贡的物品，也有部分产品流入日本。江浙一带还盛产瓷器，产于明州慈溪一带的越窑瓷是中国的珍品。越窑瓷质地晶莹剔透，如玉似冰，令人爱不释手，为中外人士所珍藏，成为日本王公贵族争购的“唐货”。明州的产品不仅销往日本，而且向北销往高丽，向南销往占城

（今越南南部）、阇婆（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宋元时代，明州港进入最为兴盛的时期，成为东方著名的“第一码头”。

东渡门一带的码头是明州最重要的码头。通过近年的挖掘，昔日东渡门码头的昌盛景象又一次展现在人们面前。已挖掘出的宋代码头长约 15 米，残存宽度约 2.8 米，残高 0.68 米，建筑材料为长条石块。为了防止码头基础倒塌位移，在底部打下了成排的木桩。为了保护码头，自唐开始在港口外缘修筑了防波堤——后海塘。后海塘在招宝山西，经过历代增修，高约 8～9 米，全长 3600 多米，成为抗风挡浪的“守护神”。码头还建有主管税收的机构和储物的仓库，为中外海运贸易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明州港是中国开展东方贸易的门户。定海位于明州港的最外侧，是外来船舶首先抵达的地方。定海主航道两侧的招宝山和金鸡山，是拱卫定海的两座天然屏障。明州港与日本诸岛隔海相望，天涯若比邻。

正因为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所以自古以来中日两国人民就彼此往来，进行各方面的交流活动。

据汉文献记载，在公元前 1 世纪，日本列岛形成了许多小酋长国。《三国志・倭人传》记述：“倭人在带方（今朝鲜凤山附近）东南大海之中，依山岛为国邑，旧百余国，汉时有朝见者，今使译所通三十国。”据《后汉书・东夷传》记载：“建武中元二年（公元 57 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授。”这枚由汉王朝赐予的金印，在

埋没了千百年后又重见天日，于1784年春被北九州福冈县志贺岛的一个农民掘地时发现。这枚金印约2.3厘米见方，厚0.8厘米，重约108克，金质蛇纽，阴文篆书着“汉委奴国王”五个字。

隋唐以前，日本人乘船到中国大陆大都沿北航线行驶。据《后汉书·东夷传》记载，建武年间（公元25~56年），辽东太守祭肜威震北方，声名远播海外，于是秽（音huì）、貊、倭、韩等外邦不远万里前来朝觐贡献。日本贡使的朝觐路线是穿越对马海峡，沿着朝鲜半岛、辽东半岛沿岸，进入中国大陆。《三国志》中记述了从中国至日本的海路：从郡（带方郡）至倭国，要“循海岸水行，历韩国，乍南乍东，到其北岸狗邪韩国，七千余里。始度一海，千余里至对马国”；“又南渡一海，千余里，名曰瀚海，至一大国”；“又渡一海，千余里至末卢国”。隋及唐初，中日两国官方、民间的交往非常频繁，互派使臣，所走的航路大致也是北路。

大约在唐代中叶，从南路抵达日本的航路开通了。著名的鉴真和尚就是这条航路的探索者之一。唐天宝十二载（753年），日本第10次遣唐使在回国前至扬州拜访鉴真大师。这时鉴真已66岁了，虽然历经5次渡海失败，但为了弘扬佛法，毅然答应日本使者的邀请，再次准备渡海赴日。在弟子的帮助下，鉴真大师于10月29日晚由龙兴寺至江头，乘舟出大运河，入长江。与日本遣唐使船队会合后，于11月16日驶入东海，奔赴日本。船队进入东海后即有1只船被风吹

散，不知去向。剩下的3艘船，经过艰苦航行，于11月21日先后抵达今冲绳。12月6日，船队乘南风起航，又有1艘船触礁。在以后的航行中，又经历了1次大风暴，以致“不知四方”。在饱尝颠簸之苦之后，鉴真一行凭借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终于到达了萨摩国阿多郡的秋妻屋浦（今日本鹿儿岛）。鉴真东渡不仅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也使他成为成功地开辟大陆与日本列岛南部航线的探险家之一。自唐代中后期，跨越东海从南路到达日本已是很经常的事情了。

大陆与日本之间南部航路的开通，减少了往返的时间，大大加强了两国的联系。这条航线的基本走向是，自明州港出发，横越东海，先到达日本南部肥前值嘉岛，然后再北移至日本本土。

宋、元、明几代，明州港是与日本联系的枢纽港。据文献记载，南宋时，由于日本政府的支持，有时一年驶往中国的商船有四五十艘，大多数日本商船都驶入明州港。当时从日本输入的货物分为“细色”和“粗色”，细色有黄金、珍珠、水银、鹿茸、茯苓等，“粗色”有硫磺、杉木板、松木板等。中国输入日本的货物主要是瓷器、丝绸、香料、药材、书籍等，还有大量铜币。

元代，庆元（宁波）港离日本最近，因而中日海上贸易主要是通过庆元港实现的。

到明代，由于倭寇侵犯中国海疆，朝廷一度实行严厉的海禁。嘉靖四年（1525年）朝廷下令，凡海上航船有双桅杆的一律缉捕，所载货物即便不是外国

货也按运输外国货论处，船员一律流放到边疆去戍边。直到嘉靖后期倭患平息，海上对外贸易才逐步放开。

明代，宁波港是对日贸易的惟一港口。当时，日本输入中国的大宗货物有硫磺、铜、苏方木，还有日本制造的刀，其中硫磺多时可达30万斤。中国向日本输出的主要是铜钱、生丝、绸缎、药材、瓷器、书籍等，其中以铜钱、丝绸输出量最大。

清朝在平定台湾之后，采取了有限开放海外贸易的方针。然而日本对海外贸易加以种种限制，规定每年进入宁波港进行贸易的海船不得超过14艘，即春季9艘，夏季4艘，秋季1艘；对贸易额也加以限制。直至1717年，两国贸易发展迟缓的状况才有所改变，日本对华贸易的船只有所增加。

在中日贸易史上，也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明嘉靖二年（1523年），日本宗设、瑞佐两个贸易使团先后到达宁波。为了争夺验货的优先权，两个使团发生了对立，互不相让，竟然在一次宴会上互相吵骂，动武厮杀。结果，宗设杀了瑞佐。日方使团的争斗，引起宁波的一场骚乱，接待外宾的宾馆被毁，库房被抢。宗设在追杀中沿途杀人抢劫，在霍山洋竟杀死中国备倭都指挥、千户、百户等官吏多人，引起了朝野上下的震动。明朝廷遂撤消了设在宁波的市舶机构，禁止与日通商。

明州港是中国东海对外开放的门户，在海疆开发史中有重要的地位。（见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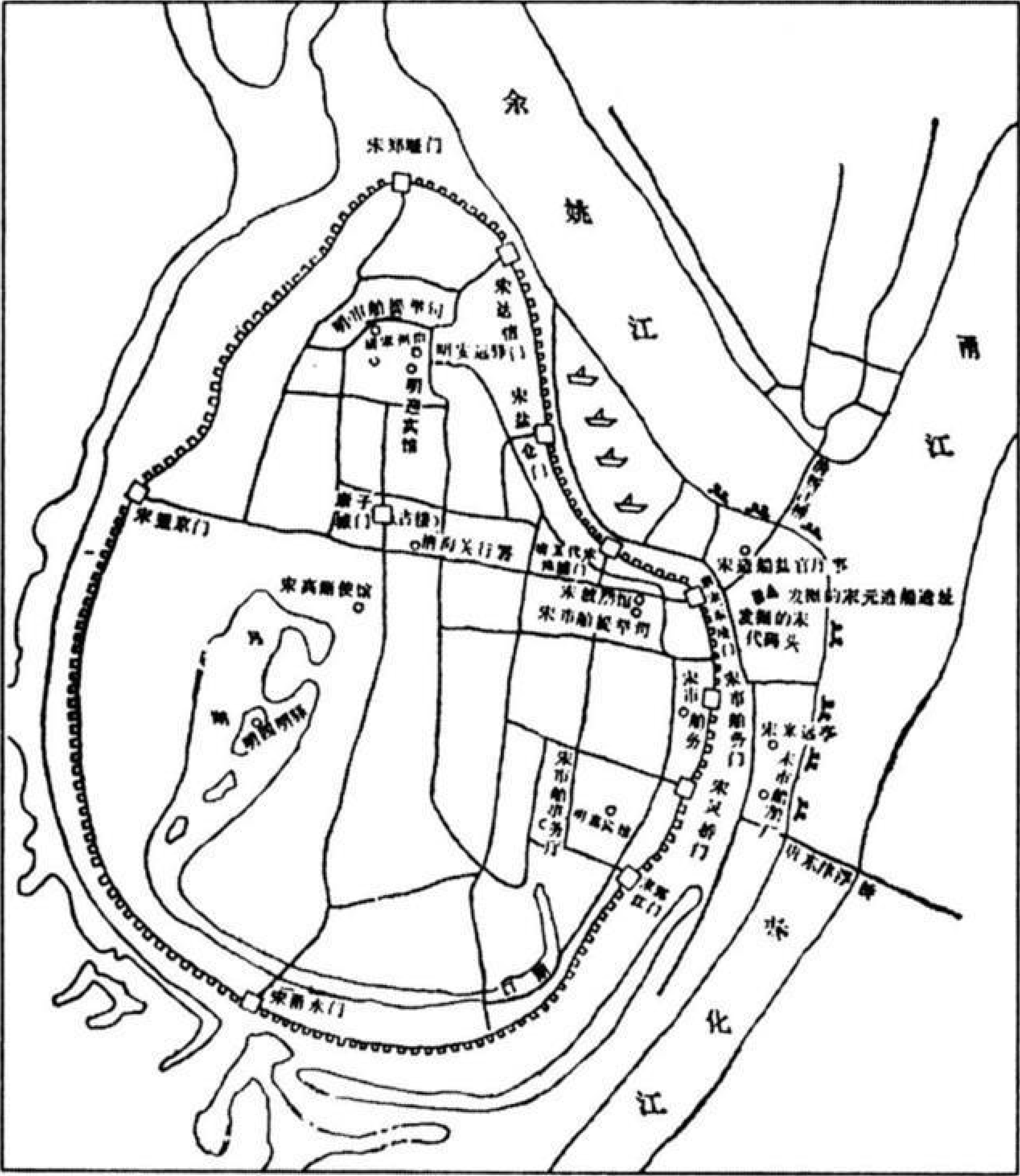


图4　古代明州（宁波）港示意图

十一　海上运输与北方良港

在中国历史上，政治中心大多在北方。为了与海外各地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就需要建立通向海洋的大门。因而，在淮河河口以北绵长的海岸线上，分布着许多海港。

琅邪是北方著名的港口，在春秋战国之际就是齐、鲁重要的出海口岸。《管子》中记载："齐桓公将东游，南至琅邪。"《韩非子》中说："（齐）景公与晏子游少海。"景公海上旅行的路线是经"转附"（今山东芝罘）、"朝舞"（今山东荣成召石山，一说成山），然后循海岸线向南，至琅邪。越王勾践为争霸中原，率领戈船300艘、死士8000人远征琅邪，"起观台，台周七里，以望东海"，并以琅邪为国都。另外在山东半岛及其附近地区还分布着黄、沿、成山、芝罘等重要港口。

碣石港是渤海沿岸另一个重要的海港。有学者考证，春秋时代，齐桓公北伐令支（今河北迁安县西）、孤竹（今河北卢龙南）等国，纠集诸侯救助燕国时，在动用陆军的同时，也动用了齐国发达的水师。这使

得燕国的沿海水上力量也发展起来。

“碣石”名字最早出现在《尚书·禹贡篇》中。《禹贡》中有“岛夷皮服，夹石碣石入于河”之句，意思是说，沿海一带的小邦国进贡时，可以沿碣石进入黄河，转运至禹都。据文献记载，战国时，碣石是“燕塞”，是燕昭王当年“入海求仙”的出发点。经考古发掘，在今北戴河海滨联峰山到金山嘴一带，曾发现秦汉及以前的宫殿、城池、烽墩等遗址，也曾出土过燕国的刀币。因而不少人推测，“碣石”很可能是指这一地区临海的一座山丘。

秦统一全国后，为了抵御北方劲敌匈奴，曾在燕赵长城的基础上修筑了万里长城。碣石北侧燕长城的加修，使当时右北平、辽西、辽东一带出现了相对安定的局面。加之从秦都咸阳（今西安市西北）沿北部长城关隘九原（今包头市西）、云中（今呼和浩特市西南）、雁门（今右玉县）、上谷（今怀来县）、渔阳（今密云县）、右北平（今天津蓟县）达碣石的驰道修通，使碣石港的地位更为重要，成为北接辽西、辽东，东航朝鲜，南达齐、鲁，西接内地广大地区的重要枢纽。

秦始皇在“示强威、服海内”、寻仙访药的东巡活动中，曾在公元前 215 年到达碣石。秦始皇的儿子胡亥在公元前 209 年也到碣石进行“巡幸”活动。汉武帝更是多次到达碣石港，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元封元年（公元前 110 年）。当年，汉武帝刘彻从海上乘舟到碣石，从辽西沿北部边疆到九原，再回到长安，历程一

万八千里，也可谓是一次“万里长征”。

在汉代，芝罘、沓氏（今大连）、碣石是渤海沿岸三大军港。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三年汉对卫氏朝鲜的战争中，碣石海港是水陆运兵、运送物资的重要转运站。碣石港的形成开辟了对外贸易的窗口，当地的鱼、盐、枣、栗等产品是主要外运的产品，而齐鲁之地的漆、布等手工艺品也通过碣石港输往中国北方广大地区。

曹魏时代，碣石也是海、陆交通枢纽。曹操在平定了东北乌丸之后，沿辽西走廊回师，登临碣石，留下了千古名作《观沧海》。据记载，北魏文成帝拓跋濬、北齐文宣帝高洋、唐太宗李世民都曾登临碣石，巡视海疆。

唐贞观十七年（643年），为了援助新罗抗击高丽、百济的联合进攻，太宗李世民亲自到辽东前线督战，连下数城，在安市城打败了高丽数十万军队。在这次战争中，唐王朝不仅动用了陆军，也动用了舟师；不仅采用陆路运输，也采用海路运输。这次战争结束后，唐太宗与其子会师于今抚宁县榆关西“接驾坡”，并在今北戴河滨“刻石记功”。在唐代，渤海沿岸港口十分繁忙，东吴一带的稻米从海上运来，又扬帆转运至辽东。因而杜甫写下了“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的诗句。为了加强港口和海运的监管，唐王朝为辖制河北道的地方官加上“海运使”的官衔，使之对港口转输等事务进行管理。

元代，因南粮北调的需要，渤海沿岸港口又一次繁

荣起来。武宗至大二年（1309 年）海运粮食 246 万石，文宗天历二年（1329 年）达 352 万石。为了运送这些粮食，朝廷每年调集的船舶达 900 余艘。这些粮食主要在直沽（今天津东）上岸，再转运华北、辽东各地。

天津港的历史也非常久远。西汉时，在今天津市武清县西南有一个叫泉州的地方，东临渤海，北面有濡水（今滦河）、鲍丘水（今潮白河上游）、沽水（今北运河）、治水（又称漯水）流过，南部有泒水（今海河尾）、滹沱水（今滹沱河）、漳水、清河（南运河）流过。这些河流都在泉州附近注入渤海。这样的地理环境，为海河联运创造了条件。

三国时期，曹操北征乌桓，自建安十一年（206 年）起，先后开凿了白沟渠、平虏渠、泉州渠、新河渠，以便运送粮草等军用物资。泉州渠的开凿，沟通了耿河和沽水。四条人工渠修成后，使滹沱水、漳水等汇流北上，华北各大水系互相沟通，于今天津附近入海，形成了海河运输水系。

由于隋时开凿的运河冬季结冰，唐代南方的粮食经常要通过海路运输，以供给在蓟州（今天津蓟县）驻守的大量军队。因此，在当时海河入海口处有一座“军粮城”，是军粮转输的集散地。

经考古发掘，在今天津市军粮城刘家台子出土了大量唐代的随葬品，特别是大量陶俑。从形态看，这些陶俑有奏乐的，有胡人相貌的，有为人奴仆的，有人首鱼身的，栩栩如生。说明当时的军粮城已是个人口密集、四方辐辏的港口城市。

到了金元时代，地处海、河要冲的直沽寨兴盛起来。由直沽港起航，漕运船舶沿潞水（又称潞河，今北京市通县以下的北运河）经过通州可达金中都（今北京市西南），沿旧黄河、御河、漳水、滹沱河、拒马河等河流可达今河北、山东广大地区。因此直沽成了北方最重要的港口之一。直沽港转运大多集中在春、秋两季。据史料记载，金大定二十三年（1183 年）漕粮年运量达 170 多万石。为了改善运输条件，泰和五年（1205 年）金章宗完颜璟到达霸州（今河北霸县），发现运河既浅又窄，大量漕船停滞不前，便命令尚书省调动山东、河北、河东的军夫进行扩建，改善了这一段的漕运状况。

元代，海运又逐步发展。至元十三年（1276 年），伯颜入临安，命令朱清、张瑄将南宋的图书典籍自崇明由海道运到京师。至元十九年（1282 年），朝廷命人制造了平底海船 60 艘，载粮 4.6 万石，尝试海运进京。由于航行遇到风浪，第二年才到达直沽，损失粮食 4000 石。海路运输开通后，运输量逐步增多，至元二十七年（1290 年）达到 159 万石，大德七年（1303 年）达到 165 万石，大德九年（1305 年）达到 184 万石，至大四年（1311 年）达到 287 万石，至治元年（1321 年）达到 326 万石，最高峰是在泰定三年（1326 年），运粮达 337 万石。经过不断探索，元代曾 3 次改变航路，终于找到了更加合理的航道，在顺利的情况下，不过十余天就可将南方的粮食从崇明运至直沽，比初期的海路缩短了三分之二。（见图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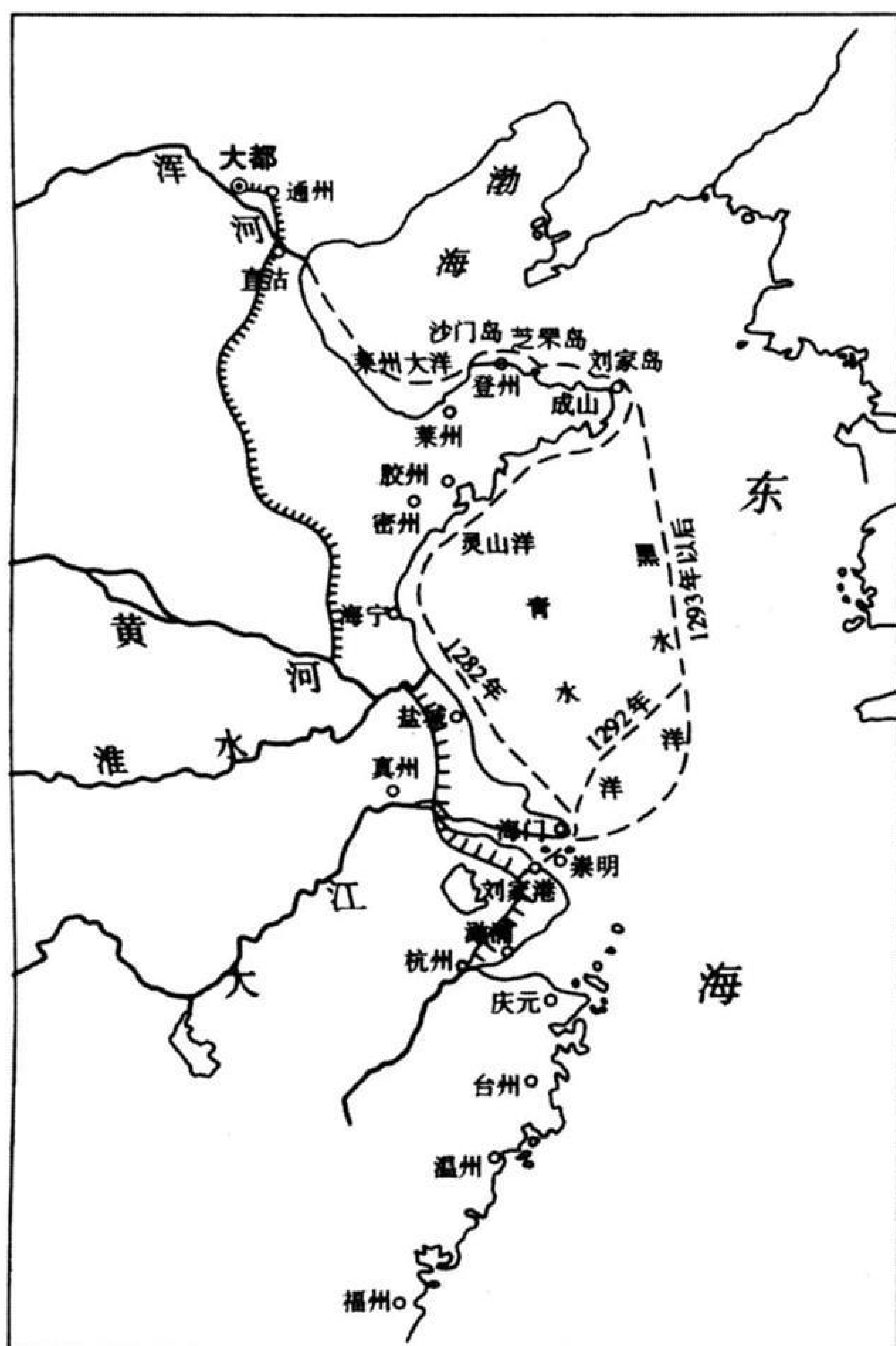


图 5　元代近海漕运航线图

明清两代，天津港也是北方交通枢纽和京师的门户。明万历二十年（1592 年），为了抵抗日本侵略朝鲜，朝廷一面调集军队准备入朝作战，一面调集南方水军防守天津，并把天津作为入朝作战的补给基地，储备粮食，制造军火。天津港因此军事运输异常繁忙。

明初曾施行海禁，不许沿海居民私自出海。但官方海上运输仍在进行，并由军队统一保护。从江、浙、淮、鲁起航的海船运载粮食、军需物资大多汇聚于直沽港；从直沽港开出的船队再直航辽东，补给那里的守军。

明初，由于运河条件改善，从南方运入京师的粮食大大增加。永乐十二年（1414 年）经直沽运往京师的粮食达 646 万石。

宣德七年（1432 年），直沽港转运粮食达 674 万石，创明代最高纪录。为了营建北京，满足宫廷和民间的需要，直沽港还接纳了从南方运来的珍贵的木材、景德镇的瓷器、广东的珍珠、苏州的织锦、浙江的绫罗及水果、茶叶等。天顺八年（1464 年），通过直沽转运的苏杭织物就达 7 万匹。

为了适应大规模运输的需要，历代都采取各类措施对港口进行建设。

北方海岸多为泥沙淤积而成，大型船舶很难抵近码头，必须及时疏浚。元时，直沽航道三岔河口严重淤积，航行受到阻碍。至治元年（1321 年），朝廷调募民工 3000 余人开展清淤工作，1 个月内完成了清淤工程，没有影响当年的漕运。至正十一年（1351 年），直沽又淤积，中书省“给钞数万锭”，“募工万人”，在 3 个多月之内完成了全部工程。

为了船舶停靠，还要建设码头，至今在不少口岸我们仍可看到当年修筑的码头遗迹。平州港泊岸（即码头）是迄今保存较为完好的古码头，相传为隋唐时的建筑。码头沿河岸修筑，用长 5 ~ 6 尺、宽 2 尺、高

1尺6寸的条石砌垒而成，共6层，高约1丈。两条石上横放一条石，条石间用铁榫固定。内侧则用大型砖石砌筑地基，高5尺，宽4尺，上面用土夯实夯平。据记载，当年码头上还有系船缆用的铁桩、石桩。

为了船舶航行安全，港口还建有引航的标志。白天在港口高处树立旗杆，晚间则悬挂红灯。据记载，清道光以后曾设导航杆，杆高3丈多，白天于其上升四方红旗数面，夜间升起一串红灯笼。此时还出现了“转盘探海灯”。探海灯设在高4丈多的三脚或四脚木架之上，木架上设有上下两个瞭望台。两个瞭望台中间有1个同心的圆孔，中间穿置1根长4丈左右的木轴。下面由牲畜拉动旋转，像推磨一样。轴顶端设1个明暗两色的灯。这样，当牲畜围轴转圈时，顶灯也一明一暗闪烁。在夜晚，远处的航船就可以看到明显的灯火航标。

随着大宗货物的到港，开始建设仓库。元代有船户8000余户，海船900余只，大多集中在八、九月份进港。根据“粮食齐足，方许倒卸”的规定，粮食要集中卸船。这时等候卸货的船只排列长达数里。为了使卸下的粮食妥善保存，各码头均建有仓库。至元十六年（1279年），在直沽港口地势较高的地方建设了广通仓。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又增设直沽海运米仓。考古发掘表明，当时除了储存粮食的仓库外，还有存放瓷器和其他物品的仓库。明清之际，仓储规模也很大。明永乐二年（1404年）于天津建筑露天存粮囤1400所，在小直沽建“盖芦囤”208座，河西务建设“盖仓囤”160座。明代在直沽尹儿湾建百万仓，

派天津卫籍兵万人把守。

北方许多港口同时又是重要的军事基地。为了保卫仓库、海港，抵御外侵，在许多海港都设有军事机构，派重兵把守。明代，山海关一带是军事要地。在明末形势恶化时，朝廷乃至全国都关注着山海关的形势，朝廷派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等重臣镇守山海关。仅山海关城内外，就派驻了5镇、14协、36营，包括水军3个营的军队，总兵力达十三四万人。加上统辖的天津、登州、莱州三府的步兵、骑兵、水军，总兵力达二三十万人。派驻这样庞大的军队，支出的军费之巨就可想而知了。自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至泰昌元年（1620年），不足两年工夫，明朝廷用于山海关、辽东的军费开支高达20188366两。驻守山海关的军队和难民生活艰难，有的守兵竟“蓬头裸体”，一般百姓的生活就更悲惨了。他们常要等待海上运来的粮食救济，有时因海船“不继”，还发生士兵逃亡和百姓骚乱的事件。为了保住到港的粮食，朝廷也要派驻军队把守。清雍正年间，尹儿湾百万仓（在今天津北仓以北）划归天津管辖，曾派驻近万人的军队守护。

为了管好到港的物资，朝廷设置了专门的监管机构，派驻官员进行管理。海船到港后，都要经过官方检验，记录船载重量、载运货物的品名和数量、路程远近、船员人数，然后给价，指定卸货的地点。

明朝廷在秦皇岛设立“海运厅”，专门对沿海各港口进行管理，负责接卸、调拨、转运粮食和军用物资，管理口岸仓库等设施。

十二　沿海捕捞与养殖

我国近海海域辽阔，横跨温带、亚热带、热带三大气候带，适于各种海洋生物的生息繁衍，海洋生物资源十分丰富，能为人类提供食用、药用、工业用的鱼类、虾类、贝类、藻类等海洋生物有几千种。

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很早就知道利用海洋生物，从捡拾发展到捕捞、养殖，生产规模逐步扩大。

古代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沿海居民最早的海洋生产活动是捡拾岸边的贝类。考古学证明，早在距今1.8万年前的周口店山顶洞人的生活遗址中就有海洋贝类的化石。到了距今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沿海居民更是大规模地采集贝类。日积月累，被丢弃的贝壳堆积成山。在这些堆积物中，保存了不少古代人类遗物，反映了当时人类的生活状况，因而被考古学家称为“厨房文化”。这类“贝丘”分布很广，在渤海、黄海、东海、南海沿岸都有发现。分布集中的地区包括辽宁旅大沿海、大小长山岛、广鹿岛、海洋岛，山东的龙口，福建的闽江口、金门岛，台湾的圆山、凤鼻头，广东的潮安、南海，广西的东兴，海南岛的陵

水地区等。

贝丘遗址的规模都很大。辽宁小长山岛的贝丘堆积面积300米×500米，厚度0.3～1.5米，蓄积量达7.5万立方米。广东潮安的陈桥贝丘，面积40×80米，堆积的贝壳有几万斤。

贝丘中的贝类有二十几种，主要是蛤仔、魁蛤、海蛏、海螺、牡蛎、文蛤、鲍鱼等。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人们已积累了许多关于采集贝类的知识。贝类的生活习性有很大差别，有的生活在几米深的浅海，退潮时钻入沙中，只保留一个很小的气孔；有的则吸附在低潮线以下的礁石上，只有潜水，利用短暂的水中停留，迅速采取行动才能采拾到。

贝丘遗址的堆积经历了漫长的岁月。经过科学方法鉴定，最早的贝壳距今已有6000余年。例如福建金门富国墩贝丘，底部贝壳的“年龄”大约是6300年，中部大约是5800年，上部则大约5460年。这就是说，古代人堆积这样一座贝壳山大约用了1000年时间。

在这些贝壳山中，保留了许多新石器时代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有石刀、石镞、石斧、石磨盘、石锛、石网坠等，还有烧制的陶罐、陶壶等。从这些遗物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人类当时的生活状况。距今6000年左右的沿海居民们，主要从事渔猎采集活动，用弓箭射杀小动物，用渔网在近海捕捞鱼虾，采集各种贝类。与此同时，也种植谷物，把收获的谷粒用石磨盘磨碎。

渔业是沿海居民重要的生产活动，在远古时代人

们就开始了海洋捕捞。在山东平度的东岳石村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了许多海鱼骨，在胶县三里河遗址中发现了海鱼骨和鱼鳞。在广东沿海遗址中出土了海龟壳和海鱼骨，有的鱼骨很大，很可能是鲨鱼的鱼骨。在浙江嘉兴的马家浜遗址中有鲻鱼骨出土。

在古代文献中，很早就有关于海中捕鱼的记载。

《庄子》一书中有“投竿东海，旦旦而钓”的话，说明至少在战国时代人们就利用钓竿在海里钓鱼。《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在巡狩海疆时，曾用许多副弓弩捕射“大鱼”。那时沿海居民也经常用鱼叉在近海捕鱼。捕鱼也使用鱼网，鱼网又称“罟”（音gǔ）。从大量出土的石制、陶制网坠判断，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已普遍使用鱼网。鱼是沿海地区重要的水产品，给人们带来不少财富。在汉代的《史记》、《汉书》等著作中都记载了燕、齐有渔盐之利，上谷、辽东有丰饶的鱼盐枣栗资源。

我国渔民用渔船在近海捕鱼也很早。在《管子·禁藏篇》中有“渔人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波，乘危百里，宿夜不归者，利在海也”的记载。这说明当时的渔民已离开近海，到较远的海域捕鱼，夜间也在海上度过。

随着海洋捕捞技术的进步，人们对海洋鱼类的认识也越来越丰富。在先秦的著作中，记载各种鱼类40余种，其中海洋鱼类七八种，包括鲸、鲨等庞大凶猛的海洋生物。在汉代早期成书的《尔雅》中，记载了20余种鱼的名称，其中有五六种是海鱼。东汉许慎所

著《说文解字》中，记载各种鱼的名称有70多种。在明代刻板的《闽中海错疏》中记载的鱼名有80余种，其中海鱼达四五十种；还记载了其他海洋生物200余种。清代记载的海鱼就更多了。

带鱼在北方又称刀鱼。据《镇海县志》记载，南宋时宁波、镇海一带出产带鱼，因无鳞，身如四五尺长的带子，被称为带鱼。明代屠本畯在《闽中海错疏》中记载了大小两类带鱼：（大者）“身薄而长，其形如带，锐口尖尾，只一脊骨，而无鲠无鳞，入夜灿然有光，身长五、六尺，小者曰带柳”。带鱼分布很广，我国沿海都有出产。我国自北而南的志书，如辽宁的《奉天通志》，山东的《诸城县志》、《文登县志》，浙江的《海宁县志》、《镇海县志》、《平阳县志》、《临海县志》，福建的《霞浦县志》、《平谭县志》，广东的《雷州府志》、《琼州府志》等，都对带鱼有所记载。

大、小黄鱼是我国渔民最早捕捞的鱼类之一。《吴地记》上说，春秋之际，吴王阖闾率军进行海战，为解决粮食短缺，曾大量捕捞黄鱼。在宋代成书的《四明志》中记载：“三、四月，业海人每以潮讯竞往采之，曰洋山鱼。舟人连七郡出洋取之者，多至百万艘。盐之，可经年。”

明代《郑开阳杂著》中记载吴淞外海是著名的黄鱼渔场，书中说：“盖淡水门者，产黄鱼之渊薮（音sǒu），每岁孟夏，渔船出洋，宁（波）、台（州）、温（州）大小以万计，苏州沙船以数百计，小满前后放船凡三度，谓之‘三水黄鱼’”。中华鲟又叫鳣（音

zhān）鱼、黄鱼、蜡鱼，在近海栖息，产卵时进入江河。中华先民很早就开始享用这种名贵的鱼类，在早商的遗址中发现有鲟鱼骨和鲟鱼鳞片。在古代文献中记述鲟鱼也很早，中华鲟被称为鳣鱼，白鲟被称为鲔（音 wěi）鱼。《诗经·硕人》中有“施罛秽秽，鳣鲔发发”的诗句，是描写西周时卫人（今河南淇县、滑县一带）在黄河里捕捞到回游的鲟鱼。在《礼记》中有“二月祭鲔。祭不必记，祭鲔何也？鲔之至有时，美物也”之句。这是最早关于周人用鲔祭祀的记述。

关于鲟科鱼类的形态和生活习性也有许多记载。晋代郭璞在《尔雅注》中说：“鳣大鱼，似鱏（音 xún，即鲟）而短，鼻口在颌下，体有斜行甲，肉黄，大者二、三丈，今江东呼为黄鱼。”宋代邢昺（音 bǐng）对鲟鱼的生活习性作了解释，他说：“鳣鱼出江海，三月从河下头来上，今于盟津东石碛上钓取之，大者千余斤。”陆玑记述：“鲔鱼形似鳣而青黑，头小而尖，似铁兜鍪，口亦在颌下，其甲可以磨姜，大者七、八尺，益州人谓之鳣。”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鲟鱼“出江、淮、黄河、辽海深水处”。这说明，明代以前，在长江、黄河、淮河、辽宁沿海均有鲟鱼出没。

鲻（音 zī）鱼是海洋鱼类的大家族，我国沿海分布有 20 几种，遍布热带、亚热带水域。鲻鱼大多生活在河口、港湾、浅海水域，自古就是我国渔民捕捞的对象。

考古学者发现，在商代安阳的遗址中就有鲻鱼骨

出土。学者推测，这些海洋鱼类能运到安阳，说明当时人们已掌握了某种保鲜的技术。在福建的文献中，关于鲻鱼的记载最多，宋代王得臣的《尘史》、庄绰的《鸡肋篇》和明代屠本畯的《闽中海错疏》、黄仲昭的《八闽通志》以及《莆田县志》中都作为重要的物产加以记录。鲻鱼在浙江、安徽、山东、江苏、广东、台湾等地均有出产，被当作佳肴美味。葛洪的《神仙传》说："介象与吴王共论鱼，以鲻为上。"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鲻鱼味美，吴越人以为佳品，腌为鲞（音 xiǎng，干鱼）。"郭柏苍的《海错百一录》中记述："乌鱼，似海鲻，产台湾。"

鲀（音 tún）鱼生活在河口，古时称为河豚。河豚有毒，毒性剧烈，但制作得法则是美味，故古人有拼死吃河豚之说。吴人爱吃鲀鱼是出名的。沈括的《梦溪笔谈》中说："吴人嗜河鲀，有遇毒者，往往杀人。"《本草纲目》中也有类似的记载。为了满足口腹之乐，人们想了许多办法。《谈苑》中有这样的记载："登州濒海人取其白肉为脯，先以海水净洗，换海水浸之，暴于日中，以重物压其上，须候四日乃去所压之物，傅之以盐，再暴得成。"这样就可以去掉鲀鱼毒素，放心食用了。

鲥鱼（音 shí）也是古人非常熟悉的海洋鱼类，生息于近海，春末夏初逆河而上作生殖回游。在我国近海和钱塘江、长江、珠江都有鲥鱼的身影。鲥鱼常被作为贡品，为皇室享用。《尔雅》中就有鲥鱼的记载，叫鯦当魱。晋代郭璞注："海鱼也，似鳊而大鳞，肥

美，多鲠。今江东呼其最大、长三尺者为当魱。”

鲥鱼产地在江浙一带。在《沂阳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富阳县产茶与鲥鱼二物，皆入贡，采取时民不胜其劳扰。”《本草纲目》中说：“鲥出江东，今江中皆有，而江东独盛，故应天府（今南京）以充御贡。”《江宁府志》记：“鱼之美者鲥鱼，四月出时，郭公鸟鸣，捕鱼者以此候之。”古人对鲥鱼的习性掌握得很准确。《丹徒县志》记载：“鲥本海鱼，季春出扬子江中游，至汉阳生子化鱼而复还海。”由于有了丰富的海洋知识，中国的渔业开发有了长足的进步，能够及时地捕捞珍贵鱼类。

鲨鱼是海洋中异常凶猛的动物，种类很多，分布很广。我国各个海区都有鲨鱼出没。鲸鲨体型巨大，长度可达 10 米左右。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很早就征服了这一海洋“猛士”，并利用鲨鱼皮制作各种器物。在《逸周书》中有东南土著居民向中央王朝贡献鲨鱼皮的记载。有人推断，《诗经》中的“象弭鱼服”就是用鲨鱼皮制作的箭袋，《左传》中的“妇人鱼轩”是用鲨鱼皮装饰的车子，《荀子》记载的楚人“鲛革犀兕以为甲”是指用鲨鱼皮制作战服。唐代，鲨鱼皮已成为东南沿海进贡的主要土产，广东的潮阳地区每年要贡鲛鱼（鲨鱼）皮 10 张，浙江的黄岩要贡鲛鱼皮 100 张。宋代潮州、潮阳要贡鲛鱼皮各 1 张，温州永嘉要贡鲛鱼皮 5 张，台州临海郡贡鲛鱼皮 10 张。元代，黄岩县进贡的鲛鱼皮达 160 张。根据明清时的地方志记载，当时我国南北沿海均有鲨鱼捕捞业，辽宁、山东、

浙江、福建、广东的方志都有记述。其中浙江、福建记述得特别详细，如《定海新志》记载的鲨鱼名有21种，《福建通志》记载的鲨鱼名有9种。可见浙江、福建两省捕捞鲨鱼的数量最多，品种也最为丰富。

采集贝类也是重要的近海产业。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各种古代书籍对贝类的记载也很多。

牡蛎是古代人们经常食用的贝类。梁时陶弘景曾记述牡蛎“出东海永嘉、晋安，云是百岁雕所化，十一月采，以大者为好”。明代王世懋在《闽部疏》中谈到：“余过莆（田）迎仙桥时，潮方落。儿童群下，皆就石间剔取肉去，壳连石不可动，或留之仍能生。”古时，南方牡蛎的产量大于北方。

贻贝又叫淡菜、壳菜、东海夫人，分布于我国的黄海、渤海。明代彭大翼在《山堂肆考》中说：“淡菜一名壳菜，似马刀而厚，生东海崖上。”《闽中海错疏》中记载：“壳菜生于四明者，壳黑而厚，形如斧头，形丑而味美”，“今闽中取以煮汤治痢疾”。贻贝在沿海地方志中多有记述。

蚶是另一种人们广泛食用的贝类，既是名贵的食品，又可以入药治病。郭璞注《尔雅》说：“魁陆状如海蛤，圆而厚，外有理文纵横。”《名医别录》中说：“魁蛤生东海。正圆，两头空，表有文。采无时。”蚶类不仅用采集的方法获得，而且很早就开始了人工养殖。

人们采集的蛤类主要是蛤仔、文蛤、四角蛤。古代产蛤的地方主要是福建、浙江、江苏和山东。沈括

在《梦溪笔谈》中记述："文蛤即今吴人所食花蛤也。其形一头小，一头大，壳有花斑的便是。"《闽中海错疏》中说："沙蛤，王瓞也，产吴、越。似蛤蜊而长大，有舌白色，名西施舌。"《闽部疏》记述："海错出东四郡者，以西施舌为第一，蛎房次之。西施舌名车蛤，以美见溢，产长乐海湾中。"虽然关于海蛤的记述南方较多，但北方的记述中也可见到。清代赵学敏在《本草纲目拾遗》中记述了山东诸城一带采蛤的情形："据言，介属之美无过西施舌，天下以产诸城黄石兰（地名）海滨者为第一。此物生沙中，仲冬始有，过正月半既无。取者先以石碌碡磨沙岸，使沙土平实，少顷视沙际，见有小穴出泡沫，即知有此物，然后掘取之。"地方志中关于采蛤的记述也很多，北有《辽东志》，南有东莞、陆丰县志，在《台湾府志》中也有记载，这说明采蛤是沿海居民广泛开展的生产活动。

鲍鱼是非常名贵的海产品，其壳称为石决明，是中药材。我国出产 9 种鲍鱼。我国捕捞鲍鱼的历史非常悠久，记述也不少。宋代的寇宗奭的《本草衍义》中说："登、莱海边甚多，人采肉供馔，肉与壳两可用。"古今人大多看重鲍鱼的营养价值和味道，视为食中佳品。

车磲又写作"车渠"、"蚌蝶"，是生长在南海一带的巨型贝类，大的壳长可以超过 1 米，大多被用来制作器具。有的大车渠被制成浴盆，小的则被制成文具。"车渠"之名最早见于《尚书·大传》："散宜生之江淮，取大具如大车之渠。""渠"为车轮，故名大

具为“车渠”。《海药本草》认为车渠为玉石类，书中说：“车渠云是玉石之类，生西国，形如蚌蛤，有文理，西域七宝，此其一也。”沈括的《梦溪笔谈》也说：“车渠……大者如箕，背有渠垄如蚶壳，故以作器，致如白玉，生南海。”宋赵汝适《诸番志》说：“砗磲出交趾国，状似大蚌，沿海人磨治其壳，因其形为荷叶杯，肤理莹洁，如珂玉。其最大者琢其根柢为杯，有厚三寸者，脱落碎琐为环绊诸玩物。按佛书，以此为至宝，今乃海错耳，未审是古砗磲否。”《岭外代答》说：“南海有蚌属曰砗磲，形如大蚶，盈三尺许，亦有盈一尺以下者，惟其大者为贵。大则隆起之处心厚数寸，切磋其厚，可以为杯。甚大，虽以为瓶可也。其小者，犹可以为环珮花朵之属。其不盈尺者，如其形琢磨之以为杯，名曰潋滟，则无足尚矣。佛书所谓砗磲者，玉也。南海所产，非窃取其名耶?”显然，古代对车渠是玉还是贝是有分歧的，但宋以后所见所闻所指的当是贝类。

贝壳不仅可以食用，而且是制作工艺品的重要材料。古代劳动人民根据螺的自然外形，细心雕琢，能够制造精美的酒杯。唐刘恂在《岭表录异》中记述：“鹦鹉螺，旋尖处屈而朱，如鹦鹉嘴，故以此名。壳上青绿斑纹，大者可受三升，壳内光莹如云母，装为酒杯，奇而可玩。”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描述了以螺壳制成的各类酒杯：“南海出大螺，南人以为酒杯，螺之类不一，有哆口而圆长者，曰螺杯；有阔而浅，形如荷叶者，则曰潋滟杯；有剖半螺色红润者，曰红螺

杯；有形似鸚鵡之睡，朱喙绿首者，曰鸚鵡杯”。

有些贝壳还被用作货币。人类利用贝壳作货币的历史非常悠久，我国古代也曾使用过。《汉书·食货志》把贝分为5品：“大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壮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五十。么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三十。小贝一寸二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为朋，率枚直钱三。”

在云南地区，直到明清之际还把贝类当作货币，称之为貝巴、海貝巴或贝子。《新唐书·南诏传》中说，当地交易“以缯帛及贝市易，贝者大若指，十六枚为一觅”。元代制定了贝与黄金的换算比例。《元史》中记载：“定云南税赋用金为则，以贝子折纳，每金一钱，直贝子二十索。”明代云南仍用贝币，《云南通志》中有记载。清檀萃在《滇海虞衡志》中记载：“滇南旧用贝，谓之海貝巴。貝巴者，贝之薄而颈也，枏金江，后市于海南。一贝曰庄，五庄曰手，四手曰苗，五苗曰索。以索贯之，则八十贝。一索之贝，准钱二百四十。故胜国以前，文契及碑志，尚称海貝巴若干索。”

用作货币的贝类大多是紫贝。宋代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中说：“贝子，海傍皆有之，大者如拳，上有紫斑。小者指面大，白如玉。”宋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说：“海南有大贝，圆背而紫斑，平面深缝。缝之两旁，有横细缕，陷生缝中。《本草纲目》谓之紫贝，亦有小者，大如指面，其背微青。”

除捕捞鱼和贝类之外，古代沿海居民还捕捞其他

海洋软体动物，包括乌贼、柔鱼、章鱼等。《图经本草》记载：一种柔鱼与乌贼相似，“但无骨耳，越人重之”。《岭表录异》记载：“章举形如乌贼，闽粤间多采鲜者，煠如水母，以姜醋食之。”《本草纲目》记载：“章鱼生南海，形如乌贼而大，八足，身上有肉。闽、粤人采鲜者，姜醋食之，味如水母。”软体动物捕捞并不是偶尔为之的事情，规模颇大。比如《平潭县志》记载，当地年产柔鱼达700多担，乌贼900多担。

我国劳动人民很早就经营海水养殖业。据记载，我国养殖海洋贝类的历史至少有1000年，养殖海水鱼类也有500年的历史。

养殖牡蛎，自宋代已见诸文献。梅尧臣在《食蠔诗》中记载了渔民插竹养殖牡蛎的生产活动。其方法是在海边把竹插入海滩，形成“竹牢”，然后将采集来的牡蛎“种”于“竹牢”内，使其生殖繁衍。虽有海浪浸渍，海风席卷，仍能生产大量牡蛎，使沿海居民赖以为生。

明代对牡蛎养殖有了更详细的记载。郑鸿图在《业蛎考》中记载：“福宁沿海之氓，田少海多，往往借海为活，故岁有鱼米，有箔米、有泥头米，有深流米。独竹屿，孤岛无田可耕，无山可垦，宣德以前，鱼箔为生。成弘而后，箔废而蛎业兴。肇自先民取深水牡蛎之壳布之泥沙，天时和暖，水花孕结，而蛎生壳中。次年取所生残壳而遍布之，利稍蕃。然蛎产多鲜，巨鱼逐群馋食无厌，众心胥戚，取石块团围，稍无害，但石块不过三五，波浪风倾，害复如前。乃聚

义：扈火竹枝，水中摇动，鱼惊不入”。“乡人郑姓随斫竹三尺许植之泥中，其年丛生，蛎比前更蕃，因名曰竺，以竹三尺故名也。乡人转相慕效，竺蛎遂传”。福建不仅福宁地区养蛎，霞浦、福清、平潭一带也是重要的牡蛎产区。

在广东，牡蛎养殖也很发达。养殖场大多分布在江河入海口。这些地方泥沙淤积，水流通畅，加以亚热带气候，非常适于牡蛎的生长。广东人称牡蛎养殖场为蚝田、蚝塘。

泥蚶是沿海居民养殖的另一种贝类。三国时的著作《临海异物志》中就谈到：“今浙东以近海，田种之，谓之蚶田。”明清时代，浙江渔民种蚶与种田一样。《玉环厅志》记载：“礁头山下海涂，居民种蚶为利。”《闽中海错疏》中说：“四明（今浙江宁波）蚶有两种。一种人家水田中种而生者；一种海涂中不种而生者，曰野蚶。”广东、福建、山东古代也有蚶类养殖。《潮州志》记：“蚶苗来自福建，其质极细如碎米，经营是业者潮阳城南之内海，汕头港内珠池肚。”

蛏（音 chēng）是另一种贝类，体型较小。明人《正字通》上说：蛏是一种小蚌，生长在海泥之中，长二三寸，大如指。闽粤一带的人养殖蛏，称养殖地为“蛏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也有类似的记载。《闽书》记载了养殖蛏的方法。养蛏像种田一样，先要耕耘养殖滩涂，然后要用咸淡混合的水进行灌溉，这样就会生出蛏苗。然后把蛏苗移种到大田去培殖，这样就会养殖成体长二三寸的成熟蛏。我国的蛏类养殖

不限于广东、福建，据史料记载，在浙江的平阳、瑞安、乐清、温岭、玉环、象山、鄞县一带也有蛏类的养殖。

鱼类养殖在我国历史悠久，淡水鱼养殖有3000多年的历史，海水鱼养殖也有几百年的历史。辽宁、河北、山东等北方地区称海水养鱼为“港养”，广东称之为“鱼塭”，福建称之为“鱼埭”。养殖的种类主要是鲻鱼、鲮鱼。在明代成书的《鱼经》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居住在吴淞江口的人，在近海的潮泥地上挖池。仲春时节在水中捕捞寸把长的鲻鱼苗放在池中饲养，到秋季鱼可以长到1尺长。

河北一带则从清代开始养殖鲮鱼、鲈鱼和对虾，并创造了多种养殖方法，或是利用围堰蓄水引苗，或是利用海边天然水坑，或是在低洼地挖沟进行渠养，因地制宜。

广东也是海鱼养殖的重要地区，不仅养殖鲻鱼、鲈鱼、鳗鱼，还养殖蟹类。

在古代，中国是海水养殖业十分发达的国家，不仅规模大，品种多，而且技术先进，经营效益也十分显著。

十三　珍珠粒粒千古情

珍珠自古以来就被看作是高贵、神圣、美丽的象征，是人们喜爱的装饰品。许多历史人物、历史故事都与珍珠有密切的联系。《庄子》里说，黄帝在游赤水、登昆仑时遗失了“玄珠”，许多人都未找到，最后却被象罔（音 wǎng）找到了。《穆天子传》中说，周穆王满北征，曾在“珠泽”边留宿。在记述晏婴故事的一部书《晏子春秋》里，记载晏子劝齐景公不要奢侈靡费，穿装饰着黄金、珍珠和美玉的鞋子。

史书记载，卫灵王曾坐在“重华台”上穷奢极欲，侍女有数百人，她们身上佩带的珠玉与太阳争辉，行动起来罗衣生风。得到珍珠固然是福，但也有因得到珍珠而获罪的。《吕氏春秋》中记载，宋恒司马有宝珠，为此而获罪，就逃跑了。王使人问宝珠藏在什么地方，有人告发说藏在池中。结果，王让人淘干池水找宝珠。为了宝珠不仅殃及人，而且殃及池鱼。《战国策》里有个故事，说张丑在燕国作人质，燕王要杀他，张丑赶紧向境外逃跑，却被守边官吏抓住了。张丑对守边官吏说，燕王要杀我，是因为有人说我有宝珠。

你要抓捕我，我就说宝珠被你吞到肚子里了，那么燕王肯定要杀你。吓得守边官吏赶紧让张丑走了。《汉书》里说，汉武帝曾派人出海购买“明月大珠”，买来的珍珠直径有两寸。《列仙传》中说，有个叫朱仲的卖珠人，曾得到1枚直径3寸的珍珠，便献给了皇帝，皇帝赏了他五百金。而鲁元公主为了得到这个稀世珍宝，竟开价七百金。朱仲给了她1枚直径4寸的珍珠后就不见了。

总结古时珠宝，大概由4种质料制成：一种是用玉、石琢磨而成的圆形饰物，一种是熔炼煅烧制成的琉璃球、玻璃球，一种是产于河川蚌中的珍珠，一种为海中贝类中生成的珍珠。珍珠概指河、海贝类中生成的珠子。

《尚书·禹贡篇》中提到淮夷贡奉“蠙珠”。唐代著名学者孔颖达认为，“蠙”就是“蚌”，“蠙珠”就是“蚌珠”，即蚌中生成的珍珠。西汉戴德编纂的《大戴礼记》中提到的“川生珠”，指的也是河珠。《古今注》中说：东汉章帝元和元年（公元84年），明珠出馆陶，大如李，有光耀。三年（86年），明珠出豫章海底，大如鸡子，围4寸8分。和帝永元五年（93年），郁林人得大珠5寸。这些珍珠多指海珠。

汉代，获得名贵珍珠有两条途径，一条是通过陆路、海路向西方国家购买，另一条便是在中国近海采捞。《广志》记载：“‘莫难’珠，其色黄，生东夷。有明珠，称夜光，有大珠径寸，或围二寸已上，出黄支。有至圆珠，置之平地，终日不停。”《魏略》记载：

大秦国出明珠、夜光珠、真白珠。夫余出珠，大如酸枣。《南越志》中说，海中有大珠、明月珠、水精珠。《林邑记》记载，黄支州户口殷实，多明珠杂宝。文中提到的大秦国即罗马帝国；黄支一说在印度次大陆西南，一说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西北部。夫余、东夷大约在辽东、朝鲜半岛一带，南越、林邑均临近南中国海。

我国古代的夷人、越人在近海采珠的历史悠久，但见之文献、叙之较详则在汉代。汉的疆域已抵达南海，合浦是当时采集珍珠最为重要的场所。《汉书·孟尝传》中记载，合浦沿岸地区土地贫瘠，百姓以采珠为生。《晋书·陶璜传》也有类似记载。当时流传着一个故事，说官吏们贪赃枉法，驱使渔民冒死采珠，采来的珍珠却中饱私囊。结果，珍珠全部“徙走”，合浦地方竟无珠可采，不少采珠人因断了生计而饿死在路边。后来孟尝为合浦太守，实行了一些德政。过了1年时间，“徙走”的珍珠又回来了。这则故事包含了人们对赃官的憎恶和对开明政治的向往。珍珠迁走的事是不会发生的，可能是因为潮汐、水温或其他原因导致珍珠产量一度大幅度减少。

《搜神记》中记载了另一个故事，说在南海之外有鲛人，像鱼一样居住在水中，他们哭泣时流出的眼泪能化作珍珠。这不仅是一个童话，还寓意珍珠中凝聚着封建社会采珠人的泪水。《广州记》中则说月明珠是海中鲸鲩（音 huàn）的眼睛。

我国海水珍珠采捞的地点集中在合浦。合浦在今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端，濒临大海。古代人认为，珍珠是从“珠母池”中生长出来的。汉代人记述，珠母池在合浦东南80里的大海中。唐代人也记述，合浦县有珠母池，是郡人采珠的场所。宋人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记载，合浦产珠的地方叫“望断池”，在海中孤岛之下，去海岸有数十里，池的深度有十余丈。清代李调元在《粤东笔记》中记载，合浦海中有7个珠池，大池的名字是，平江、杨梅、青婴，小池名叫乌泥、白沙、断望、海猪沙。珠池的底部与海相通，海水咸，但珠池中的水却是淡的。正因为其中的水是淡的，才能生出珍珠来。

我国自唐代就开始对珍珠采集进行管理。唐代刘恂在《岭表录异》中记载：在廉州近海中有洲岛，岛上有大池。因为要向皇帝贡奉珍珠，太守每年都要亲自监督珠户下池采珠。珠池在海上，池底是与大海相通的，池水深不可测。采出的珍珠一般如豌豆大小，像弹丸大小的也时有所得；而直径1寸、光彩夺目的珍珠则极难遇到。沿海居民常取出小蚌中的蚌肉，用竹篾串起来晒干，叫作“珠母”。容桂地方的人将“珠母”烧烤后用来下酒。在蚌肉中也可以见到像粟粒大小的细珠，因而珍珠都是蚌中“胎”生的。刘恂的这些记载反映了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

在技术落后的古代，潜入海中采珠是十分艰险的事。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记载：采珠的蜑（音dàn）人潜入海中，捞取大蚌，剖蚌取珠。下海时，要携带一个系有长绳的竹篮。蜑人潜入水中，捡拾到蚌

即将其放入篮内，然后摇动绳子，让驾舟的人把装满蚌的篮子拽上海面。潜水的人也迅速上浮，回到船上。假如人在水下不幸遇到恶鱼，船上的人就会看到一缕血水涌上海面。人们悲恸哭号，知道采珠人已葬身鱼腹了。也有的人看到恶鱼后迅速逃离，只伤了胳膊，或伤了腿。海中最凶残的恶鱼是“刺沙”，又称之为虎鱼。蜑人采珠最忌讳的是碰上恶沙虎鱼。由于官府残酷压榨盘剥采珠人，因而采珠人想尽办法进行反抗。万震在《南州异物志》中记载：合浦的采珠人十几岁就下海采珠。官府禁止民间采珠，采珠人就潜入水中，蹲在水底，把蚌剖开，取出好珠吞到腹中，再浮出水面。

自古以来，从事这项艰险工作的主要是蜑民。蜑又写作但、蛋、蜒等，是我国南方少数民族中的一支。在汉代书籍《淮南子》中就有指使但民吹竽的记述。《隋书·南蛮传》记述了蜑民与华人、儴、俚、僚、㐌等兄弟民族杂处共居的情形。东晋著作《华阳国志》也记录了“蜑”与濮、赍、苴、共、奴、儴、夷等西南各民族共同生活的情况。《岭外代答》记载：蜑蛮把船当作居室，把水看作陆地，在江海上生息繁衍。钦州地方有3种蜑人：一是“鱼蜑”，以捕鱼为生，善于举网垂纶；二是“蠔蜑”，善于潜入海中采集蠔贝；三是“木蜑”，善于伐木取材。蜑民生活非常艰苦，衣服“鹑结”（破烂不堪），得到一捧米，妻子儿女一起分食。一家人生活在船上，子女很多，有的多达十几个。母亲用布帛把幼子束缚在背上，摇桨自如。小孩能匍

匐爬行了，就用长绳一头绑住孩子，另一头捆在木桩上。有时孩子掉到水里了，就拉绳把他（她）拽上来。小孩子就在船的篷脊上学走路。孩子能走路了，也就会凫水而在水中出没了。船靠岸，孩子们就在沙滩上嬉戏。小孩冬夏身上都不穿衣服。蜑民有自己的社会组织，有自己的传统，也有自己生活的“边界”。据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记载：从事珍珠捕捞的主要是“乌蜑”或“乌蜑户”。他们腰悬绳索，潜入海中很久才取到珍珠。然后摇撼绳索，由舟人拽出水面。（见图6）葬身于蛟龙之腹的人比比皆是。到了明代永乐年间，人们开始改进采蚌的技术。陆谷在《菽圃杂记》中记述说：明永乐年，开始尝试用铁耙取蚌，但所得尚少。最后得到了“今法”，即做一种特殊的沉网，用木材制成底口，两角用石头做坠物，上边用麻绳做一个大兜，像个兜囊的形状，用绳子把大兜拴在船的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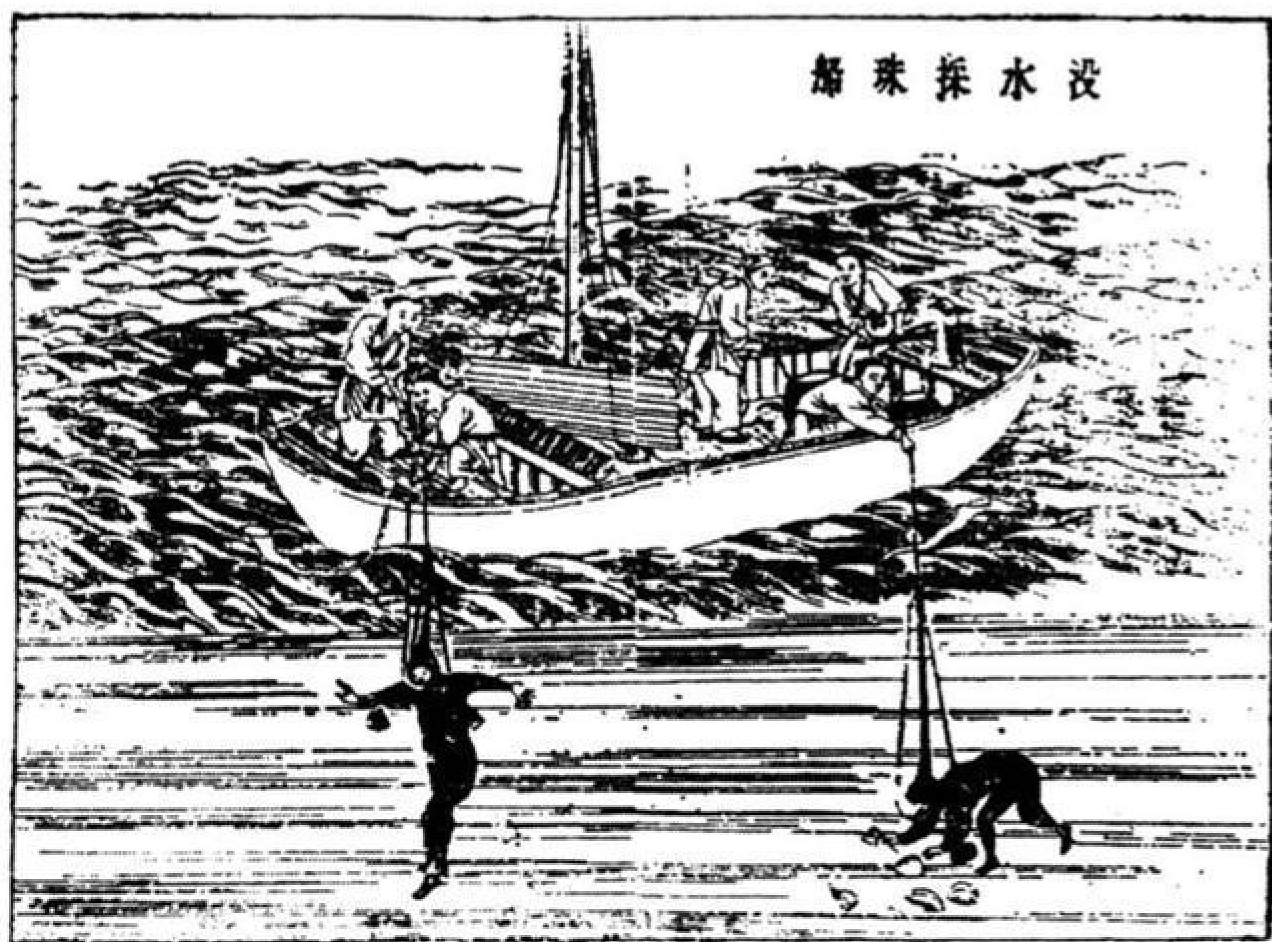


图6　采珠图

侧，让网兜张开，沿海底潜行。当船鼓动风帆乘风而行时，海底的蚌纷纷落入兜囊中。兜囊沉重了，说明蚌已经装满了。这种采蚌技术的运用，使葬身鱼腹的采珠人减少了，也促进了采珠业的发展。

珍珠采集上来之后，要进行分类筛选。宋代李石的《续博物志》中记载：珍珠被分为九品。寸五分以上至寸八九分的为“大品”。有光彩，一边有小平面，像个“覆釜”（倒扣锅）的叫“珰珠”；次于珰珠的叫“走珠”；次于走珠的叫滑珠；次于滑珠的叫“磊螺珠”；次于磊螺珠的叫“官雨珠”；次于官雨珠的叫“税珠”；次于税珠的叫“葱珠”。

根据《广东通志》记载，珍珠的年产量是很大的。例如在明代，成化十二年（1476 年），采珠 28000 两；正德九年（1514 年），采珠 14000 余两；嘉靖九年（1530 年），采珠 5390 两；嘉靖十二年（1533 年），采珠 11320 两；嘉靖二十三年（1544 年），采珠 400 两。

对于采珠人来说，珍珠并不意味着财富。商人往往采用欺诈手段，对采珠人巧取豪夺。据《岭外代答》记载，有的年份，自然条件适宜蚌的生长，珍珠产量增加，被称为“熟年”。但熟年珠价不抵“耗年”的十之一二。在熟年，蜑民冒死采集的珍珠被奸商用一升酒、一斗粟就换去一两乃至数两。经过中间商分出等级，在城中或转至京都售卖，价格成倍增长。商人都发了财，成为巨富。管理采珠的官吏大多中饱私囊。虽然州名叫廉州，但当地官吏并不清廉，而是贪污成风。

我国古代产珠的地方不只合浦一地，遂溪县、东莞县也产珠。据《遂溪县志》记载，在遂溪县西南150里的海中有“时乐池”，盛产珍珠。宋、明两朝都在这里设置了管理采珠的机构。在东莞县珠江口外、东莞到香港一带海中有“媚珠池”。总之，我国是珍珠采捞历史悠久的国家。晶莹的珍珠不仅蕴含了珍贵的物质价值，也蕴含了珍贵的文化价值。

十四　郑和与海疆开发

郑和是我国明代伟大的航海家，祖居云南昆阳州（今昆明市晋宁县）宝山乡和代村，原姓马。他的祖先来自西域，是普化利国的国王索非尔。因国家被外邦侵占，索非尔于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率众内附，受到中国皇帝的嘉奖，被委任为“本部正使总管”、“宁彝侯”。后来普化利国光复了，索非尔也没有离开宋国。索非尔死后，宋朝又加封他的子孙。到第四代马哈木时，宋国灭亡，马哈木成为元朝的官吏。自马哈木始，“马”成了这家的汉姓。马哈木的长子正式名字叫赛典赤·赡思丁。从赡思丁始，马家开始出任云南的地方官吏。他的后裔有一个叫马哈只的。“哈只”是对朝觐过麦加的人的尊称，意为“巡礼之人”。马哈只家有两个儿子，第二个儿子名叫和，俗名马三保，就是后来的郑和。

小三保大约11岁离开了家乡。据考证，小三保很可能是明军傅友德、蓝玉部队在扫灭元朝残余势力时被掳去服役的儿童。后来随傅友德的部队到了北平，进入燕王朱棣的官邸，成为内宫的太监。在“靖难之

役”时，郑和凭借卓越的胆识，在朱棣夺取皇位的斗争中作出了贡献，因而深得明成祖朱棣的赏识。大概在这个时期，马三保被赐姓郑，改名郑和。

明王朝建立后，统治者施行了一系列让百姓休养生息的措施，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逐步恢复，国家经济开始好转。虽然经历了3年之久的靖难之役，沿海发达地区经济又一次遭到破坏，但由于朱棣实行怀柔政策，农业、水利、矿业、纺织、陶瓷、造船业又得到了恢复与发展。在对外交往中，明廷希望与海外诸国建立一种广泛的联系，以中华文明去教化各国，使他们在精神上、礼仪上尊奉“天朝”。正是出于这样的动机，明王朝在外交活动中并不过多地看重商业利益，而是采取“厚往薄来”的恩赏态度。在这样的方针指导下，明代许多由朝廷组织的远洋航行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性的，而不是商业性的。

明廷曾组织了庞大的使团，由郑和率领七下西洋，进行了大规模的航海活动。

郑和七下西洋，在政治上与各国建立了友好关系，扩大了明王朝在海外的影响；在经济上促进了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使海上丝绸之路又有了生机。中国大量的丝、绢、茶、瓷器被运到中南半岛、印度半岛、阿拉伯半岛、波斯湾和东北非各地，国外的宝石、香料、药材、锡、金、珍贵木材和毛织品等被运入中国。中外文化交流也日益频繁。郑和为海外诸国带去了很多汉文典籍，使中华文化广播海外。

郑和的远航对我国海疆开发有重要作用，至少包

括了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一是促进了我国造船业的发展，二是促进了我国海洋科技的进步，三是促进了我国港口设施的建设，四是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海上力量的强大和海疆的巩固。

明代是我国造船业非常发达的时代。郑和下西洋的海船大多建造于南京的宝船场和福建等造船基地。南京宝船场建有巨大的造船坞，集中了全国各地的优秀工匠，实行细致的分工，采集了各地的优质木材制造海船。海船造好后，在龙口关下水，直接从南京驶到海上。郑和下西洋，指挥的是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远洋舰队。郑和第一次下西洋，船队规模最大，由各类船舶 208 艘组成。郑和船队在海上列队而行，组织严密，犹如一只翱翔的大雁。“雁头”由前哨船组成，“雁颈”由前营船组成，两翼由“左哨列”、“右哨列”船只组成，“雁身”由帅船和附属船只组成，雁尾由后哨船组成。郑和船队船舶的正式名称有“清和”号、“惠康”号、“长宁”号、“安济”号、“清远”号等，名称之后再按序号排列。据罗懋登在《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中记载，郑和船队由 5 种船舶组成，即宝船、马船、坐船、战船和粮船。郑和船队的主体舰只是“宝船”。宝船又称“宝舡”、“宝石船”、“宝舟”、“龙舟”等，是郑和船队中形体较大的船只。史书中对宝船的记述很多。在《瀛涯胜览》中记载，宝舡六十三号船，船长 44 丈 4 尺（约 151.8 米），宽 18 丈（约 61.6 米）。中等船长 37 丈（约 136.5 米），宽 15 丈（约 51.3 米）。据《星槎胜览》记载，宝船有 9

桅，可以张12张帆。据《西洋番国志》记述，宝船的篷帆、锚、舵没有二三百人是很难移动的。除此之外还有马船，长37丈，阔15丈；战船长18丈，阔6丈8尺；坐船长24丈，阔9丈4尺；粮船长28丈，阔12丈。另有传递情报和运送淡水的小型船只。

为了在列队航行中保持联系，郑和船队的舰船上配备了多种联络工具。每条船配置有大生旗1面，号带1条，大桅旗10顶，正五方旗50顶。各船通过悬挂旗带，挥动旗帜互相联络。白天行船一般以麾旗为号，按旗语命令行船。为了在大雾天也能联络，各船配备了大铜锣40面，小锣100面，大更鼓10面，小鼓40面。有的书籍记载，船上还配备了喇叭。因而在海上有雾的天气里，各船也能听音响行驶、停泊、升帆、转向，进退自如。

到了晚上，郑和船队以灯火为号。各类船只按规定悬挂灯笼，整个船队分为若干部分——“营”。前营船悬挂平列的两盏灯；左营悬挂两盏灯，每个桅杆上挂一盏；右营挂灯与左营相同；后营也悬挂两盏灯，一高一低。在遇到紧急情况时，中军挂五方旗，并在高处悬挂5盏灯；其余的船只都要在船尾和前桅杆上加挂灯笼，以显示明朝水军的宏大气势。(见图7)

为了实现远航，郑和船队运用多项技术对航线进行勘测，以便掌握气象、水流的情况。为了了解水深和海底情况，郑和船队进行了认真的观察、测量和记录。其基本方法是：把坠有铅砣的长绳抛入海中，以入水绳长判断海水的深浅；在铅砣上涂上牛脂，粘取



图 7　郑和船队航行"船式"

水底的泥沙，以了解海底的情况。在据《西洋朝贡典录》记载，曾测得昆仑洋水深 25"托"，海底地势平坦，没有起伏的山脉，水底有沟，深约 50"托"。据《指南正法》记载，七洋洲（西沙群岛）一带水深"一百二十托"。1 托大约有两米。

在郑和船队的航海记录中，对南海、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等水域的水深、季风都有详细记载，并说明哪里有浅滩，哪里有泥沙地，哪里水流湍急，哪里有暗礁等。正因为有了这些航行指南，郑和船队才能远涉重洋，在两大洋间纵横驰骋。

十五　海疆万里抗倭寇

明代是中国封建社会走向衰落的时期。由于明朝廷在政治上极端保守，经济上闭关锁国，导致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国力不强，军队疲弱，屡屡遭受外敌侵略，海疆频频告警。

明朝建国之初，很快建立了以卫、所为基本单位的军事体制。明朝廷在中央设立大都督府（后改称五军都督府），作为全国最高军事机关。同时，在京师和地方一些要害地区设卫、所。“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一般在交通枢纽和重要的城镇设卫，在岛屿和孤立的军事要地设千户所，在地域险峻狭窄之处设百户所。

全国的卫、所有统一的编制标准。卫编定员额为5600人。卫下设左、右、前、后、中5个千户所，千户所的编制员额为1120人。千户所下设10个百户所，百户所的编制员额为112人。百户所下设两个“总旗”，总旗辖兵50人。每个总旗辖10个“小旗”，小旗有兵10人。明代的军制规定：统兵5000为“指挥使”，统兵千人为“千户”，统兵百人为“百户”，统

兵50人为“总旗”，统兵10人为“小旗”。

明代朝廷加强了对军队的控制。战时，派总兵官佩将印带兵出征；战争结束后，将领需将将印交还朝廷。

卫所制度又是军屯合一的制度，“以军隶卫，以屯养军”。除京师的卫所之外，各地方卫所在不影响军务的情况下，都施行屯田，以补充军粮的不足。

由于实行军屯，不少军人是世袭的，一人从军，一家永为军户。明中叶后，出现了募兵制，但是卫所制度仍然存在。

根据《筹海图编》统计，至明中叶，沿海有卫54个，所99个，巡检司353个，烽堠997个，堡190个，墩313个，水寨58个，台48座，营23个。（见图8）

明代边患主要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但海疆被侵扰也是十分严重的。因而，明朝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大规模的海防建设。

明王朝自建国之初，海疆就受到倭寇侵犯。其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又相继染指中国的海疆。而倭寇的进犯给中国沿海地区带来了最为严重的灾难。

洪武二年（1369年），海寇张士诚、方国珍的余党勾结倭寇袭扰山东沿海州县。朱元璋遣使赴日本，与日方交涉，但没有取得结果。三年（1370年）三月，倭寇又骚扰登州、莱州。六月，倭寇侵入浙江、福建沿海，为明沿海守军击退。四年（1371年），明水军在海上练兵，积极备战，准备防御倭寇的海上进犯。七年（1374年）正月，由于沿海倭患严重，明朝



图 8　明代浙江沿海卫所图

廷关闭了宁波、泉州、广州的市舶司，实行严厉的海禁。七月，明海军出击，在珍珠大洋截击倭寇舰队，俘获了一些倭寇的船只。

洪武十七年（1384 年）正月，汤和受命巡视沿海防务。汤和，字鼎臣，为明开国的功臣。他曾在江、浙、闽一带作战，先后击败了张士诚、方国珍、陈友

定等出没沿海的割据势力。他与吴祯曾“渡曹娥江，下余姚、上虞，取庆元。国珍走入海，追击败之，获其大帅二人，海舟25艘，斩馘（音 guó）无算，还定诸属城。遣使招国珍，国珍诣军门降，得卒24000，海舟400余艘，浙东悉定”。后进剿陈友定，“自明州由海道乘风抵福州之五虎门，驻师南台……败平章曲出于城下”。其后又“分兵徇兴化、漳、泉及福宁诸州县，进拔延平，执友定送京师”。因此，汤和对海防建设是有经验的。汤和接受布防江南海疆的使命之后，与方国珍之子方鸣谦同行。方鸣谦建议说：“倭自海上来，则海上御之耳。请量地远近，置卫所。陆聚步兵，水具战舰，则倭不得入。入亦不得傅岸。近海民四丁籍一以为军，戍守之，可不烦客兵也。”明朝廷接受了方鸣谦的建议。

洪武二十年（1387年）二月，汤和在浙江沿海增设了59个卫所，并四丁抽一，得5.8万壮丁守卫海防。四月，派往福建的周德兴在福建沿海筑城16座，设巡检司45处，在福州、兴化（今福建莆田）、漳州、泉州三丁抽一，得兵1.5万人戍守海疆。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明朝廷开始营造海舟，并令沿海卫所为百户所和巡检司置船2艘，用于海上缉捕。后又在宁海卫、莱州卫设水军总寨，派水军在海上巡逻，在海上拦截倭寇和海盗。

为了提高士气，打击倭寇，明朝廷在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规定了捕倭的赏格：“凡指挥千户所获倭船一及贼者，升一级，赏银五十两，钞五十锭。军

士水陆擒杀倭贼，皆赏银有差。”

永乐年间，倭寇多次骚扰山东、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地区，攻陷卫所，杀死明军边将。其中永乐十六年（1418 年）五月，进攻金山卫城的倭船达百艘，倭寇达 7000 余人。这期间，明水军在海上与倭寇作战，大都取得了胜利。永乐四年（1406 年）十月，平江伯陈瑄在督运海船至辽东时，在海上遇到倭船。他率军追击倭船一直到朝鲜海域，杀溺倭寇甚众。永乐七年（1409 年）三月，柳升在青州（今山东益都）海上大破倭寇船队，一直追击至金州（今辽宁金县）白山岛。永乐十五年（1417 年）六月，明将张谦自西洋返回，在金乡卫（今浙江平阳南）击败倭寇，俘获数十人。

永乐十七年（1419 年）六月，辽东总兵刘江在金山卫（今辽宁金县东北）大破倭寇，有力地制止了倭寇大规模的进犯。

刘江，宿迁（今安徽宿迁）人。他进驻辽东半岛后，便在海防要地构筑城堡，设烽堠，加紧备倭。六月十五日，倭寇 1500 余人，分乘海舟 31 艘，直扑金线岛（今辽宁金县）西北的望海埚。在接到报告后，刘江迅速调集步兵设伏，派骑兵绕到敌后切断倭寇的退路，又派人到倭寇登陆地点焚毁了倭寇的船只。当倭寇进入望海埚后，刘江率伏兵突然发起冲锋，倭寇毫无准备，死伤惨重。残敌退向樱桃园空堡，明军分两路追击，沿途追杀。倭寇无一漏网，死 742 人，被俘 857 人。望海埚大捷有力地遏制了倭寇的猖狂进犯。

英宗即位后，采取了更为保守的外交方针，限制倭国使臣的来访次数，并规定使臣献贡的船只不得超过 3 艘，随从不得超过 300 人，也不得多带兵器。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日本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但倭人往往不遵守这些限定。正统四年（1439 年）四月，终于发生了倭船 40 艘骚扰东南沿海的严重事件。倭人连破台州桃渚（今浙江临海东）、宁波大嵩千户所（今宁波东南），后又攻陷昌国卫（今浙江定海），所过之处，焚烧杀掠。明朝廷急忙派防倭官员加强海防，以防倭患。

正统七年（1442 年）五月，倭寇再次攻陷大嵩千户所，杀官军百人，掠持平民 300 余人，劫粮 4400 余石以及大量军器。十一年（1446 年）四月，倭寇侵扰海宁、乍浦（今浙江平湖南）。成化年间，倭寇又进犯浙东、福建。

嘉靖二年（1523 年），日本贡使宗设抵达宁波。没过多久，宋素卿偕瑞佐也来到宁波。两个日本使团为了争正统地位以获取有利的通商权而明争暗斗。宋素卿通过贿赂宁波市舶太监赖恩，得到不少“关照”。在饮宴时，瑞佐使团被安排在上座；瑞佐的商船后到，却优先验放。宗设大怒，杀了瑞佐，焚毁了瑞佐的商船，又尾随宋素卿来到绍兴城下。宗设一伙沿途烧杀，在霍山洋竟杀了明备倭都指挥、千户、百户等多人，浙东为之震动。明朝廷在查明宋素卿在正德年间因通夷事发并通过贿赂免于究问的情况后，逮捕了宋素卿；同时关闭了浙江、福建的市舶司，禁止与日本通商。

其后，东南沿海一直不安定，倭寇、葡萄牙人勾结地方奸民不断制造事端。

嘉靖二十六年（1547 年）七月，明朝廷任命朱纨为浙江巡抚，兼管福建五省海道，提督闽浙军备。朱纨，字子纯，苏州长州（今江苏吴县）人。他为人“清强峭直，勇于用事”。到任后，根据“不革渡船则海道不可清，不严保甲则海防不可复”的认识，采取了严厉的措施，革渡船，严保甲，搜捕奸民。这年，他派军队进讨盘踞在覆顶山（今福建漳平南）的通倭奸商。二十七年（1548 年）四月，他派军队攻克倭口在双屿（在今浙江宁波附近海上）的巢穴，在漳、泉、福宁屯驻军队。其后，又在济屿（今属福建漳州）击败倭寇和与倭寇相勾结的佛郎机人，捕获日人稽天、海盗徐栋。徐栋的党羽王直逃匿，成为日后江浙海患的元凶。朱纨的措施引起了当地富商和士绅的反对，原因是“闽人资衣食于海，骤失重利，虽士大夫家亦不便”。六月，日本贡使周良违约至港，朱纨把他暂时安置在宾馆。这时，奸民“投书激变”，朱纨严加防范才没有发生骚乱。朱纨数次上疏，揭露“闽浙大姓”通倭的情况。这更激起了地方势力的憎恨，他们通过朝中闽浙籍的官吏奏改朱纨巡抚闽浙为巡视，试图削弱朱纨的权力。

嘉靖二十八年（1549 年）四月，朱纨遣副使柯乔、都指挥卢镗逮捕了勾结倭寇和佛郎机人的豪绅、奸商李光头等 96 人，并且杀了李光头。这又招致“擅杀”的罪名，朝野官吏纷纷攻讦朱纨。朝廷罢了朱纨

的官，并要逮捕他。朱纨感到："纵天子不欲死我，闽浙人必杀我。"于是饮毒药自杀。后来，其他有功将领也受到查办。朱纨死后，朝廷不再设巡视大臣，"中外摇手不敢言海禁事。浙中卫所四十一，战船四百三十九，尺籍尽耗"。由于朝廷的昏庸和地方利益集团作祟，江南海防全面瓦解。自此年七月，海盗王直、陈东勾结倭寇，在浙东一带大肆劫掠，倭患突起。王直，徽州（今安徽歙县）人，嘉靖十九年出海从事走私贸易，勾结倭寇在宁波双屿港建立了据点，人称净海王、徽王。

嘉靖三十一年（1552 年）四月，王直派部下徐海、陈东、萧显、麻叶等人导倭寇进犯海疆，大掠舟山、象山沿海，后登岸劫掠温州、台州、宁波、绍兴等地，江南、江北同时报警。五月，倭寇攻陷黄岩（今浙江黄岩），纵掠七日。七月，朝廷派王忬为闽浙巡视。王忬重新起用俞大猷、汤克宽等战将，加强了沿海各地的防御，屡次击溃倭寇。

嘉靖三十二年（1553 年）二月，倭寇劫掠温州（今浙江温州）。闰三月，王直勾结倭寇，率舰队百余艘侵扰台（今浙江临海）、宁（今浙江宁波）、嘉（今浙江嘉兴）、湖（今浙江吴兴）以及苏（今江苏苏州）、松（今上海松江）、淮北等地，攻陷昌国卫（今浙江象山东南）。倭寇所到之处，掠夺财物，屠杀居民，劫持人口。所掳妇女境地更为悲惨："昼则缫丝，夜则聚而淫之。"海盗穿倭服，挂倭旗，横行四乡。

嘉靖三十三年（1554 年）二月，倭寇进攻松江

（今上海松江）。失败后，劫掠民船入海，驶向江北，侵扰通（今江苏南通）、泰（今江苏泰州）等地，焚烧盐场。另一支倭寇南下浙江宁波普陀山，攻掠嘉兴（今浙江嘉兴）、嘉善（今浙江嘉善）、海宁（今浙江海盐），后又流窜至崇明。五月，倭寇自崇明至苏州、昆山（今江苏昆山）劫掠。六月，倭寇又转向嘉兴、嘉善，后自吴淞口入海。倭寇的劫掠，给江浙百姓带来深重的苦难。

这年，明朝廷设立总督大臣之职负责讨倭，总揽南京、浙江、山东、两广、福建的军务。担任此职的是南京兵部尚书张经。张经，字廷彝，侯官（今福建福州）人。张经赴任时，正是倭患最为严重的时期。八月，倭寇进犯嘉定。九月，又进犯海门（今江苏海门）。十一月，倭寇和海贼2万余人攻占了柘林（今浙江奉贤南），并在嘉兴、湖州、嘉善一带劫掠。由于江浙一带官军屡次战败，士气低落，张经决定调两广等地的少数民族士兵入浙，与倭寇作战。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倭寇再次入浙。徐海勾结萨摩、肥前等倭寇攻取了柘林，并在此屯驻。倭寇分兵进犯乍浦（今浙江平湖南）、海宁（今浙江海宁西南），攻陷崇德（今浙江余杭东北），包围了杭州，杭州城“数十里外，血流成川”。二月，明朝廷以张经办倭事不力（但张经并未去职），接受严嵩的推荐，派工部侍郎赵文华赴浙祭海，兼理防倭事宜。四月，张经指挥先期从两广来的田州（今广西田阳）兵在曹泾与倭寇作战，初战不利。倭寇纵掠通州（今江苏南

通)、海门（今江苏海门)、常熟（今江苏常熟)、江阴（今江苏江阴)。五月，张经与副总兵俞大猷在王江泾（今浙江嘉兴北）大破倭贼，杀敌1900余人。余寇驾舟逃向大海。王江泾大捷为嘉靖年间抗倭的第一次大胜利。但赵文华由于张经、李天宠不肯依附自己，便与胡宗宪一起向朝廷奏报张经等人“靡饷殃民，畏贼失机”。张经与参将汤克宽因此被押往京师，遭廷杖，罢黜为民。

嘉靖三十四年是明代倭患较为严重的一年。这年倭寇1000余人乘船30余艘流窜至昆山、苏州、常熟等地抢掠，气焰十分嚣张。七月，一股倭寇自杭州西掠，经歙县（今安徽歙县)、绩溪（今安徽绩溪)、旌德（今安徽旌德)、泾县（今安徽泾县)，攻陷南陵（今安徽南陵)，进逼南京，又从南京流窜至溧阳（今江苏溧阳)、宜兴（今江苏宜兴)、无锡惠山。后为应天巡抚曹邦辅所败。这股倭寇仅仅六七十人，竟然行程数千里，杀伤军民4000余人，历80余日才被消灭，明军战斗力可见一斑。九月，赵文华、胡宗宪集直隶、浙江两省军队进剿倭寇的巢穴陶宅（今江苏奉贤)，先胜后败，死伤甲士近千人。十月，昏庸的明朝廷竟妄杀抗倭名将张经、李天宠，实为天下奇冤。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二月，胡宗宪受命总督沿海防务。这年，倭寇20余艘舰船停泊在浙江沿海，攻陷慈溪（今浙江慈溪)，又集万余人进攻杭州。在俞大猷、卢镗的指挥下，明军在黄浦（今浙江黄浦)、台州（今浙江临海）取得了一些胜利，但仍无法从根本

上遏制倭寇的侵扰。倒是胡宗宪采取离间之计，挑起倭寇的内讧，用“以贼制贼”的办法取得了实际效果。七月，胡宗宪以高官厚禄引诱徐海，利用徐海击破了吴淞的海寇，俘获了大盗麻叶和陈东，徐海也率众离开乍浦。官军乘势焚毁了乍浦倭寇的巢穴，斩首300余人，焚溺死者也有300余人，余寇逃入海中。八月，胡宗宪把投降的徐海和陈东的余党安排在沈庄居住，一居东，一居西。他迫使陈东给下属写信，挑起徐海与陈东余党相互厮杀。徐海见大势已去，投水而死。胡宗宪把俘获的贼首徐洪、陈东、麻叶以及卢镗俘获的大隅岛岛主之子辛五郎解往京师。至此，倭寇的元气大伤，明军取得了战场上的主动权。

倭寇虽损兵折将，但并没有停止骚扰。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四月，江北倭寇进犯如皋（今江苏如皋）、海门（今江苏海门）、通州（今江苏南通）、天长（今安徽天长）、盱眙（今江苏盱眙）、泗州（今安徽泗县）、高邮（今江苏高邮）、宝应（今江苏宝应）、淮安（今江苏淮安），使当地损失惨重。

王直是东南海患的祸首之一，与其养子盘踞在日本肥前之平户。他屡次勾结倭寇屠杀、掳掠沿海居民。明王朝悬赏伯爵爵位和黄金万两，希望捕获王直。由于官军加强了沿海防御，不断使倭寇受到重创，有的岛竟无1人返回，因而倭寇内部开始有人对王直不满，王直也心存疑虑。浙直总督胡宗宪与王直同郡，都是安徽绩溪人。他自金华狱中释放了王直的母亲，把王直的母亲和妻子安置在杭州，又派生员蒋洲携带给王

直的家书劝降王直。王直见家人无恙，也产生了归附的念头，于是派王激到胡宗宪处作人质。胡宗宪对王激以礼相待。王激心存感激，向胡宗宪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对消灭徐海等海盗起了不小的作用。在这一年，由于胡宗宪招谕，许诺允许互市，山口、丰后岛岛主源义长、源义镇归还了劫持的人口，并派妙善等40余人随王直前来贸易。十月，王直带货船停泊在岑港（今浙江舟山）。浙人听说王直与倭寇船队在港停泊，十分惊恐，将吏也加强了戒备，这引起了王直的疑心。胡宗宪派人慰问王直，发誓没有其他企图。他派指挥夏正到王直处作人质，并且遣还了王激。王直解除了疑虑，与其党羽到杭州拜谒胡宗宪。胡宗宪让他先去拜谒杭州御史王固本，王固本立即逮捕了王直等人。胡宗宪上疏朝廷请求宽恕王直，让其戴罪立功，戍守海疆。而朝野上下则认为胡宗宪接受了倭寇的贿赂。胡宗宪十分恐慌，不敢再坚持。朝廷决定处死王直。王激知道了这一消息，十分悔恨。他肢解了夏正，在舟山置木栅，据守岑港，与明军对抗。官军则包围了岑港。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春，倭寇侵犯台州、温州。四月，倭寇自温州犯福州、兴化（今福建莆田）、泉州（今福建泉州）。五月又转攻惠安（今福建惠安）。官军驾舟追击，冲沉贼舟7艘，杀敌68人，生擒7人。6月，倭寇又进犯乐清（今浙江乐清）、永嘉（今浙江温州）。另一支倭寇进犯兴化、漳州（今福建漳州），攻陷福清、南安两县。十一月，屯驻在柯梅

（今浙江舟山岛北部）的倭寇出海，总督俞大猷自沈家门（今浙江舟山普陀）追击。

嘉靖三十八（1559年）三月，倭寇侵犯象山（今浙江象山）。海贼在舟山柯梅造巨舟逃向浯屿（今福建金门岛）。这引起了福建人的不满，说胡宗宪不在浙江力讨倭寇，听任倭寇为祸福建。胡宗宪把责任推到俞大猷身上，昏庸的明朝廷竟把抗倭名将俞大猷逮捕，押往京师法办。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二月，戚继光率戚家军进驻台州。戚继光，字元敬，幼时“倜傥负奇气，家贫，好读书，通经史大义”。后继父职备倭山东，任登州卫指挥佥事。曾从俞大猷在岑港围困王直，因久未克复，被免职。嘉靖三十四年改任浙江都司参将，镇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之地。

戚继光见卫、所兵不习战，便多次在金华、义乌的矿工、农民中招募士兵，编练新军。他爱护士兵，但军事训练十分严格。他发明了火箭、弓箭、长短兵器结合使用的战法——鸳鸯阵，制定了适合南方水泽地带的战术；筹备军资精益求精，“一切战舰、火器、兵械皆精求而更置之”。这样，戚继光建立起一支意志坚强、训练有素的精锐之师——戚家军。

戚继光进驻台州之后，马上着手整顿海防，新造战船44艘，在海上巡逻。

嘉靖四十年（1561年）春，倭寇调集船只50余艘、2000余人企图登陆骚扰。由于戚继光在沿海布置了新造舰船，倭寇无机可乘，驾舟离去。四月十九日，

倭寇在宁海（今浙江宁海）大肆抢劫，企图调动戚家军离开台州。在当地民众的支持下，戚家军在新河城歼敌200余人。又不顾饥饿和疲劳，连夜急行军赶至台州城外的花街，迎头痛击奔袭台州的倭寇。倭寇纷纷逃遁。戚家军穷追不舍，把倭寇赶入江中，不少倭寇被淹死。花街一仗，戚家军击毙倭寇380人，缴获武器650件，解救被掳人口5000余人。戚家军还以少胜多，在上峰岭重创进犯处州（今浙江丽水）的倭寇，歼敌344人，缴获武器1490件，解救被掳人口1000余人。上峰岭之役后，逃遁的倭寇再次集结，以舰船18艘、2000余人在长沙（今浙江温岭东南）登陆。戚家军分3路突然逼近敌营，奋勇杀敌。敌船又遭台风袭击，淹死多人。这次战役，戚家军俘获敌人56人，缴获兵器3240余件，船只11艘，解救被掳民众1200余人。台州大捷，使戚家军声威大振，倭寇称戚家军为“戚老虎”。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二月，福建同安的倭寇袭破永宁卫城（今福建晋江东南）。倭寇还集聚6000余人包围并攻陷了兴化府城（今福建莆田）。朝廷此时又任命俞大猷为总兵官，戚继光为副总兵官负责东南剿倭。七月，戚家军离开浙江温州开赴福建。八月，在横屿（福建宁德东北）打了入闽后的第一仗，歼敌近千人，解救被掳民众800人。这年胡宗宪以严嵩余党的罪名被弹劾。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倭寇犯潮（今广东潮安）、惠（今广东惠州）。二月，又攻陷了平海卫（今

浙江莆田东南滨海地）。三、四月间，俞大猷、刘显歼灭了福清（今福建福清）的倭寇。戚继光再次自浙江入援福建，与俞大猷、刘显合攻平海卫。四月二十一日，戚继光指挥明军逼近倭营，敌2000余人迎战戚家军。戚家军先施放火器，轰鸣震天。（见图9）倭寇马队受惊，四处乱窜，践踏倭寇。戚家军在中路发动进攻，在俞大猷、刘显的配合下，大破倭寇。倭寇三面受敌，退入营中。明军发动火攻，延烧敌人营寨，倭寇溃逃。此役，明军杀敌451人，缴获兵器3961件，解救被掳人口3000余人。十月，倭寇1.5万余人又劫掠仙游（今福建仙游），戚家军英勇抗敌，连续打了12个胜仗，歼敌3000余人。十一月，倭寇加紧围攻仙游，戚继光指挥明军和民众顽强抵抗，等待援兵。十二月，浙江的明军来援，戚家军与之会合后发动进攻。戚家军奋勇杀敌，以火攻烧毁敌人营寨，杀敌498人，解救民众3000人，残敌仓皇逃走。福建倭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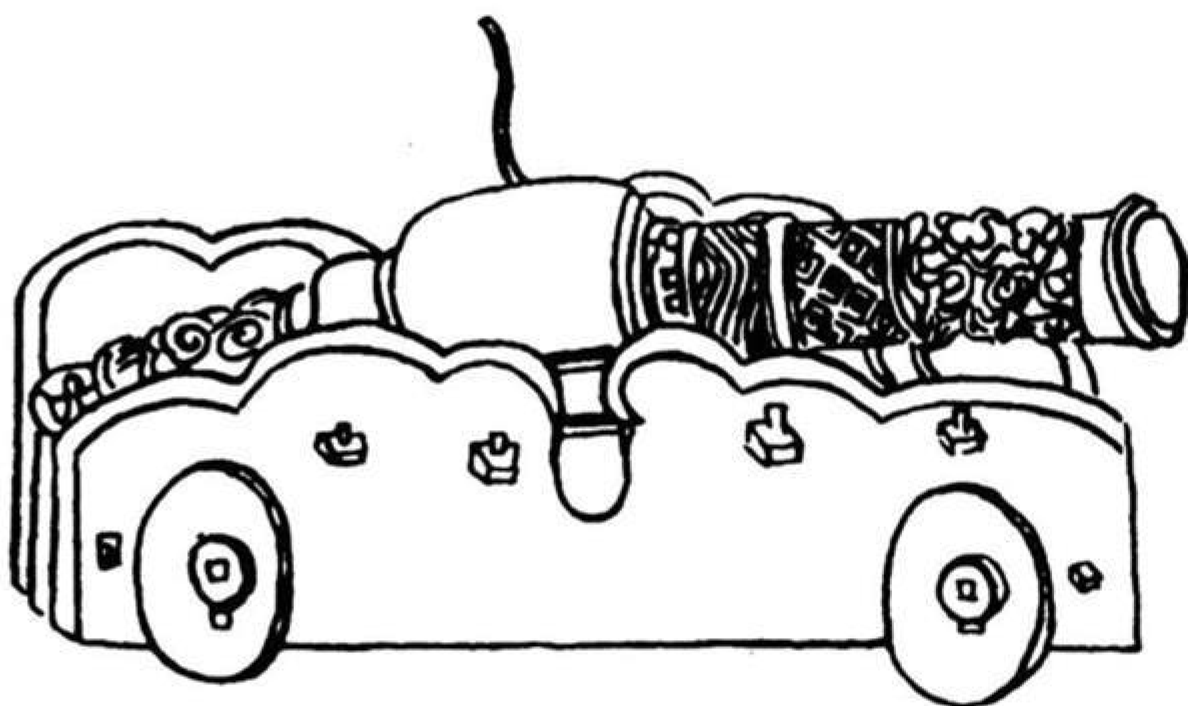


图9 明军使用的铜发熕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俞大猷在广东潮州、惠丰一带连破倭寇，歼敌1200余人，迫使与倭寇勾结的潮州大盗吴平投降，广东倭平。虽然以后仍有少量的倭寇侵扰，但已是强弩之末。至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困扰明王朝十余年，给江、浙、闽、粤、山东百姓造成巨大灾难的倭患和海贼之乱终于平息。

十六　王士性与《广志绎》

万历五年（1577 年），一个祖籍浙江临海的书生考中了进士，实现了封建社会许多知识分子的梦想，走上仕途。他的名字叫王士性。王士性，字恒叔，号太初，又号元白道人。他年幼时家境贫寒，被刑部侍郎、襄裕公宋沐收为养子。王士性天资聪慧，又十分勤奋，因而成人后文化素养很高。有人评价他写的赋如司马相如，文如班固，诗如李白、王维，可见文思不凡。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王士性非常爱提意见。有一次他给皇帝提意见说，朝廷不应该提拔那些为了保住自己官职而很少发表见解的人，这种人到了关键时刻根本不能依靠。他建议皇帝召还那些因提意见而被贬谪的人，在奏章中一次就开列了 16 个人的名单。但是，等待他的命运与以前的诤臣一样，他也被外放到京外去做官。外放为王士性游历祖国的大好河山提供了机会。他先后在北京、南京、河南、四川、广西、贵州、云南、山东等地做官。在任上，他认真记录了各地的关塞险要、物产民俗、山川名胜等情况。更可贵的是，王士性治学严谨，注重亲闻亲见，实地考察，

因而他的记录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况。他的笔记被编成《五岳游草》、《广游志》、《广志绎》3本书。

《广志绎》是一部地理书，共6卷。记录了明代两都、河南、陕西、山东、山西、浙江、江西、湖广、广东、四川、云南、贵州等地的情况，其中不乏与海疆及开发有关的资料。

该书在《江北四省》中记述了明初海运的情况：洪武十三年（1380年），朝廷曾通过海运把70万石的粮食运到辽东。朱棣执政后，疏浚了元时修建的会通河和济宁至临清的380里运河，兼用漕运、海运把南方的粮食调往北方。王士性在书中详细地记述了从江南运粮到北方的海路，并注明每一段海路的距离、行船的方向、所需的风向及可以停泊的港湾。王士性特别说明，若倭寇占据朝鲜，顺风乘渔舟就可以到达旅顺口，越海至登州，然后直抵天津，危及京都，出现十分紧急的情况，因而必须加以防备。

王士性在《广志绎》中对在哪里设置防倭据点发表了意见。他指出，自洪武年间起倭寇即开始侵扰登州和莱州，以后又入寇天津。倭寇之所以如此猖狂，是因为明军把备倭府设在了登州。而倭寇从釜山、对马岛乘东风来大陆，正好对着淮口。由于淮口有重兵防守，倭寇便把登陆地点选在安东、日照一带。这里数百里无兵把守，是海防的薄弱环节。倭寇登陆后，会进犯泰安、济宁、临清，对这些富庶的地方进行肆意掠夺，还可能进攻省城。王士性认为，正确的军事部署应该是机动灵活地调动部队，在航海期到来的时

候，把登州的军队调到胶州。这样，既可以南援安东、日照、安丘、诸城一带，也不会失去北援的时机。王士性的这些意见得到了朝廷的重视，后来便在安东派驻了军事机构，防御倭寇的袭扰。

在王士性的《广志绎》里还有明代海岛开发的记录：在登州、莱州的近海有长山、沙门诸岛。大岛方圆有十余里，小岛方圆也有二三里。这些岛屿上可以开发的荒地“以千万计”。为了弥补军粮的不足，当地驻军派新兵上岛，进行屯垦，收获了不少的粮食，使这些荒岛得到了有效的利用。

《广志绎》中记述了明代浙江沿海渔业、盐业的生产情况：鱼群由于产卵，每年3次从苏州的洋山游来。鱼来时，“如山排列”，轰鸣有声。每到鱼汛来临，宁波、台山、温州一带的渔民相继驾驶“巨舰”入海捕鱼。渔师用篙筒插入水中，侦听鱼的声音，鱼的声音向上，就下网。驾船使舟，掌舵人是关键。掌舵人白天查阅罗盘，夜里观测星斗，注意海上的风浪，避开暗礁险滩，是航行的总指挥。造船工匠的首领是“长年”。当时营造一艘船要招募工人20余名，船舶修造质量的好坏与长年的技术和经验有密切的关系。因而，渔师、舵师和长年的地位最高，他们可以同桌吃饭，其余的人则没有这样的权利。在渔业生产中，渔民怕打不到鱼，也怕鱼打得太多把船弄翻。曾经有过这样的情况：几条船联网捕鱼，网住的鱼太多了，只好割网，让鱼跑掉，免得船翻人溺。捕鱼后，渔船照例要回小浙港卸鱼，把鱼卖掉。港口内船舻相连，在甲板

上可以走十几里。每次鱼汛，一船鱼可得二三百金。也有的渔民因运气不好没打到鱼或打鱼很少，就要负债累累。于是获利的纵情欢乐，负债的则愁眉不展。但只要获利，便可抵10年的花费。王士性的描述是几百年前中国渔业经济的生动写照。

浙江也是盛产海盐的地区。《广志绎》中记载，当时海盐生产的过程是把夏天海涂上的土弄回来，加入海水，用柴草煎煮，以提取盐。当时海盐是按一定区域销售的，官府严格限制私盐买卖，派兵士搜捕私自贩盐的人。但“捕兵”只敢抓捕肩挑背负的单个盐贩，如遇到乡民几十、上百人组成的贩盐队伍，捕兵不但袖手旁观，而且躲得远远的。因为乡民们恨透了捕兵，抓住捕兵很可能置他们于死地，官府也很难审理这样的案子。

《广志绎》中有一段采捞珍珠的记述：明代采珠地点在合浦（今广西合浦县东北）东南百里的海中，其中平江、青婴出产的珍珠最为有名。当时的人认为，海中物产有各自的产地，珍珠只生于合浦。珍珠是从大蚌中“生”出来的，生珍珠与生小兔一样，是在中秋月圆之时。月明则“下种”多，月色昏暗则生得少。如果遇到万里无云的天气，在老蚌“晒”珠的夜晚，由于珍珠熠熠生辉，海天半壁都会银光闪烁。过去“蛋人”采珠，都是用长绳系在腰间，挎篮子潜入水中。拾到蚌就放在篮子里，然后摇动绳索，船上的人就会把采珠人拽出水面。如果遇到恶鱼，有股血水浮上海面，采珠人就葬身鱼腹了。据说，蚌有特别大的，

张开的蚌壳像两翼，也能把人食掉。后来改用沉网采蚌，危险就小多了。在珠池，有成百上千的人手持凶器抢劫珍珠，官府也不敢管理。那些惯盗都发了财；而官府花费很多金钱采珠，却收获甚微。更有甚者，有的官府与盗贼勾结在一起，控制珍珠的采捞和贩卖，使国家禁止盗采盗卖珍珠的法律形同虚设。

《广志绎》的记述十分广泛，除上述内容外，沿海抗倭、海南岛土著风情等无不涉及，留下了不少可贵资料。

十七　郑成功收复台湾

1662年2月1日，在台湾热兰遮城堡，荷兰统帅弗里德里克·揆（音 kuí）一代表评议会在投降书上签了字。郑成功收复台湾取得了彻底胜利。

台湾早在远古时期就与大陆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从长宾文化遗址出土的石器和骨角器看，自旧石器时代台湾与大陆就有着相同的文化。长宾文化打制石器的技术与湖北大冶石龙头、广西百色上宋村同时代打制石器的技术十分类似。经过鉴定，长宾文化距今大约1.5万年，当时大陆与台湾已被海水分隔。因而，旧石器时代的人很可能是划舟渡过海峡，到达台湾的。新石器时代，台湾与大陆东南沿海的原始文化也属同一类型，出土的断石锛、印纹陶片与大陆出土的极为相近。在汉末，台湾已被记入史籍，与大陆有了贸易往来。

隋、唐至宋代，史书中都有关于台湾的记载。宋代曾任福建提举市舶的赵汝适在《诸蕃志》中记述澎湖隶属晋江县。由于澎湖的开发，大陆与台湾的关系更加密切。宋神宗时，台湾多用大陆发行的钱币。清

乾隆年间，到过台湾的朱景英看到台湾仍有宋太平、元祐、天禧、至道年间的铜钱流通。

13世纪末，元朝设立澎湖巡检司管辖台湾、澎湖等岛屿，隶属于福建泉州路同安县（今厦门）。澎湖巡检司是我国在台、澎最早设立的国家政权机构。

明代，由于倭寇侵扰，曾一度撤销澎湖巡检司，把岛上部分居民迁到漳州、泉州一带。但随着与倭寇斗争日趋激烈，澎湖、台湾对海防的重要性日益显露出来。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明朝复设澎湖巡检司，并派遣军队驻守，在岛上修筑了海防炮台。从16世纪到17世纪中叶，台湾为一些地方政治势力所占据，把台湾作为军事训练和后勤补给的基地，对台湾进行着有效管理。

16世纪初叶，西方殖民主义者开始到达东亚。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荷兰殖民主义者曾两度侵入澎湖。天启四年（1624年），荷兰人占领台南。1626年，西班牙殖民者占领基隆。

荷兰人来到东亚后，疯狂地侵扰中国海疆。天启二年（1622年），荷兰殖民者的17艘舰船侵入澎湖，掳掠沿海居民1500余人，驱使他们修筑城堡，有1300多人被虐待至死。西方殖民者还把270名中国人贩卖到爪哇当奴隶，有幸活下来的只有137人。

荷兰殖民者对他们的暴行也供认不讳。当时荷兰驻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的总督彼德·卡本特在1624年1月3日写给东印度公司的信中承认：“我们的士兵包围在澎湖岛的一千一百五十人中国囚犯，其中

一半因极度忧伤、疾病、饥饿与强迫劳动而死亡。被遣送到这里的五百七十一个中国人，在兹里克兹船中就有四百七十三人在航海途中死亡。到达这里的九十八人中有六十五人在抵岸时因灌水过多而惨死，只有三十三人还活着。”

荷兰殖民者的野蛮行径激起了中国民众的愤怒和反抗。1623 年 10 月，3 营明朝的正规军在都督许一鸣、游击将军赵颇、坐营陈天策和把总朱良、王宗兆、李知纲的率领下痛击侵入厦门的“红夷”，使荷兰殖民者每天挨打，内外交困，心惊胆战，只好落荒而逃。

天启三年至四年（1623～1624 年），总兵俞咨皋率兵进攻澎湖，生擒荷兰将领高文律等 12 人，驱逐了殖民者，收复了澎湖。荷兰殖民者 2400 人逃到台湾，盘踞在台南一带，修筑了热兰遮和普罗文查城（赤嵌城），对台湾进行殖民统治。荷兰人以台湾为基地，多次进犯福建、厦门。当时受明王朝招抚的海上武装集团首领郑芝龙负责东南海防，与荷兰海军进行了多次较量。1633 年，郑芝龙集结战船 100 多艘，在金门料罗湾大败进犯的荷兰海军，俘获了敌舰“斯罗特迪克”号，使 4 艘敌舰受到重创，3 艘失踪，并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在这次战斗中，中国士兵表现出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有的战士浮水迫近敌舰，与敌肉搏，焚烧敌船，战死海疆。

在荷兰殖民者侵略台湾的同时，西班牙殖民者也染指台湾。1626 年，西班牙人入侵台湾基隆，并修筑山嘉鲁城堡。1628 年，西班牙人又侵占了沪尾（淡

水），修筑圣多明哥城。在争夺台湾的过程中，荷兰人与西班牙人发生了冲突，终于爆发了 1642 年的淡水之战。荷兰人打败了西班牙人，独霸了台湾。

荷兰殖民者残酷地压榨居住在台湾的汉族和高山族同胞，强迫人民交纳沉重的田租、人头税、狩猎税、鱼税等苛捐杂税。荷兰殖民者的暴虐统治激起了台湾人民无数次反抗。1652 年 9 月 7 日，终于爆发了以郭怀一为首的台湾人民抗荷大起义。由于叛徒告密，起义仓促举行，郭怀一率领 1.6 万民众夜袭赤嵌城。赤嵌城内火光冲天，愤怒的中国人到处打击荷兰殖民者。由于起义组织得不严密，起义者手中的武器只是些锄头和木棍，起义失败了，郭怀一英勇牺牲。荷兰殖民者疯狂地镇压起义者，使用了五马分尸、剖开肚皮、活活烧死、在车轮下轧死等凶残手段屠杀群众，杀害中国同胞达 4000 余人。荷兰殖民者的暴行激起了中国人更大的愤怒。中国人没有被吓倒，反而更加坚定了收复祖国宝岛、驱逐殖民者的决心。郑成功就是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民族英雄。

郑成功（1624～1662 年）名森，字大木，是郑芝龙的儿子。

为了收复台湾，郑成功进行了长期的准备。首先，他积极筹措军用物资。永历七年（1653 年，清顺治十年），他在福建云霄一带征粮 5 万斤，在龙岩征银饷 20 万两。永历十三年（1659 年，清顺治十六年），他从六合（今江苏六合）运米万余石。为了海上作战，郑成功大力建造战船，仅两个多月就造船 300 余艘。广

大人民群众也积极献船、献工，踊跃应募当兵。郑成功的军队迅速扩大，陆师有 72 镇，水师有 20 镇，总兵力达十几万人。郑成功还积极侦察台湾的各类情况。当时有个叫何廷斌的人很受荷兰人信任，搜集了大量荷军兵力配备、炮位、航线方面的情报，绘成地图，于永历十三年到厦门交给了郑成功。由于有了这些准备，1661 年（永历十五年，清顺治十八年）3 月，郑成功自厦门移师金门。郑成功将收复台湾的军队分成两批，他亲率马信、周全斌、肖拱宸第一批进军台湾。

4 月 21 日，郑成功所率官兵自金门料罗湾出发，次日抵达澎湖。百姓带着鱼虾猪羊慰问郑军，并自愿做向导。由于粮食有限，郑军冒着大风大浪起碇进军。4 月 30 日拂晓，郑军抵达台湾鹿耳门港外。从外海进港有两条水路，一条是南航道，口宽水深，但敌军防守严密；另一条是北航道，航道狭窄，有浅滩，长数十里，只有涨潮时才能够通过，敌军防备松懈。由于有熟悉航道的人引导，又掌握了潮汐情况，郑军大胆决定出奇兵从北航道进攻。时至中午，海潮大涨，郑军在何廷斌的引导下顺利通过鹿耳门，进入内海。荷军来不及调整炮位，惊慌失措。当晚，郑军成功地在禾寮港登陆，建立了进攻基地。台湾人民热情地欢迎郑军的到来，他们送水送粮、出人出车支援祖国的军队收复台湾。

郑军登陆后，积极调动部队，包围了赤嵌城。为了援救赤嵌城的荷军，荷兰殖民者派遣 200 余名士兵赶赴赤嵌城。郑军在台湾百姓的支援下在海上、陆上

节节阻击荷军，使荷军伤亡惨重，只有60名荷军登陆，其余荷军被迫退回台湾城。在海上，郑军用60艘战舰包围了荷军4艘舰船，用猛烈的炮火很快击沉了敌人最大的军舰“赫克托”号。中国士兵英勇作战，用铁链套住敌舰“斯格拉弗兰”号的船头斜桅，登上敌舰，砍断敌舰船索，与敌人展开肉搏战。这次海战击沉敌舰1艘，烧毁1艘。郑军的一系列胜利迫使荷军龟缩在城堡里，再不敢出战。5月4日，由于赤嵌城中缺少淡水，荷兰守军投降。

攻克赤嵌城后，郑军又组织进攻热兰遮城，即后人所称的台湾城。热兰遮城堡周长277丈，高3丈，建造得十分坚固。城堡上设置了数十门大炮，火力密集，射程远。5月，郑成功指挥军队从南面攻城，城内荷军一片混乱，竟放火焚城。为了节省弹药和粮食，减少伤亡，郑成功采用了长期围困的方法。同时，他又采用多种办法稳定台湾人民的生活，受到了台湾人民的拥护。

在长达8个多月的围困中，郑成功克服了许多困难，挫败了荷兰殖民者数次反扑。围困使荷军损失严重，不少士兵因疾病死亡，能战斗的人员不足600人。1662年1月，郑成功攻占了乌特利支堡，在城堡上修建了炮台，居高临下对热兰遮城进行炮击，荷兰殖民者终于绝望了。经过谈判，揆一于同年2月1日率部投降。至此，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的战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台湾在沦陷了38年后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十八 璀璨明珠耀南海

从空中俯视中国的南海，可见在湛蓝的海面上分布着一串串翡翠般的环礁。南海群岛是由一系列环礁、沙洲和暗礁组成的。这些环礁、沙洲、暗礁构成了南海上的几个大群岛——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

东沙群岛由东沙岛、南卫滩、北卫滩等岛礁组成。其中东沙岛最大，长 2800 米，宽约 700 米。

西沙群岛由 30 多个岛、礁、滩组成。东部群岛称宣德群岛，其中永兴岛是南海诸岛中最大的岛，面积 1.85 平方公里；西部群岛为永乐群岛。

中沙群岛由 20 余座未露出水面的暗沙、暗礁组成，分布在长约 75 海里、宽 33 海里的海域内。

南沙群岛位于南中国海南部，由 200 余座岛、洲、礁、滩组成，南北长 500 多海里，东西宽 400 余海里。其中露出水面的岛礁、沙洲有 20 余座，主要有北子岛、南子岛、中业岛、太平岛、景宏岛、马欢岛、曾母暗沙等。太平岛最大，面积 0.43 平方公里。

南海诸岛周围有丰富的石油资源、磷矿资源和水

产资源。

南海诸岛自古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少文献证明，南海诸岛是中国人最早发现的。

东汉时，杨孚在《异物志》中记载：“涨海崎头，水浅而多磁石。”

三国时，万震在《南州异物志》中记述：自中南半岛回航中国途中，“东北行，极大崎头，出涨海，中浅而多磁石”。东吴曾派遣康泰、朱应前往扶南（今柬埔寨），他们路过南海，准确地记述说：“涨海中，到珊瑚洲，洲底有磐石，珊瑚生其上也。”

“涨海”指的就是今天的南海，“崎头”是指南海中巨大的浅滩。古代航船在浅滩上搁浅，就如同被磁石吸住了。

自宋代起，中国人开始用“石塘”、“长沙”、“千里长沙”、“万里石塘”来称呼南海诸岛。

宋代有 7 种图籍记述了南海诸岛，其中有 5 种称呼。《宋会要》记天禧二年（1018 年）占城人来中国时说：“国人诣广州，或风漂船至石堂，则累岁不达矣。”“石堂”即“石塘”。

《宋会要》中记载：“真里富”人“欲至中国者，自其国放洋，五日抵波斯兰，次昆仑洋，经真腊国，数日至宾达椰国，数日至占城，十日过洋，傍东南有石塘，名曰万里，其洋或深或浅，水急礁多，舟覆溺者十七八，绝无山岸，方抵交趾界，五日至钦、廉州”。

南宋周去非所著《岭外代答》（作于 1178 年）中记：“传闻东大海洋，有长砂、石塘数万里，尾闾所

泄，沦入九幽。”

王象之《舆地纪胜》记：“（吉阳）其外则乌里苏密吉浪之洲，而与占城相对。西则真腊交趾，南则千里长沙，万里石塘，上下渺茫，千里一色，舟舶往来，飞鸟附其颠颈而不惊。”

赵汝适《诸蕃志》记：“吉阳，乃海之极，亡复陆涂。外有洲……南对占城，西望真腊，东则千里长沙，万里石床。渺茫无际，天水一色。”

其他图籍如《诸蕃图》、《方舆胜览》也有类似记载。其中“长砂”、“长沙”、“石塘”、“石床”，“万里石床”、“千里长沙”都是指南海诸岛。从距离远近看，宋时的“长沙”是指今西沙群岛，而“石塘”应是指今南沙群岛。

元代记述南海诸岛的文献有4种。汪大渊《岛夷志略》一书记述：“石塘之骨，由潮州而生，迤逦如长蛇，横亘海中，越海诸国俗云：万里石塘……故源其地脉，历历可考；一脉至爪哇，一脉至渤泥及古里地闷，一脉至西洋遐昆仑之地，与中原地脉相连者，其以是欤。观夫海洋，泛无涘涯，中匿石塘，孰得而明之，避之则吉，遇之则凶。”

汪大渊所记地脉由潮州向南延伸，分为3支：至爪哇（今印度尼西亚），至渤泥（今加里曼丹）、古里地闷（今帝汶），至西洋遐昆仑之地（今加里曼丹一带海域）。这包括了南海诸岛分布的广阔海域。

《元史》中记史弼率军攻打爪哇时说：“过七洲洋、万里石塘，历交趾、占城界。”是说先经七洲洋（西沙

群岛一带海面)，又历万里石塘（今西沙群岛）而过交趾、占城界。

《琼海方舆志》也记有“千里长沙”、“万里石塘”。

明代记载、标绘南海诸岛的图籍有20余种。在《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1402年）上，在南海自东北而西南标出每个石塘和一个长沙。从交界国家地名判断，东北石塘应指东沙群岛，中间长沙应指西沙群岛和中沙群岛，南部石塘当指南沙群岛。

这一系统的地图，尚有16世纪成书的《广舆图》及其以后的《皇舆考》、《古今图书编》、《海防纂要》、《东西洋考》、《武备志》、《今古舆地图》、《地图综要》等图籍。但图中大多只画1个石塘、1个长沙，其位置石塘在北，长沙在南。因此石塘应指西沙群岛，长沙应指南沙群岛。

明代，关于南海诸岛的称谓尚有“千里长沙、万里石塘”、“千里石塘、万里长堤”、“万里石塘、万里长沙”。“万里石塘（山）”等，也是指今中沙群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诸群岛。

清代，记述南海诸岛的图籍有70余种。其中，《四海总图》系统的地图与上述《广舆图》系统的地图不同，在南海标绘出“气”、“沙头”、“长沙”、“石塘”、“七洋洲”。图中方位表明：“气”即“南澳气”，指东沙群岛；“沙头”即万里长沙头，指东沙群岛南延的沙埂；“长沙”指中沙群岛；“石塘”指南沙群岛；“七洋洲”则指西沙及其附近海域。

《海国见闻录》中说："七洋洲，在琼岛万州之东南，凡往南洋必经之所……对针亦必六、七日，始得渡过，而见广南咕哔啰，外洋之外罗山，方有准绳，偏东则犯万里长沙、千里石塘，偏西则恐溜入广南湾。"其中"七洋洲"应指西沙群岛及其海域，"万里长沙"应指中沙群岛，"千里石塘"应指南沙群岛。

从上述文献可以证实，是中国人最早发现并记述了南海诸岛。

中国人不仅发现了南海诸岛，并且很早就在这些岛屿及其周围海域进行生产开发活动。早在1000年前的晋代，中国人就在东沙群岛进行开发活动。裴渊在《广州记》中说："珊瑚洲，在（东莞）县南五百里，昔人于海中捕鱼，得珊瑚。"到了明、清时代，一些渔民曾在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的部分岛屿上居住，开垦土地，挖掘水井，种植蔬菜和椰树。有些居民在岛上修建了祠庙，人死后就被埋葬在岛上，因此岛上遗留着中国人的墓地和墓碑。

近年来，在西沙、南沙的一些岛屿上发现大量中国人生活、生产的遗迹和遗物，有居址，有陶瓷器皿，有铁刀、铁凿、铁锅等金属制品。出土最多的是陶瓷器，数量有几千件。从年代看，远至南朝，隋、唐、宋、元、明、清一直到近代的遗物都有。这说明自古以来，勤劳勇敢的中国人历经磨难，在南海诸岛扎下了根基。

另外，在岛礁邻近的海域还发现了中国的沉船。在西沙群岛北侧的海域中曾发现1艘明代的沉船，打捞出汉代至明代的铜币400多公斤以及铜锭、铜铳、

铜镜等文物。

中国政府最早对南海诸岛行使了管辖权。

《武经总要》这部书中记载：宋朝曾在广东沿海设置水师营垒，派水师到“九乳螺洲”巡洋。“命王师出戍，置巡海水师营垒……从屯门山用东风西南行，七日至九乳螺洲”。“九乳螺洲”即今天的西沙群岛一带。

明代黄佐在《广东通志》中记载：“督发兵船出海防御……自东莞之南亭门放洋，至乌潴、独潴、七州三洋，星盘坤未针，至外罗。”这次巡防的海域也在今西沙群岛一带。

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 年）至五十一年，朝廷派遣广东水师副提督吴升在西沙一带巡狩。1909 年，两广总督张人骏曾派遣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率水师官兵前往西沙，勘察命名，鸣炮升旗，重申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清代不少中国图籍也载明，南海诸岛归广东省管辖。在 19 世纪 30 年代成书的《洋防辑要》中，在《广东洋图》上明确标出九乳螺洲（即西沙群岛）归广东府管辖。清廷还多次抗议外国政府对中国南海诸岛的侵犯。

南海诸岛属于中国这个事实也为先期到达南海的西方人所承认，最早到达南海的葡萄牙人对南海诸岛屿的称呼大都音译或意译自汉文。在 16 世纪的葡萄牙文献中，就把北至珠江口外的广大海区中的岛屿称作“中国诸岛”或“广东诸岛”。

事实证明，自古代南海诸岛就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是中国伟大版图上的颗颗璀璨明珠。

十九　捍海金堤献良田

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古代，人们就提出了人定胜天的口号。

在生产力落后的古代，建筑堤坝阻挡狂风巨浪的侵袭是极为困难的。大陆上的河流，特别是黄河、淮河、长江，每年携带大量的泥沙入海，在浅海淤积，形成冲积平原，为围海造田提供了条件。经过古代劳动人民世世代代的努力，不少滩涂变成了良田。

我国劳动人民很早就学会了建筑堤坝。在中国古老的神话传说中，夏人的祖先鲧就利用“息壤”阻止了洪水泛滥。

在古老的文献中，有很多关于修筑堤坝的记述。《管子·度地》记载，当时的诸侯派士兵在洪水期修筑堤坝。春秋时代，规模大的堤坝称作“堤”，规模小的称作“防”。《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中有“弃诸堤下”的话，说明那时已有了堤防。

堤又称作“塘”。《庄子·达生》中有“被发行歌，而游于塘下”的句子。《旧唐书·高瑀传》中记载，高瑀召集州民，围绕城郭修筑了堤塘180余里。

堤又称作“堰”，堰是较低的小堤。南朝梁的沈休文在诗中说：“东出千金堰、西临雁鹜陵。”

堤又称“圩”（音 wéi），称“坝”，圩中的耕地称为圩田。

传说中，最早修筑拦海堤坝是在秦汉之际。楚将龙且、汉将韩信，先后组织农民在海州（今江苏东海县及连云港地区）修筑挡海大堤，被人们称为龙且堰、韩信堰。

东晋咸和年间（326～334 年），吴国内史虞潭筑防海垒，也被称为捍海塘。北齐天保年间（550～559 年），杜弼主持整修韩信堰，并新修筑了一些堤防。隋开皇年间（581～600 年）又对这些堤坝进行了修补。

唐开元年间（713～741 年）开始修筑较大规模的海堤——捍海塘。捍海塘起自杭州盐官（今浙江海宁），东经海盐、平湖、金山、华亭、奉贤、南汇至上海吴淞江入海处，全长 130 里。

宋天圣四年（1026 年），泰州西溪盐官范仲淹提议建设捍海堰。后在发运副使张纶的主持下，完成了此项工程。捍海堰全长 180 余里，险要堤段用巨石砌垒加固。这一巨大的海防工程建成后，使江北大量滩涂变成良田，当地农业生产发展迅速。为纪念范仲淹，人们称捍海堰为范公堤。其后，范公堤又经过沈起、詹士龙等人主持加筑修整，向东南方延伸至吕四港，向北延伸到阜宁县。这样，范公堤长度增加了一倍半，全长达 500 余里。

宋代，江南的海堤也不断加筑。乾道年间

(1165～1173年)，江南捍海塘得以加固，并且设置了闸门。平时利用闸门阻挡海水侵灌，用淡水洗刷土壤盐分；洪水时则开闸泄洪以确保大堤的安全。

元朝对海堤进行了大量的修复工作，大德五年(1301年)和至正二年(1342年)分别对华亭段大堤进行了修复。

宋、元时期，珠江三角洲也兴建了一些规模较大的围海造田工程。

明清两朝也不断维修沿海大堤。据不完全统计，明清两代大规模修筑海堤的记载有30余次。

兴修海堤工程主要是在江浙一带。江苏海塘分为江南与江北两段：江北海堤起自阜宁，经盐城、东台、金沙直抵吕四，全长500余里；江南海堤自金山、华亭(松东)、奉贤、南汇、川沙至宝山，其中部分塘段是民间自筑的土塘，宝山以西与江塘相接，金山以西与浙江海堤相接，全长也有500余里。浙江是海塘修建的重点地区，这里风疾潮猛，海浪经常冲毁堤防，淹没田地，对沿海城市造成极大威胁。浙江的海塘分为两段：钱塘江和杭州湾北岸杭县、海宁、海盐、平湖4县江塘、海塘相接，杭县乌龙庙以西为江塘，东为海塘；杭州湾南岸萧山、绍兴、上虞3县西段为江塘，东段为海塘。

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世世代代建筑海塘、围海造田的活动中，积累了不少经验。最早修筑海堤的方法是堆土成堤。《水经注》中记载：汉时，钱塘一带常被海潮袭击。郡议曹华信出了一个主意，宣布凡是送来

"一斛"土石的，给钱一千。于是，四面八方送土的人络绎不绝。可当他们把土石运钱塘后，华信并不给钱。于是，人们把运来的土石纷纷倒掉。这样防海大堤就建成了，取名为"钱塘"。这个传闻当然不可靠。但早期的海堤确是以土为主修筑的，边填土，边夯实。即使这样，也很难抵挡海水的冲刷，尤其江浙一带潮水汹涌，就更难阻挡。因而年年加修，岁岁填筑，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

较早保护堤坝、抵御海水冲刷的方法是在堤外投石加固，或放置柴捆、草把护坝抵挡海浪。但小块石头很快就被海浪卷走，难以奏效。以后护堤筑堤的技术日臻完善，出现了不少行之有效的办法。

在元代，曾用"石囤"、"木柜"加固堤坝。元泰定三年（1326 年），海潮汹涌，都水少监张仲仁率领民工为堵塞溃堤投下石囤 443300 多块，置木柜 470 多个。

清代文献中，对"木柜"的形态记述得尤为详细。木柜多用耐水的松、杉木制成，长约 1 丈，宽约 4 尺，横放在堤的底部，用石块填实，形成一个抗水的整体。在木柜上再放置大块石料，以抵抗海浪冲击。

清代石塘的建筑水平也不断提高。康熙五十五年（1716 年），朱栻、张恕可在修筑三郎庙前子塘地段的海堤时，由于风急浪大，连续修筑了 3 次都没有成功。于是，他们改进了筑堤办法，把石料一纵一横放置，每层都凿出石眼，用木梢把上下五六块石块连在一起。用时，在石与石之间用铁锔横竖连接，使 20 余丈长的

石堤连成了一体。经过这样加固，这一险段的石堤才重新矗立起来。

鱼鳞塘是清代基本的筑堤模式。筑堤的方法是在塘基打入密集的梅花桩，用三合土打底，使地基稳固。其上用长5尺、宽1尺2寸，厚1尺的石条，垒砌18层或20层。用油灰嵌缝，避免渗漏。同时在塘内加土填筑。这样的筑堤方法十分有效。在雍正元年（1723年）的一次大海潮中，其余的塘坝大多毁坏，惟有鱼鳞塘安然屹立。于是，在不少海潮汹涌的地段都建设了鱼鳞塘。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完成了海宁段的鱼鳞大石塘，全长达百里。后来，这段石塘又在同治、光绪年间得到修缮。

在围海堤坝上修建闸门是中国古代水利工程的又一发明。这样，既可以有效地挡住海潮侵袭，又可以控制淡水流量，旱时蓄水，涝时排水，保证了农业灌溉和洗盐改土的需要。明嘉靖十六年（1537年）郡守汤绍恩主持修建的三江闸，成为绍兴、萧山两县的水利枢纽。三江闸有28个孔道，蓄排自如，使绍兴、萧山一带的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

为了使受海水侵蚀、盐渍十分厉害的土地成为高产良田，农民采取开沟排盐、引水洗盐、种植耐盐碱植物、适当浅耕等方法改造沿海土地。

明代的邱濬在总结劳动人民治土的经验后说：滨海地方，大多为咸卤浸渍，必须用河水冲刷，才能使这些地方变成良田。津沽一带，有多条入海的大河流，然而河水直接泄入海中，用于灌溉的不多。应该在河

流下游横向开凿一些沟渠，汇聚各条河的水流，统一调度。在低洼的滩涂上修筑长堤，在适当的地方修筑水门。关闭闸门可以拦截堤外的咸水，开启闸门则可以导流泄洪。经过淡水冲洗后，盐碱地便可以成为良田了。

另一位农学家袁黄也在《宝坻劝民书》中提出：滨海之地，潮水来往，大量泥沙淤积，咸草丛生。治理这样的土地，只有开凿沟渠，修筑堤岸，打桩建墙，挡住潮水。在这样的土地上耕作，要采取特殊的农艺技术，田垄的形状要中间高、两边低。十来丈的距离就要开小沟，百来丈的距离就要开中沟，千来丈的距离即要开大沟。经过雨水、河水一段时间的冲刷，耕地上就可以种植植物。开始时，应种植一些耐盐碱的稗草。待盐碱消尽后，就可以逐步种植水稻。

经过古代劳动人民的辛勤耕耘，沧海变桑田，长江、淮河、闽江、珠江及黄河入海口的大片土地变成了良田。

二十　东北海疆被侵犯

黑龙江流域、乌苏里江流域和库页岛很早就为中国政府所管辖。唐开元十年（722 年），朝廷在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交汇处设立了勃利州（今俄罗斯伯力），黑水靺鞨酋长倪属利稽被任命为勃利州刺史。开元十三年（725 年），唐设置黑水军，管辖黑龙江中下游地区。开元十四年（726 年），朝廷又设立管辖黑龙江中下游的黑水都督府。

元代，黑龙江下游、库页岛属水达达路管辖。朝廷在庙街（今俄罗斯尼古拉耶夫斯克）置征东元帅府，在沿江、沿海的许多地方建立了驿站。

明代，黑龙江中下游地区为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管辖。永乐七年（1409 年），朝廷在黑龙江出海口处设立奴儿干都指挥使司（在今俄罗斯境内黑龙江入海口处），下辖 400 多个沿江河、海岸线设置的卫所。永乐九年（1411 年），朝廷派钦差、太监亦失哈率军千余人，乘舟 25 艘，沿黑龙江而下，巡视奴儿干地区。第二年，他来到库页（苦兀）岛上，抚慰当地居民，并在岛上建立了囊哈儿卫和兀烈河卫。

俄罗斯在15世纪中叶实现了统一。自15世纪下半叶至16世纪下半叶的100多年里，俄罗斯不断向外扩张，至17世纪上半叶征服了西伯利亚，开始接触远东地区。

1638年，受西伯利亚当局的委派，一个名叫伊万·莫斯克维金的人率领30余名哥萨克兵向远东进发，试图寻找新土地和银矿。1639年，这些人抵达鄂霍次克海沿岸的乌利亚河口，第一次听说有一条向东流入大海的河流，其附近有银山。俄国人承认，这是他们得到的“关于黑龙江地区最早的消息”。莫斯克维金回到西伯利亚后，关于东方宝藏的消息迅速传播。1643年，在沙皇的支持下，瓦西里·波雅科夫带领由132人组成的远征军经精奇里江，进入黑龙江流域。波雅科夫一伙沿途焚毁村庄，强迫当地居民提供粮食和貂皮。在冬季，他们竟然杀死50多个达斡尔人充作口粮。沙俄殖民者的暴行激起了当地居民的反抗，他们用弓箭、长矛痛击侵略者。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波雅科夫的侵略军已剩不足70人。1645年夏，波雅科夫带领剩下的士兵逃出黑龙江口，在海上挣扎了84天才登岸，回到雅库次克。

17世纪40年代，沙俄军队强占了尼布楚（今俄罗斯涅尔琴斯克），修筑城堡，作为向东进攻雅克萨（今俄罗斯阿尔巴金）的据点。1650年，沙俄侵占了雅克萨，把雅克萨作为修造船只、贮存军火的基地。

清顺治七年（1650年），沙俄商人叶罗菲·哈巴罗夫纠集100多人，携带3门火炮，侵入黑龙江流域。

哈巴罗夫此行携带了西伯利亚当局奉沙皇命令起草的一封给“博克达汗”（即清朝皇帝）的信件，信中公然要求博克达汗归顺，否则沙俄就要动用武力。这封信充分暴露了沙俄的侵略野心，同时也从反面证明，沙俄很清楚，黑龙江流域是有主权国家统治的，并非是“无主土地。”

1651 年，哈巴罗夫率沙俄殖民者来到桂古达尔城。他们用大炮轰塌城墙，血洗全城，屠杀当地居民 661 人，劫持妇女 243 人及儿童 118 人。10 月，殖民者进入伯力地区。当地居民到宁古塔（今吉林宁安）向清朝官员报告了沙俄殖民者的暴行，请求派兵进剿。1652 年 4 月，中国军队在当地居民的协助下，在乌扎拉村打死沙俄殖民者 10 余人，击伤了包括哈巴罗夫在内的 78 人。哈巴罗夫乘 6 只木船，溯江而逃。与此同时，中国军队又击退了一支从雅库次克来的沙俄援军。俄军狼狈溃退，一直逃到黑龙江口，经过一个半月，才回到雅库次克。

1653 年夏，沙俄又派出 300 余人进入黑龙江流域，并派奥努弗里·斯捷潘诺夫取代哈巴罗夫指挥沙俄侵略军。为了抗击沙俄侵略军，清廷在宁古塔设立昂邦章京（后改称宁古塔将军），首任指挥为沙尔虎达。

1654 年 5 月，沙尔虎达率水陆军 700 人在松花江巡逻时，与斯捷潘诺夫带领的 370 名沙俄侵略军相遇。沙尔虎达有勇有谋，利用地形诱敌登岸，待部分侵略军登岸后，挥军突然反击，用炮火轰击江中的俄军舰船。同时清军舰船也开始冲击敌船，岸上的骑兵追杀

敌军。沙俄侵略军不得不狼狈逃窜，回到呼玛尔。

1655年初，清朝廷派固山额真（都统）明安达里率军自京师出征，试图剿灭盘踞在呼玛尔的沙俄侵略军。清军抵达呼玛尔之后，给予敌军以沉重的打击。但由于粮食不足，未能拔除在呼玛尔的沙俄侵略军据点。

1658年夏，沙俄政府派遣斯捷潘诺夫率领500哥萨克兵进入松花江流域。沙尔虎达率清军分乘47艘船巡防时，在松花江口库尔干河上与沙俄侵略军相遇。清军船队首先用大炮把哥萨克兵驱赶到岸上，再以步骑兵突袭。俄军乱成一团，少数向上游逃窜，大部分投降或被击毙。此役，清军俘虏沙俄侵略军270人，斯捷潘诺夫被打死。

清廷十分重视北方防务，“移宁古塔将军驻乌拉鸡陵（吉林市），建木为城，统新、旧满洲兵二千，并徙各省流人数千人，修造船舰四十余艘，又有江船数十，日习水战，以备老羌（俄罗斯人）”。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二月，清廷派郎谈、彭春等人侦察俄军的防务，并向瑷珲、呼玛尔（今黑龙江呼玛）增兵，命宁古塔将军巴海、副都统萨布素密切监视沙俄军队的动向。二十四年（1685年）正月，清廷决定驱逐沙俄军队。5月，清军都统彭春、副都统郎谈、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水陆军抵达雅克萨城，以600名八旗兵、420名福建藤牌兵和瑷珲驻军2000人的兵力，包围了雅克萨城，并派出10艘舰船封锁江面。24日，清水军在江面上击溃来自尼布楚的沙俄援

军，杀敌30余人，其余敌军逃走。雅克萨的敌守军在后援无望的情况下，出城投降。清军平毁了雅克萨城后，返回黑龙江城（今黑龙江爱辉）。7月，沙俄军队卷土重来。沙俄侵略军由托尔巴辛统帅，有兵670人，携带5门铜炮、3门铁炮。他们重新修建了雅克萨城，城高3米，厚8米，并设有多处炮位。其后，盘踞在雅克萨的沙俄军队增至800余人。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6月，清军在萨布素统率下开始攻击雅克萨城。俄军多次突围都未取得成功，托尔巴辛中炮毙命。清军在重炮不多的情况下，在雅克萨城周围挖掘壕沟，围困城堡中的沙俄军队。城中俄军缺衣少粮，不少人因饥饿病疫死亡。次年春，沙俄侵略军只得“求和”，此时俄军只剩下60余人了。雅克萨之战的胜利，有力地遏制了沙俄继续侵略的野心。

1689年，在中国政府做了让步之后，中俄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条约规定：“以格尔必齐河为两国之界，格尔必齐河发源处为石大兴安岭，此岭直达于海，亦为两国之界。凡岭南一带土地及流入黑龙江大小诸川，均为中国管辖。”同时规定：“又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亦为两国之界，河以南诸地尽属中国。”依此条约，黑龙江流域、乌苏里江流域以及滨海地区，包括库页岛在内，均是中国的领土。

1848年9月，沙俄海军部派遣涅维尔斯科依海军大尉到黑龙江流域进行“勘察”活动。他从喀琅施塔得港出发，乘坐“贝加尔”号军舰，穿越大西洋，绕

过南美洲，横跨太平洋，于1849年5月到达堪察加半岛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6月，“贝加尔”号侵入中国管辖的库页岛和黑龙江口。7月，该舰在黑龙江入海口附近“勘察”，并闯入黑龙江内河。8月5日，涅维尔斯科依通过鞑靼海峡，才知道库页岛不是半岛，而是海岛。他乘船从黑龙江驶出后，又在江口以北的地方找到一个可以停泊大船的海湾，起名为“幸福湾”。

1850年7月，涅维尔斯科依率武装人员乘“鄂霍茨克”号船再次侵入中国水域，在“幸福湾”登陆。其后，他又率军非法沿黑龙江上行。清朝地方官员对涅维尔斯科依侵犯中国主权的行径提出了抗议。8月13日，涅维尔斯科依强占黑龙江海防要地庙街，建立哨所，并升俄军军旗。

1853年7月26日，涅维尔斯科依率军乘“贝加尔”号驶向库页岛。库页岛位于黑龙江口外大海中，总面积7.6万多平方公里。8月11日，沙俄侵略军在库页岛上建立了哨所。此后，他们又在岛上开采煤炭，为“俄美公司”提供燃料。

1858年5月28日，清廷被迫与沙俄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通过这一条约，沙俄强占了中国黑龙江以北的广大土地。条约还规定，乌苏里江以东地区为中俄“共管”。

1860年11月14日，清廷被迫与沙俄签订了另一个不平等条约——《北京条约》。根据此条约，沙俄又侵占了中国乌苏里江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沙俄通

过两个不平等条约占据了中国近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沙俄的侵略行径激起了中国民众的激烈反抗，人们自发地组织起来，以简陋的武器打击沙俄侵略者。沙俄的侵略行径也受到世界舆论的谴责。在沙皇俄国迫使中国政府签订《中俄瑷珲条约》后，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撰文谴责了沙俄的侵略行径，揭露了沙俄的扩张野心。

二十一　近代海军的建设

在近代，由于列强进犯大多来自海上，因而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对保卫海疆至关重要。

清（后金）水师建立于天命元年（1616 年）。这年，后金水师沿乌勒简河征伐了东萨哈连部落。依靠这支水军，后金还征服了东海（今日本海）沿岸的使犬部落。

皇太极天聪七年（1633 年），明水军内部倾轧，孔有德率部分水军投降了后金，大大增强了后金水军的实力。进关后，清水军逐步发展，分别戍守内河和外海。奉天、直隶、山东、福建、广东的水师肩负着守卫外海的任务。朝廷曾令“各镇总兵官每两月会哨一次。其会哨之月，上汛则先巡北洋，后巡南洋；下汛则先巡南洋，后巡北洋。定海（今属浙江）、崇明（今属上海）、黄岩（今属浙江）、温州（今属浙江）、海坛（今属福建）、金门（今属福建）、南澳（今属广东）各水师总兵官，南北会巡，指定地方，蝉递相连……”

嘉庆年间，清廷已感到旧式舰船难以抵御列强的

进犯。于是，调集四川、湖广的巨木，赶制“坚船”，式样也开始模仿西式中等兵船，旧式船舶一律停造。

道光年间，外敌多次进犯海疆，有识之士开始仿造或向西方购买新式舰船。1840 年 4 月，广东曾仿制成功新式战船，并向美国购买了 1 艘兵船。7 月，宁波有人结合中国传统的“车轮舸”和英国战船样式，研制成车轮兵船，使外国人大为惊讶。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后，清廷更加重视新式舰船的制造，赶制了一批战船，并在船上增加了炮位。沿海诸省的士绅也纷纷捐款，购买新式兵船。1842 年，绅商购得吕宋兵船 1 艘，驾驶灵便，“足以御敌”。朝廷决定将该船编入现役，并要绅商多方购买。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出现了兴办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的高潮，建设新式海军是这场洋务运动的中心。

1861 年，清廷委托海关总税务司英人李国泰在英购置兵船。李国泰不经中国政府同意，擅自超过原定价格购置了 7 艘兵船和 1 艘运输船。他擅自雇佣了 600 名英国人充任船队水手，并使用英人阿里本担任舰队总指挥。他在与阿里本签订的合同中规定，阿里本可以全权指挥舰队，除皇帝的命令之外不接受任何人的指挥。而皇帝的命令需由李国泰传达，李国泰不同意，可以拒绝传达。这支舰队实际上掌握在英国人的手里。

中国政府理所当然地拒绝了这些条款。几经周折，最终虽花费了 100 余万两银子，清廷却 1 条船也未得到。第一次组建海军彻底失败。

1862年，曾国藩开始在安庆自办制造局，试造新式船舶。1863年，他委托容闳赴国外采购机器设备。1865年，李鸿章收购了美国人的船舶修理厂，将其与苏州、上海的制炮局合并，成立了江南制造局。1867年，江南制造局迁往黄埔江畔的高昌庙镇，工厂的规模大大扩展。1866年5月，左宗棠在福州闽江口开始建设新式造船厂——马尾船政局。他主张整顿水师，制造轮船。他认为，“海疆非此，兵不能强，民不能富”；“借（船）不如雇，雇不如买，买不如自造”。1868年，马尾船厂大致完工，建有船台4座各长20余丈，并设有铁厂、铜厂、锯厂等。同时还建立了马尾学堂，训练海军人才。同年，江南制造局制成了第一号兵船，船长18丈5尺，宽2丈7尺，燃机马力150匹，每小时行驶80余里。此后，马尾船政局也制成一批兵船。与此同时，朝廷还从国外买进了一批兵船。据统计，至1911年辛亥革命时，各造船厂已建成各类舰船100余艘，清廷自国外购进的各类舰船也有80余艘。

在这些舰船的基础上，清廷组建了4支海上军事力量，即北洋水师（防区为黄海、渤海）、南洋水师（防区为福建以外的东海）、福建水师和广东水师。各水师配备了蒸汽动力的兵船，装备了舰载火炮，也配备了其他武器，如水雷和鱼雷等。除海军力量之外，清军还在沿海构筑防御工事，建筑炮台，设置水雷，并在河口放置木排、铁链等，以抵御外敌的海上进攻。

北洋水师是清朝海军中最大的海上武装力量，始

建于1875年。该水师舰船大都购自海外，有铁甲舰2艘，巡洋舰5艘，快船3艘，炮船6艘，鱼雷艇6艘，其他舰只8艘。（见图10）南洋水师、福建水师、广东水师力量薄弱，虽有一些新式装备，但难以独立进行海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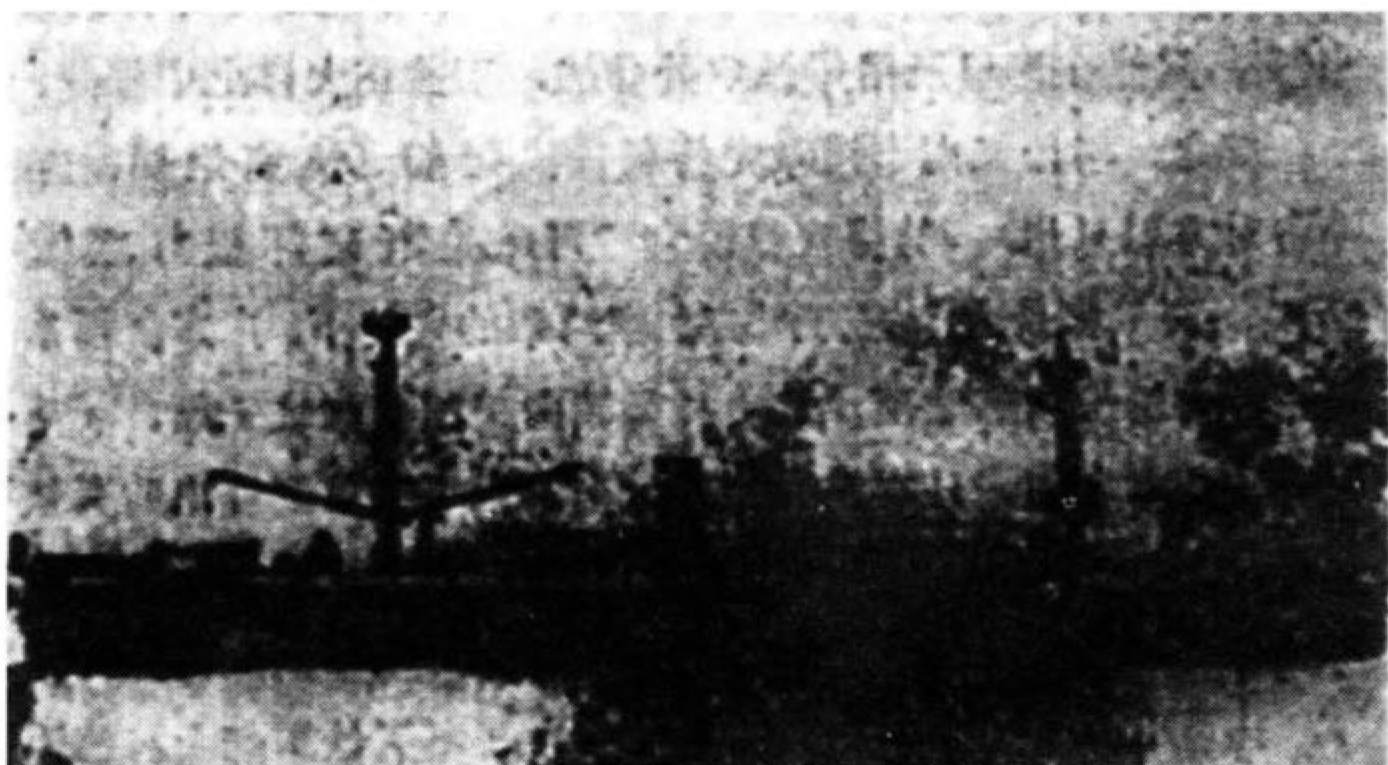


图10　清北洋海军旗舰“定远”号

1883年，清廷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立了海防股。1885年，又将海防股扩充为海军事务衙门，其下设海疆、款项、船政、器械4个股。海军事务衙门是全国海军的最高统帅部，“所有沿海水师，悉归节制调遣”。但清朝海军的实际权力掌握在李鸿章手中。

由于清廷惧战，李鸿章等人又把海军作为私产，有意保存实力，执行单纯防御的方针，加之海军装备较差等原因，清朝海军在对外海战中屡次战败。马江海战中，福建水师全部舰船被击沉。黄海海战中，北洋水师受到很大的损失。1895年1月，北洋水师在威海港被全部歼灭，近代中国海军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二十二 近代海疆诉痛史

1840 年，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由于清廷腐败，军队疲弱，民心涣散，中国陷于被欺凌、被宰割的境地，即使掌握了一些西洋武器，也难于抗击列强的侵略。

广东海疆的防卫。广州是鸦片战争前中国对外贸易的惟一口岸。（见图 11）英国资产阶级为了获取高额利润，竟然在广州大肆贩卖、走私鸦片。鸦片的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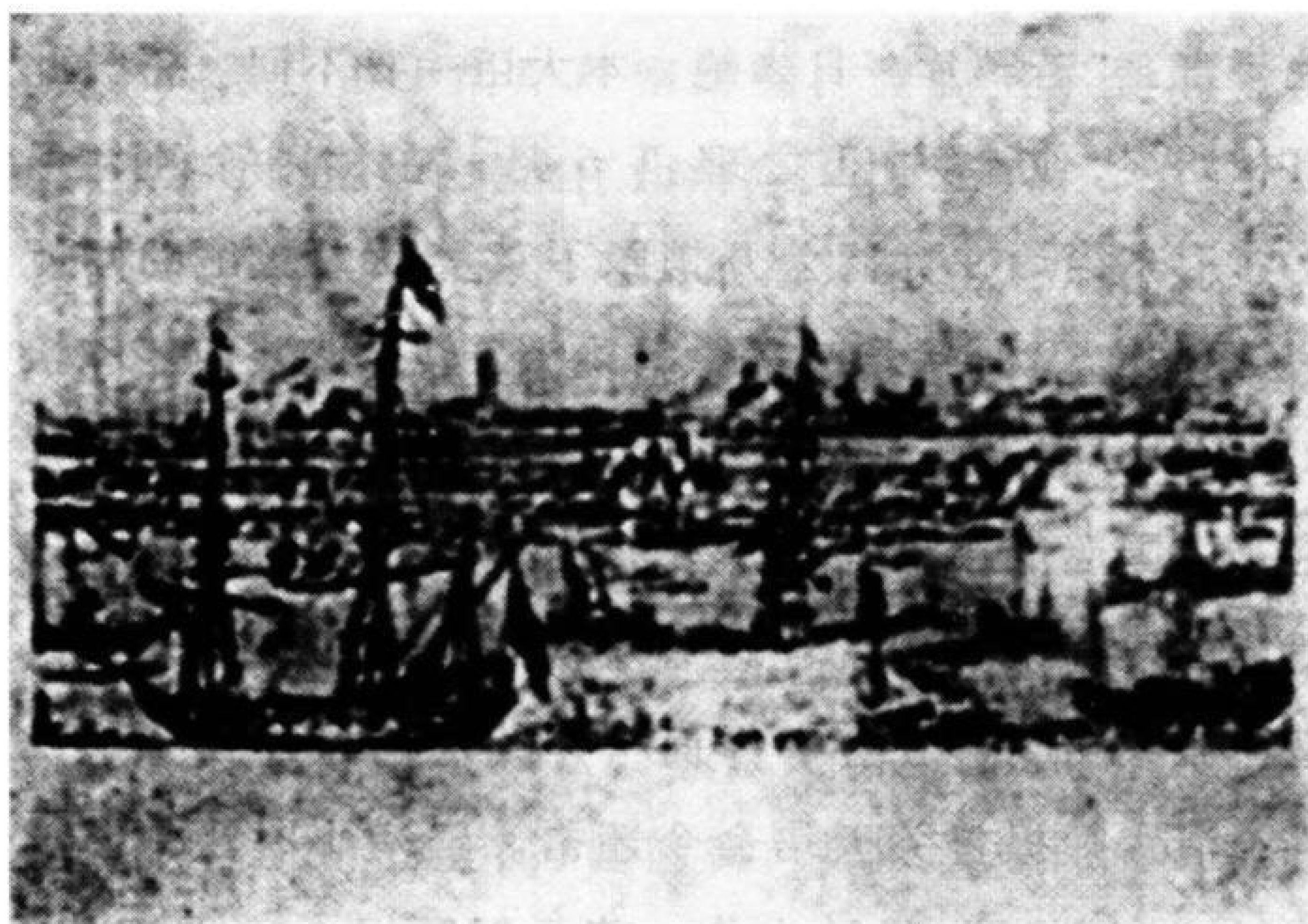


图 11 鸦片战争前的广州港

入毒害了中国人的身体，也不断摧残着中国人的精神。肮脏的鸦片贸易还造成了国内白银大量外流。黄爵滋在奏本中说："故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岁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两；自十一年至十四年，岁漏银二千余万两；自十四年至今渐漏至三千万两。"白银外流，使中国经济状况日趋恶化。

1838年12月12日，英、美鸦片烟贩公然阻挠广东当局处决中国烟贩。他们拆毁绞架，殴打执刑者及群众，引起了公愤。广州市民万余人包围了洋馆，愤怒谴责洋人贩卖鸦片的罪行。

以林则徐为代表的朝野人士极力主张查禁鸦片。林则徐说，鸦片烟不禁绝，则国日贫，民日弱，数年后中原几无可御之兵，且无可充饷之银。道光皇帝也深感问题严重，于是派林则徐赴广东查禁鸦片。1839年3月林则徐到达广州后，实行了严厉的禁烟措施。他誓言："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6月，在林则徐的领导下，广东当局在虎门公开销毁了英美商人缴出的两万余箱鸦片。9月4日，义律率兵船2艘及武装商船和快艇10只，闯入九龙湾。下午二时，英船向中国巡船开炮。中国巡船当即还击，九龙山炮台也发炮支援，击毁英国双桅船1艘。至晚，英舰队撤退。11月3日，义律派兵船2艘在穿鼻洋面（广州虎门口外）开炮挑衅，清水师提督关天培命令还击。经两小时激战，英兵船"窝刺疑"号被击伤，英兵船败退。10月1日，英内阁正式决定发动侵华战争。12月，林则徐下令自

6日起中止中英贸易，但仍允许不携带鸦片的其他外国商船入港。

1840年2月，英国政府任命乔治·懿律为侵华全权代表，查理·义律为副全权代表，并任命懿律为侵华英军总司令。4月，英国从印度等地调集了16艘军舰、4艘汽艇、28艘运输舰以及士兵4000多人，配备火炮540门入侵中国。6月，英侵华舰队封锁了珠江江面，鸦片战争爆发。林则徐到广东后就积极备战，在虎门至横档两岛间置铁链，并增设炮位。他认为民心可用，遂招募船夫、渔民5000余人编为水勇，积极练兵。他还发出布告宣布："如英夷兵船一进内河，许以人人持刀痛杀。"林则徐、关天培在侦知有5艘英国兵船和几只鸦片武装走私船停泊在磨刀洋时，便派渔民混入其中，于夜间乘其不备发动火攻。广东水师火船与潜入的渔民同时纵火，延烧敌船，烧毁敌船2艘及小艇11艘。由于沿岸严密封锁，英舰得不到淡水供应，于6月底只得撤离广州沿海。

英军撤离广州沿海后，沿海岸线北上，直到京津海上门户大沽口。这使得清朝廷惊恐万分，急于与英军讲和。在英国的压力下，清廷将林则徐、邓廷桢等人撤职查办。

1840年11月29日，琦善作为钦差大臣到达广州。他以广东地势无险可守、军械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坚为由，放弃海疆防御，拆除江中障碍，裁减水师，遣散水勇，极力不"刺激"英国侵略者。

1841年1月15日，英军军舰20余艘、士兵1000

余人突然袭击沙角、大角炮台。清600名守军在陈连升的率领下，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炮台最终落入英军之手，陈连升父子阵亡。1月25日，琦善未经朝廷批准就与英人义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穿鼻条约》，几乎接受了英方提出的所有条件。义律要“天朝”割地赔款，严重损伤了“大清皇威”。于是道光皇帝下令对英宣战。清廷调集了1.5万人，由奕山领军，赴广州作战。2月25日，英军18艘军舰首攻横当、永安炮台。沿岸守军奋勇还击，击退了英军。次日晨，英军再次猛攻靖远炮台，已60多岁的关天培身负重伤，仍坚持指挥。最后因琦善拒不援助，炮台失守，关天培英勇殉职。4月，奕山到达广州。但他“防民甚于防寇”，并不积极备战。5月21日，奕山分兵3路袭击英军，失败后退入城中。24日，英军占据四方炮台，以炮轰广州城相威胁。奕山等人不积极抵抗，竟挂白旗投降。

官军投降后，广东民众，特别是三元里一带的群众奋起打击侵略者。5月30日，三元里和各乡义勇5000余人向英军占领的四方炮台挺进，并按计划把英军引至牛栏冈。数千义勇奋勇杀敌，在激烈的肉搏战中杀敌少校军官毕霞，英军死伤200余人。31日，佛山、番禺、南海、花县、增城各县400余乡的义勇数万人赶来，与三元里民众汇合，包围了四方炮台，锣鼓声、号角声震天动地。英军吓得胆战心惊，只得向广州知府余保纯求救。余保纯以欺骗和威胁等手段阻止人民的抗英斗争。在官军的保护下，英军回到了船

上。6 月 6 日，英军退出虎门。

福建海疆的防卫。1840 年 6 月，英军自广州北上。7 月，到达福建沿海。闽浙总督邓廷桢认真备战，加固炮台，阻遏河口，招募水勇。3 日，英舰炮击厦门，邓廷桢命令金沙备道刘曜春发炮还击。他指挥各类船只夜袭敌舰，重创敌舰“希尔拉士”号。英军见无机可乘，继续北上。8 月 22 日，英军“布琅”号等 5 艘军舰再度进犯厦门，厦门水师、岸炮协同作战，击沉、击伤敌舰各 1 艘，英国侵略者不得不逃窜。

1841 年 8 月，英军再次进犯厦门。闽浙总督颜伯焘是主张抗敌的，但防御方针有误。他调动水师大小 50 余艘舰船到外洋寻机与英军作战，在外岛设置炮台，使沿海防御力量过于分散。8 月 26 日，英舰“威基士”号等 15 艘船进攻厦门，守军顽强抵抗，连续打退敌人 5 次进攻，击沉击伤英舰多艘。但由于无水军拦截敌登陆船只，敌军得以登岸，口岸炮台相继为敌占领，厦门失守。

1884 年 7 月 14 日，法国军舰侵入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军港——马尾。马尾位于闽江下游，建有当时中国最大的海军造船厂——福州船政局（见图 12）。法舰进入马尾后，对马尾军港构成极大的威胁，但无能的清廷却无法集中全国的海军力量抵御法军的进犯。7 月 16 日，法舰已侵入马尾 3 天。福建水师向朝廷请示，望能先发制人，抗击侵略者。清廷迟疑不决，失去了战役的主动权。8 月 15 日，法舰距福建水师仅数百米，情况十分严重。8 月 17 日，朝廷才下令阻止法



图 12　1870 年的福州马尾船厂

舰进入闽江口，但仍不明令中国守军用武力制止法舰的侵略行径，只是坐以待毙。8 月 19 日，法国侵略者向清廷发出最后通牒，限 3 日内答复。22 日，中国政府拒绝答复。23 日，法舰发起攻击。在激烈的海战中，爱国官兵浴血奋战，击伤敌舰 5 艘，打死打伤敌人 30 余名。在这次海战中，中国福建水师全军覆没，军舰 11 艘、帆船 19 艘全部被击沉，伤亡 722 人。法舰又用重炮轰击马尾造船厂，经过 1 小时的炮轰，船厂被摧毁。法国侵略者用火炮击毁了他们支持的洋务派花费 20 余年才建立起来的马尾船厂。这一切都说明西方列强不希望中国强大，只是把中国当做它们的原料基地和产品市场。

台湾海疆的防卫。1840 年以来，英军屡次侵犯台湾。1841 年 9 月 13 日，英兵船侵入鸡笼（基隆），为清军击伤。清军击毙英军 33 人，俘获落水英军 133 人。

1842 年 3 月 11 日，英军“安因”号和舢板 4 艘被渔民带入大安港。在清军的猛烈攻击下，英军死数十名，被俘获 49 人。但清廷在英人的要挟下，却将英勇抗敌的达洪河、沈莹撤职治罪，引起了民众的愤怒。

19 世纪 70 年代，日军也多次侵扰台湾，均为台湾人民所驱逐。

1884 年 8 月 2 日，法国远东舰队副司令、海军少将利士比奉命进攻台湾，企图掠夺台湾的煤炭资源。8 月 5 日，法舰向基隆炮台开火，炮台立即还击。10 月 1 日，法军再次发动进攻，分两路进攻基隆和沪尾（淡水）。中国军队在刘铭传的指挥下，主动撤离基隆，集中力量保卫沪尾。10 月 8 日上午，法军 600 余人在炮船的掩护下，分 3 批登陆，进犯沪尾。法军登陆后，受到孙开华军的顽强抵抗，上百法军被击毙或溺死。攻占基隆的法军也受到沉重打击。10 月 13 日，法军宣布对台湾进行封锁，企图割断闽台之间的联系。在大陆人民的支援下，侵略者的阴谋没有得逞。

1895 年 4 月 17 日，清廷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岛及附近岛屿澎湖列岛、钓鱼岛给日本。6 月 3 日，日军舰队和日军近卫师团向基隆发起攻击，基隆守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最终，日军以惨重的代价夺取了基隆。6 月 7 日，日军攻陷台北。日军登陆后，台湾人民与爱国士兵纷纷自发地进行反抗，在新竹、苗栗、大甲溪、漳化、嘉义、台南保卫战中英勇杀敌，杀伤日寇上万人（见图 13）。至 11 月，日军完全占领了台湾。



图 13　台湾高山族同胞的抗日武装

浙江海疆的防卫。1840 年 7 月初，侵犯广东、福建未能得逞的英军，突破了浙江沿海十分薄弱的海防，占领了定海。

1841 年 2 月，英军撤出定海。定海镇总兵葛云飞与处州（今浙江丽水）镇总兵郑国鸿、寿州（今安徽寿县）总兵王锡朋率军进驻定海。英军深知定海的战略地位，于同年 8 月底再度进犯定海。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三总兵率 5000 清军积极备战，同时请求两江总督裕谦支援，但援兵却迟迟未到。9 月 26 日，英舰 29 艘出现在定海海面，发起多次进攻，均为守军击退。28 日，英军连续进攻晓峰岭，又被击退。29 日，英军在五奎山修建炮台，轰击定海守军。10 月 1 日，英侵略军调集沿海兵力集中攻击定海。定海守军在援军不到的情况下，与敌展开白刃战。葛云飞头部受伤，仍奋勇杀敌。三总兵全部为国捐躯，所部战士全部牺

牲，定海失守。10 月 10 日、13 日，英军分别占领了镇海和宁波，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裕谦在保卫镇海战役中阵亡。清廷派奕经等率兵收复失地，奕经等至 1842 年 2 月才进驻绍兴。3 月 8 日，清军分 3 路夜袭宁波、镇海、定海英军，企图一举收复浙东三城。由于机密泄露，英军已有防备，清军战斗失利，浙东之役失败。5 月 18 日，英军分两路发动攻势，企图夺取乍浦（今浙江平湖东南）。佐领隆福率 200 余人奋力抵抗，击退英军 4 次进攻，清军大多阵亡。英军占领乍浦城后，大肆杀掳，尸体塞河，河水为之不流。由于浙东海防要地乍浦失陷，清廷完全屈服。

1884 年，法舰侵犯福建、台湾等地。11 月 1 日，清廷急令南洋、北洋水师抽调舰只在上海集合，支援台湾驻军抗击法国侵略者。南洋水师派出 5 艘兵船，北洋水师却迟迟不动。5 日，在军机处严厉斥责下，李鸿章才勉强派出“超勇”、“扬威”两舰南援，但半路又折返。

1885 年 2 月 23 日，南洋水师的 5 艘舰只与法舰在浙江三门湾水域遭遇，“开济”、“南瑞”、“南琛”号北逃镇海；“驭运”、“澄庆”号因船速慢只得驶入附近的石浦港，在港内为法鱼雷艇击伤。法舰随后北上镇海。镇海为浙东海防要地，在招宝山、金鸡山、虎蹲山筑有炮台，在甬江口采取了防御措施。2 月 28 日，法舰 4 艘停泊在镇海口外七星屿。3 月 1 日，法舰发起第一次攻势，以军舰 1 艘抵近招宝山炮台。守军发炮拦击，首发命中敌船身，第二发命中中桅，第三炮命中船尾。南洋水师 3 舰也发炮，迫使敌舰、敌增援舰

只撤退。次日，清海军与岸炮继续抗击敌舰进攻，使多艘敌舰中炮受伤。后清军又发动夜袭，使法国侵略军受到沉重打击。法侵华司令被打成重伤，后死于澎湖。同年6月9日，中法战争结束。6月21日法舰撤出基隆，7月22日又被迫撤出澎湖。

江南海疆的防卫。1842年6月13日，英舰进入长江，向守备吴淞的江南提督陈化成发战书，要陈投降。16日，英舰70余艘在巴加率领下，分两路向吴淞东、西炮台发动猛攻。陈化成在西炮台指挥还击，击中英旗舰“汉华丽”号和巡洋舰“布朗底”号，英军暂时撤退。其后，英军发动了更为猛烈的进攻。由于东炮台清军逃跑，西炮台腹背受敌。陈化成亲自开炮，奋勇抗敌。经两小时抗击，清军弹药全部打光，遂与敌展开白刃战。把总龚增岭挥舞大刀，率军与敌拼杀。陈化成身负重伤，与龚增岭等相继牺牲。守卫西炮台的守军80余人也全部壮烈殉国。此次吴淞之役清军击沉击伤敌舰8艘，敌伤亡500余人。

吴淞失陷后，英舰向西进入长江。这时英舰增至100余艘，官兵增至万人。7月21日，英军进攻镇江，镇江守军进行了顽强抵抗。外城失陷后，清军与英军在城内展开巷战，歼敌160余人，清军有600余人伤亡。镇江失陷后，英军奸淫烧杀，使镇江“无市不空，无家不破”。7月29日英国军舰80余艘驶离镇江，8月初来到南京附近江面。英军以炮轰南京城相威胁，迫使清廷完全屈服。8月29日，清廷派耆英到南京，与英军统帅伊里布在英舰“汉华丽”号上签署

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使中国主权再次受到践踏。

山东海疆的防卫。1894 年 9 月 17 日，中日海军在黄海展开大战。17 日中午，北洋舰队自大东沟返航时，西南方向出现悬挂美国旗的舰队。当这支舰队驶近后，突然改挂日本旗，丁汝昌急忙命令迎战。在海战中，日舰避开清北洋水师的“定远”、“镇远”等主力舰，绕向北洋水师侧翼，猛轰两翼小舰。北洋水师舰队队形出现混乱，“超勇”号沉没，“致远”、“经远”号被隔离在舰队队列之外。海战中，北洋水师爱国官兵英勇作战，击伤日舰“京丸”、“松野”、“吉野”、“赤城”、“比睿”、“扶桑”号。“致远”号被击伤后，船身已倾斜，在弹药用尽的情况下，拼死向敌新式快船“吉野”号撞去，但为“吉野”号上的快炮击沉，全船官兵 250 余人壮烈牺牲。在海战中，中国舰队的“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广甲”5 舰被击沉，多艘舰船受伤。海战后，北洋海军尚有“镇远”、“定远”两只大型铁甲舰，“靖远”、“来远”、“济远”3 艘巡洋舰，“平远”、“广丙”两只铁甲舰，以及运输船、鱼雷艇等 30 余艘。10 月 18 日，李鸿章命丁汝昌率北洋水师全部离开旅顺，驶往威海。

1895 年 1 月 12 日，日军两万多人在 25 艘兵舰和 16 艘鱼雷艇的掩护下，于山东荣成成山角登陆，向威海卫大举进攻。李鸿章消极避战，坐以待毙，使日军得以从后路包围北洋水师。30 日，南帮炮台为日军占领。2 月初，日军又轻易地占领了北帮炮台，切断了北

洋水师与陆上的联系。2月3日，日军水陆同时发动攻击，用修复的清军大炮轰击刘公岛、日岛的清军防御工事和北洋水师。日舰也分两路堵住港口，轰击在港内停泊的北洋水师舰队。在日军鱼雷艇的攻击下，“来远”、“威远”、“宝筏”3舰被击沉，刘公岛、日岛的军事设施、弹药库也起火爆炸。10日，在舰队中的外国人策动士兵哗变，逼迫丁汝昌投降。在这种情况下，丁汝昌被迫自杀，清军乞降。2月14日，道员牛昶炳与伊东祐享签订了“刘公岛降约十一条”。刘公岛陷落后，港内残存的“镇远”号等大小11艘军舰为日军所获，北洋水师被彻底消灭。（见图14）



图14　中日甲午战争时的威海卫军港

津门海疆的防卫。1840年8月，英军首次逼近京津门户大沽。1857年，沙俄也曾派出“亚美利加”号舰觊觎大沽。

1858年4月，英、法、美、俄4国公使率英舰10多艘、法舰6艘、美舰3艘、俄舰1艘陆续到达大沽口外。5月19日晚，侵略军开始进犯大沽一带炮台。

20日上午10时，英、法联军炮击大沽炮台，清军顽强抵抗，击伤敌舰4艘、运兵船2艘。在争夺炮台的战斗中，爱国士兵与敌肉搏，甚至引爆炸药与敌同归于尽。参将沙春元、陈毅战死，大沽炮台失守。总督谭廷襄实行“不能战，不易守，不得不抚”的方针，实际是不抵抗。5月21日，英法联军出动7艘军舰和大批木船，溯白河而上，窜犯天津，沿途烧杀劫掠，迫使清廷签订了《天津条约》。

1859年6月，英、法、美3国公使率15艘军舰再次进犯大沽。25日，英、法舰队突然炮击大沽炮台，强行拆毁拦河工事，迫使清廷同意英、法等国舰船经大沽沿白河去天津，武装护送公使去北京。清军大小火炮一齐射击，使敌陷入混乱。敌陆战队下船后即陷入沼泽地带，成了中国军队的活靶子。躲入芦荡的敌陆战队士兵又受到炮火轰击，死伤惨重。至26日晨，英、法联军死伤400余人，联军指挥贺布身受重伤，法舰队司令也负伤。敌舰“海鹭鸶”号、“破风”号、“呼潮”号等5艘被击沉，6艘被击伤，2艘被俘获。中国在第二次大沽保卫战中取得了少有的胜利。

1860年7月，英法联军再犯大沽，计有兵舰和运输船200余艘，其中英舰173艘，法舰33艘，英军1万余人，法军6300余人。8月1日，英法联军闯入北塘。12日，英法联军开始进攻居于大沽与天津之间的重镇军粮城。21日英法联军攻占大沽炮台，又于24日占领了天津。9月底，英法联军进逼北京，清军溃散。

10月13日，英法侵略军攻入北京。清廷被迫与各国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

1900年3月，英、法、德、俄、日、美、意、奥八国联军又集合于大沽，试图镇压义和团运动，进一步瓜分中国。6月16日夜11时，八国联军发动突然袭击，向大沽口炮台轰击。守军在天津镇总兵罗荣光的率领下顽强抵抗，用岸炮轰击侵略军舰只，多次击退敌人的陆上进攻。由于驻天津的直隶总督裕禄、提督聂士诚拒不救援，罗荣光与坚守炮台的官兵几乎全部牺牲，大沽炮台为侵略军占领。此役清军击伤敌舰10余艘，使敌伤亡250余人。大沽口陷落，通向津、京的门户大启，北京、天津危在旦夕。尽管有义和团的英勇阻击，迟滞了英、法等国军队的进攻，但北京仍于8月14日陷落。

辽东海疆的防卫。1894年10月24日，日军3万余人在花园口登陆。11月19日，总兵徐邦道率部在沿海炮台抗击日军，与敌血战后退入旅顺，与日军展开巷战。由于清军将领逃跑，各军不相统属，旅顺抗战失败。日寇占领旅顺后，对当地居民进行了疯狂的屠杀，杀死手无寸铁的居民2万余人。全城仅留36人，掩埋同胞的尸体。

1900年7月6日，俄国17.7万侵略军分6路入侵中国东北，在战略要地营口与义和团激战，并疯狂屠杀了当地居民2000余人。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痛史，是海疆被侵略、被蚕食、被瓜分的历史。由于抗击列强的战争失败，中国被迫

在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上签字，中国的权益被侵犯，疆域被瓜分，财富被掠夺。

在抗击外敌侵略的战争中涌现出许多奋勇杀敌的勇士，不少爱国志士为国捐躯，壮烈牺牲，祖国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当然也出现了一些贪生怕死的懦夫，甚至出现了一些可耻的叛徒，他们的名字也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参考书目

1.《尚书》收入《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

2.（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

3.（东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

4.（南朝·宋）范晔、（晋）司马彪：《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

5.（西晋）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

6.（后晋）刘䀖：《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

7.（清）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74。

8.（明）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9。

9.（唐）徐坚：《初学记》，中华书局，1962。

10.（唐）欧阳询：《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

11.（清）厉荃：《事物异名录》，岳麓书社，1991。

12. 杨伯峻撰《列子集释》，中华书局，1979。

13. 郭庆藩辑《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

14.（吴）沈莹：《临海水土异物志辑校》，张崇根辑校，农业出版社，1988。

15.（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辑佚校注》，胡起望、

覃光校注，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
16. （元）汪大渊：《岛夷志略校释》，苏继庼校释，中华书局，1981。
17.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华书局，1959。
18. （明）王士性：《广志绎》，吕景琳点校，中华书局，1981。
19. （明）陈第：《毛诗古音考》，中华书局，1988。
20. （明）茅元仪：《郑和航海图》，向达整理，中华书局，1961。
21. 孙光圻：《中国古代航海史》，海洋出版社，1990。
22. （古代部分）邓端本编著《广州港史》，海洋出版社，1986。
23. 林士民：《海上丝绸之路的著名海港——明州》，海洋出版社，1990。
24. 庄为玑等编著《海上丝绸之路的著名港口——泉州》海洋出版社，1989。
25. 黄景海等编著《秦皇岛港史》（古、近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
26. 李华彬等编著《天津港史》（古、近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6。
27. 蒋祖缘、方志钦等撰《简明广东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
28. （上册）朱维斡：《福建史稿》，福建教育出版社，1985。
29. 孙家山：《苏北盐垦史初稿》，农业出版社，1984。
30. 韩振华编《南海诸岛史地考证论集》，中华书局，

1981。

31. 吕一燃主编《南海诸岛·地理·历史·主权》，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2。

32. 郑一钧：《论郑和下西洋》，海洋出版社，1985。

33. 黄公勉、杨金森：《中国历史海洋经济地理》，海洋出版社，1985。

34. 范中义：《筹海图编浅说》，解放军出版社，1987。

35. 陈国强：《郑成功与高山族》，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36. 《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

37. 施联朱：《台湾史略》，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

38. 军事科学院：《中国古代战争战例选编》，中华书局，1984。

39. 白寿彝：《中国交通史》，商务印书馆，1993 年 7 月影印本。

40. 郑肇经：《中国水利史》，商务印书馆，1993 年 7 月影印本。

41. 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商务印书馆，1938。

《中国史话》总目录

系列名	序号	书名	作者
物质文明系列（10种）	1	农业科技史话	李根蟠
	2	水利史话	郭松义
	3	蚕桑丝绸史话	刘克祥
	4	棉麻纺织史话	刘克祥
	5	火器史话	王育成
	6	造纸史话	张大伟　曹江红
	7	印刷史话	罗仲辉
	8	矿冶史话	唐际根
	9	医学史话	朱建平　黄　健
	10	计量史话	关增建
物化历史系列（28种）	11	长江史话	卫家雄　华林甫
	12	黄河史话	辛德勇
	13	运河史话	付崇兰
	14	长城史话	叶小燕
	15	城市史话	付崇兰
	16	七大古都史话	李遇春　陈良伟
	17	民居建筑史话	白云翔
	18	宫殿建筑史话	杨鸿勋
	19	故宫史话	姜舜源
	20	园林史话	杨鸿勋
	21	圆明园史话	吴伯娅
	22	石窟寺史话	常　青
	23	古塔史话	刘祚臣
	24	寺观史话	陈可畏

系列名	序号	书名	作者
物化历史系列（28种）	25	陵寝史话	刘庆柱　李毓芳
	26	敦煌史话	杨宝玉
	27	孔庙史话	曲英杰
	28	甲骨文史话	张利军
	29	金文史话	杜　勇　周宝宏
	30	石器史话	李宗山
	31	石刻史话	赵　超
	32	古玉史话	卢兆荫
	33	青铜器史话	曹淑琴　殷玮璋
	34	简牍史话	王子今　赵宠亮
	35	陶瓷史话	谢端琚　马文宽
	36	玻璃器史话	安家瑶
	37	家具史话	李宗山
	38	文房四宝史话	李雪梅　安久亮
制度、名物与史事沿革系列（20种）	39	中国早期国家史话	王　和
	40	中华民族史话	陈琳国　陈　群
	41	官制史话	谢保成
	42	宰相史话	刘晖春
	43	监察史话	王　正
	44	科举史话	李尚英
	45	状元史话	宋元强
	46	学校史话	樊克政
	47	书院史话	樊克政
	48	赋役制度史话	徐东升

系列名	序号	书名	作者
制度、名物与史事沿革系列（20种）	49	军制史话	刘昭祥　王晓卫
	50	兵器史话	杨　毅　杨　泓
	51	名战史话	黄朴民
	52	屯田史话	张印栋
	53	商业史话	吴　慧
	54	货币史话	刘精诚　李祖德
	55	宫廷政治史话	任士英
	56	变法史话	王子今
	57	和亲史话	宋　超
	58	海疆开发史话	安　京
交通与交流系列（13种）	59	丝绸之路史话	孟凡人
	60	海上丝路史话	杜　瑜
	61	漕运史话	江太新　苏金玉
	62	驿道史话	王子今
	63	旅行史话	黄石林
	64	航海史话	王　杰　李宝民　王　莉
	65	交通工具史话	郑若葵
	66	中西交流史话	张国刚
	67	满汉文化交流史话	定宜庄
	68	汉藏文化交流史话	刘　忠
	69	蒙藏文化交流史话	丁守璞　杨恩洪
	70	中日文化交流史话	冯佐哲
	71	中国阿拉伯文化交流史话	宋　岘

系列名	序号	书名	作者
思想学术系列（21种）	72	文明起源史话	杜金鹏　焦天龙
	73	汉字史话	郭小武
	74	天文学史话	冯　时
	75	地理学史话	杜　瑜
	76	儒家史话	孙开泰
	77	法家史话	孙开泰
	78	兵家史话	王晓卫
	79	玄学史话	张齐明
	80	道教史话	王　卡
	81	佛教史话	魏道儒
	82	中国基督教史话	王美秀
	83	民间信仰史话	侯　杰　王小蕾
	84	训诂学史话	周信炎
	85	帛书史话	陈松长
	86	四书五经史话	黄鸿春
	87	史学史话	谢保成
	88	哲学史话	谷　方
	89	方志史话	卫家雄
	90	考古学史话	朱乃诚
	91	物理学史话	王　冰
	92	地图史话	朱玲玲

系列名	序号	书名	作者
文学艺术系列（8种）	93	书法史话	朱守道
	94	绘画史话	李福顺
	95	诗歌史话	陶文鹏
	96	散文史话	郑永晓
	97	音韵史话	张惠英
	98	戏曲史话	王卫民
	99	小说史话	周中明　吴家荣
	100	杂技史话	崔乐泉
社会风俗系列（13种）	101	宗族史话	冯尔康　阎爱民
	102	家庭史话	张国刚
	103	婚姻史话	张　涛　项永琴
	104	礼俗史话	王贵民
	105	节俗史话	韩养民　郭兴文
	106	饮食史话	王仁湘
	107	饮茶史话	王仁湘　杨焕新
	108	饮酒史话	袁立泽
	109	服饰史话	赵连赏
	110	体育史话	崔乐泉
	111	养生史话	罗时铭
	112	收藏史话	李雪梅
	113	丧葬史话	张捷夫

系列名	序号	书名	作者
近代政治史系列（28种）	114	鸦片战争史话	朱谐汉
	115	太平天国史话	张远鹏
	116	洋务运动史话	丁贤俊
	117	甲午战争史话	寇　伟
	118	戊戌维新运动史话	刘悦斌
	119	义和团史话	卞修跃
	120	辛亥革命史话	张海鹏　邓红洲
	121	五四运动史话	常丕军
	122	北洋政府史话	潘　荣　魏又行
	123	国民政府史话	郑则民
	124	十年内战史话	贾　维
	125	中华苏维埃史话	杨丽琼　刘　强
	126	西安事变史话	李义彬
	127	抗日战争史话	荣维木
	128	陕甘宁边区政府史话	刘东社　刘全娥
	129	解放战争史话	朱宗震　汪朝光
	130	革命根据地史话	马洪武　王明生
	131	中国人民解放军史话	荣维木
	132	宪政史话	徐辉琪　付建成
	133	工人运动史话	唐玉良　高爱娣
	134	农民运动史话	方之光　龚　云
	135	青年运动史话	郭贵儒
	136	妇女运动史话	刘　红　刘光永
	137	土地改革史话	董志凯　陈廷煊
	138	买办史话	潘君祥　顾柏荣
	139	四大家族史话	江绍贞
	140	汪伪政权史话	闻少华
	141	伪满洲国史话	齐福霖

系列名	序号	书名	作者
近代经济生活系列（17种）	142	人口史话	姜　涛
	143	禁烟史话	王宏斌
	144	海关史话	陈霞飞　蔡渭洲
	145	铁路史话	龚　云
	146	矿业史话	纪　辛
	147	航运史话	张后铨
	148	邮政史话	修晓波
	149	金融史话	陈争平
	150	通货膨胀史话	郑起东
	151	外债史话	陈争平
	152	商会史话	虞和平
	153	农业改进史话	章　楷
	154	民族工业发展史话	徐建生
	155	灾荒史话	刘仰东　夏明方
	156	流民史话	池子华
	157	秘密社会史话	刘才赋
	158	旗人史话	刘小萌
近代中外关系系列（13种）	159	西洋器物传入中国史话	隋元芬
	160	中外不平等条约史话	李育民
	161	开埠史话	杜　语
	162	教案史话	夏春涛
	163	中英关系史话	孙　庆

系列名	序号	书名	作者
近代中外关系系列（13种）	164	中法关系史话	葛夫平
	165	中德关系史话	杜继东
	166	中日关系史话	王建朗
	167	中美关系史话	陶文钊
	168	中俄关系史话	薛衔天
	169	中苏关系史话	黄纪莲
	170	华侨史话	陈　民　任贵祥
	171	华工史话	董丛林
近代精神文化系列（18种）	172	政治思想史话	朱志敏
	173	伦理道德史话	马　勇
	174	启蒙思潮史话	彭平一
	175	三民主义史话	贺　渊
	176	社会主义思潮史话	张　武　张艳国　喻承久
	177	无政府主义思潮史话	汤庭芬
	178	教育史话	朱从兵
	179	大学史话	金以林
	180	留学史话	刘志强　张学继
	181	法制史话	李　力
	182	报刊史话	李仲明
	183	出版史话	刘俐娜
	184	科学技术史话	姜　超

系列名	序号	书名	作者
近代精神文化系列（18种）	185	翻译史话	王晓丹
	186	美术史话	龚产兴
	187	音乐史话	梁茂春
	188	电影史话	孙立峰
	189	话剧史话	梁淑安
近代区域文化系列（11种）	190	北京史话	果鸿孝
	191	上海史话	马学强　宋钻友
	192	天津史话	罗澍伟
	193	广州史话	张　苹　张　磊
	194	武汉史话	皮明庥　郑自来
	195	重庆史话	隗瀛涛　沈松平
	196	新疆史话	王建民
	197	西藏史话	徐志民
	198	香港史话	刘蜀永
	199	澳门史话	邓开颂　陆晓敏　杨仁飞
	200	台湾史话	程朝云

《中国史话》主要编辑
出版发行人

总 策 划	谢寿光　王　正
执行策划	杨　群　徐思彦　宋月华 梁艳玲　刘晖春　张国春
统　　筹	黄　丹　宋淑洁
设计总监	孙元明
市场推广	蔡继辉　刘德顺　李丽丽
责任印制	岳　阳



本书借助大量的古代历史文献，对上自远古下至近代的中国海疆开发历史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其中既介绍了秦皇汉武开疆拓土的丰功伟绩、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历史、伟大的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又重点介绍了沿海各港口及台湾、南海诸岛的开发历史、爱国官民捍卫海疆的英雄史和西方列强侵略中国海疆的屈辱史。同时对中国海域的丰富物产和近代海军的建设也做了一些介绍。可以说本书是一部较好的了解中国海疆开发历史的普及性读物。

上架建议：中国历史



ISBN 978-7-5097-3196-3
定价：15.00元

www.ssap.com.cn

装帧设计/3A设计艺术工作室 www.3ads.com.cn